

目 录

回忆录

- 丁基实同志来信…………… (1)
- 毛泽东同志交我带到聊城
致范筑先将军亲笔信的回忆
 黎玉口述、李士钊笔记…………… (3)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聊城~~ ~~的活动~~ 活动片断
 ——我的一 ~~段~~ ~~星期~~ 回忆……………申怡之 (11)
- 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生“九一八”请愿斗争
 …………… 谢鑫鹤 (18)
- 跋山涉水去延安……………周乐亭 (31)
- 中共省立聊城师范党支部在济宁乡建训练处的活动
 ……………周乐亭 (35)
- 关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创建的……………
 ——重要史料……………牛连文口述 李士钊笔记 (41)
- 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队的产生及坡赵庄战斗…郑校先 (63)
- 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陷害范筑先将军的……………莫循 (69)
- 鲁西北的革命熔炉——政干校……………许法 (76)
- 聊城抗战移动剧团片断回忆……………刘定一 (86)

我对聊城北杨集

革命七烈士的回忆……………沈廷梅（98）

太平庄战斗……………张侠（115）

聊城抗日县政府从成立至

聊城解放期间的工作片断……………李诚（123）

在艰难的岁月里……………杜仲文（130）

在二区委工作时的情况……………杜仲文（134）

忆国共美三方代表在山东省筑先县

（聊城）和谈片断……………张侠（138）

反“国际救济总署”……………张侠（147）

筑先县教育片断……………梁金中（171）

我在解放聊城的战斗中……………杜堂（191）

聊堂工作团片断……………赵国壁（194）

难忘的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以堂邑县为中心的

“无人区”……………陈福隆（201）

我在武训县抗日工作的回忆……………李寿彭（205）

攻打阮庄小围子击毙伪团长黄竹斋……………徐明魁（221）

对原堂邑县（武训）县独立团成长战斗的回顾

……………李镇北（224）

解占伯和他的一家……………吴星（235）

缅怀革命烈士林梦白同志……………袁寿宸（210）

文献资料

日寇侵华八年筑先县所受损失……………冀鲁豫区委（247）

报刊资料

解放聊城……………康健（249）

解放聊城战果……………《大众日报》（251）

解放聊城我军公祭范筑先将军……………《大众日报》（252）

我命令入聊全军保存聊城固有文化…《冀南日报》（253）

筑先参运结束三千五百青年入伍

参军结合复查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洪光、刘静轩、舒新启、张考武、徐俊杰…（254）

武训百余干部带头，千余群众踊跃参军……………旭涛（256）

武训县政权干部全力参加群众运动一区五十

六名伪军伪员悔过……………荫轩（257）

转变作风走群众路线贾庄小区打开消沉面局

……………化南（258）

武训县五区十九村联合进行减租减息索回六百亩地

各种组织皆扩大……………石名符（259）

附：党史资料第三期订正……………编者（260）

丁基实同志来信

中共聊城市委党史办负责同志：



我在山东济南工作时期，曾担任过两届省委委员和兼任组织部长，对鲁西县委的日常工作，已经记忆不多，只有下列几件事和你们交换意见。

一、我和聂子政、王寅生两同志认识的比较早，聂、王从黄埔军校返回山东的时候，是先和我接头的，他们当时是提出山东省委的假名（代号已忘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就这样我们就接上了关系。

二、大约1928年的时候，日军即将占领济南，党的机关多数已移到郊区，有一天，天气很黑，王寅生同志到济南西郊去，走到张宗昌军火库附近，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楚突然有两个站岗的张宗昌士兵，挡住了王寅生同志进行检查，因王寅生同志身上带有手枪，于是就作为土匪被逮捕，后来就这样牺牲了。以上是事后大家就当时知道的情形推测出来的想法和事实。多次到监狱去调查，一直得不到可靠消息。不知你们现在是怎样想的，是否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

三、1927年年底，我曾去过一趟聊城，住在赵以政同志家，那时他父亲正办了一个私塾，在教堂，我到的一天，是聂子政和赵以政同志他们安排了一个时间，我和韩建德在一个野外见了一面，我重申了，我们对进攻坡里的态度，“这

是一次革命行动，绝非抢劫，我们同志对韩的态度是信任的，教堂攻下以后，所有枪支归韩所有，所有粮食，应分散给参加的和附近的贫苦农民。”韩来的时候，是农民打扮，但实际上不象农民，而象个读书人。当时还听说他有个女儿在聊城师范念书，但不知是否属实。

谨祝

敬礼！

丁基实谨上

1985、6、27

编注：

丁基实同志即丁群字君羊，山东日照人，一九二七年为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现年八十四岁，现于上海离休。

毛泽东同志交我带到聊城 致范筑先将军亲笔信的回忆

黎玉口述李士科笔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属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和其他旁系部队虽然数目不少，但有的不战而退，有的一触即溃。中共山东省委对原属西北军，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估计是：他为了保存实力也会不战而退。我们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军阀韩复榘在一旦日军攻进山东，他就有可能逃跑的估计，在韩复榘逃跑之前，我们还是要争取他抗日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准备自己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决定在山东全省具体布置和发动四面八方的抗日游击部队。其中对于鲁西北地区的工作方针是：团结驻聊城的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地区靠抗日武装部队和抗日政权，同时决定不放弃通过这个地区原有的合法政权机构，组织和创建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在上层通过范的政治部——实际上由中共鲁西北特委所绝对掌握——和我们的秘密党员张维翰、张郁光、齐燕铭、姚弟鸿和王幼平等同志的工作，促进范筑先将军先后委派共产党人担任县长和游击支队司令，成

为一个华北敌后最早的抗日根据地。韩复榘率领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并被蒋介石设阴谋在开封会议时将韩逮捕，以后又在武汉被枪杀，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章节，而范筑先将军则坚决抗战到英勇牺牲，则成为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而且成为光荣的一页。

中共山东省委把开展鲁西北新政治局面的任务，交给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他作为省委代表住在聊城，负责领导这个广大地区的工作，这是省委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在济南定下的决策。党对驰名华北的“抗战老人”范筑先将军的争取团结工作，中共中央联络部的代表彭雪枫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亲自到过聊城作了具体部署，范筑先将军作为一个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的。他能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并和共产党团结合作，这在当时的局面下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纵队——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前身，带领由抗大、陕公学生所组成的近二百人的干部大队回山东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叫我给范筑先将军带来了一封亲笔信。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范筑先将军亲自进行的统战工作，也是进一步争取团结范筑先坚持抗战的重要措施之一。信件的主要内容是同情他并鼓励他，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当时山东西北部的抗战局面，在华北和全国的范围而言都是有起色的，武汉和延安的党报和进步报刊，都赞誉范筑先将军是一位著名全国的“抗战老人”。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是用毛笔写的，重点是对范筑先将军进行统战性的鼓励和慰勉。同时我还由延安带来了武汉出

版的毛泽东同志著《论持久战》一书，也是我亲自交给他的。当时的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是徐运北同志，以前的刘耀先（即刘宴春同志）病了，党的工作是由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所直接领导的。这时特委已掌握范筑先将军这一部分的政治局面和抗战武装力量。

我们由延安动身时，中共山东省委的干部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的干部，组成一个具有双层性质的干部大队，以后的明确职务如下：

黎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山东纵队政委。

张经武：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

江华：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吴克华：干部大队长兼政治部军事科长。

高克亭：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

李林：山东纵队政治部总务科长。

王涛：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省委和山纵有个核心领导的党委会，就是以上几位同志所组成的。

我们到西安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休息了两天，临动身时适巧朱德总司令由前方骑马回来，他告诉我们要在河南浍池过黄河，然后到晋东南的长治十八集团军总部，在那里左权同志代表总部招待我们，四个大盘子菜都很丰富，他还详细地说到山东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质。我们由山西长治出发，经过太行山到南宫、临清而后到聊城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到聊城时，首先接待我们的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同志、其次是几位重要的秘密党员张郁光、齐燕铭、姚弟鸿、

赵伊坪等同志。我们都住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的鲁西北军事教育团内，袁仲贤同志是教育长，他负责招待我们的生活，我们和干部队伍都住在这里。

范筑先将军曾在他的司令部办公室中请我们吃饭，司令部、政治部科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场面很朴素大方，在长桌上摆了五六个大菜盘，肉很多。范说：八路军最讲究艰苦朴素，不讲究排场。饭前大家先座谈，他很高兴的问我们的姓名和年龄，他说：八路军集中了优秀英俊的青年干部，人才济济呀！并说：我已快六十岁了，老气横秋了，要向青年同志们学习。互相敬酒时，都很诚恳实在，没有客套话。

以后又在军事教育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范筑先将军和政治部所属政治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的全体干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实际上这是一次我们带的干部大队，与中共鲁西北特委和政治部的干部胜利会师大会。范筑先将军在会上首先致词说：去年日寇进攻山东，我们鲁西北军民独留黄河以北孤军抗战，今年春天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军冀南，使我们才有了友军支援。我六月间在河北省威县会见了徐向前副师长，并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学习来很多宝贵的抗战经验。今天又见到你们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诸位同志，以及大队的同志们到聊城来，还带来毛主席写来的亲笔信，使我感到无尚光荣，今后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对我们的指导，在抗战中一定要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还表示要与聊城共存亡。

在欢迎会上，我和张经武同志先后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向坚持抗战的范筑先将军表示敬意，并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鲁西北的全体军政干部致以亲切慰问。由于

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中共鲁西北特委在聊城还处于未公开的状态，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两个响亮的词汇，在聊城举行的大会上公开出现还是第一次，使这次大会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了。

当我们发言时，范筑先始终站在台上没坐下来，但在一个国民党的代表发言时，范则坐下来用侧背对着他，从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范的政治态度明确，反对谁？赞成谁？这就成为最显著的对比了。

我和张经武同志等到聊城时，张霖之同志就告诉我说：范的政治局面和武装力量，部分已开始有了分化的趋势，因为原为旧军队出身的范的参谋长王金祥，已被由武汉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等人所收买，他们正在进行阴谋破坏和分裂活动。我们为了争取范筑先，并把范的几支武装部队变成进步武装力量，曾想把王金祥抓起来，但后来未搞成。当时在冠县、馆陶的第十支队是党的基于武装部队，可惜张维翰司令未来参加这次大会，我们也未来得及到第十支队去进行访问。

在那次欢迎会上，我们青年同志在会上演唱几支抗战歌曲，其中有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曲调，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时代填词的“上前线”和贺绿汀的“全面抗战”等。很受到当地同志们的欢迎，这些歌曲后来都很快传遍鲁西北和山东各地。此外，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同志们还在政治部救亡室，举行了一次茶话形式的欢迎延安战友的座谈会。那次会是由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留日学生，左派教育家）张郁光同志主持的，他首先代表主人发言说：今天是欢迎娘家人的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感谢娘家人带来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

主席的声音，使我们受到深刻难忘的教育。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北特委的代表张霖之同志在发言时说：同志们经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聊城，带来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开展，有了更明确的指针。我们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奋斗，绝不辜负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会后聚餐，还请我们吃了聊城的著名特产“熏鸡”，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当时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总编辑齐燕铭同志，特派该报记者到我们的住处，进行了专题访问。为了我们下一步要去泰西和鲁中的军事行动需要保密，我嘱咐他不要发表新闻报道。我和张经武同志都给他题了词。

我们本来想在聊城多住几天的，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谣言说：八路军来了，他们要和政治部的共产党人里应外合夺取聊城。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多住，以免影响团结抗战而赶快走了。我和张经武同志向范辞行时，也谈到这些谣言的事。范斩钉截铁的对我说：我绝不相信这种谣言，我更相信八路军也绝不会办这种蠢事，你们还是多住几天吧，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为了要赶路，希望早日到达鲁中山区的沂蒙抗日根据地。

我们离聊城之前，还留下了几个干部，其中包括邵汝群（即邵玉琢朝城人，一九三七年抗战前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地下党员）和田兵（即王从化、临沂人，第三乡村师范学生）两个同志，还留下两个老红军骨干，一个团级和一个营级干部。我们从聊城出发东进，过泰西抗日根据地，见到泰西地委的负责人张北华、段君毅等同志，又住了三四天，才又继续东进到沂蒙山区的。

赵健民同志一九三六年被捕前，原为中共山东省委组织

部长。“七、七”事变后，经过党的营救从济南监狱中出来，而后就由他的叔叔带他回到冠县故乡去，在冠县一带组织抗日武装部队。先在范筑先将军第六支队当过营长，以后又在“筑先纵队”担任营长。但是当时党中央不知道他在何处，直到一九四〇年才打听到他的下落。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把在韩复榘第三集团军政训处长余心清主办的政治训练班中的共产党员与民先队员，以及其他爱国青年都尽量多派到聊城去。鲁东、鲁南也去了少数人，都没有扎下根，只有在鲁西北聊城的范筑先将军部，而且有我党影响下的政治部（先叫政训处）协助接受了这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这些人中包括有留日学生，平津的大学生中“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也有部分山东本地和济南部分爱国的大中学生与小学教师。当时为了储备干部，组织武装力量，我们尽可能的把他们派到鲁西北地区去，同时利用第六专署旧政权的形式，可以在县政府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山东省委一九三六年春天曾派刘宴春和徐运北同志到鲁西北，是为了整顿恢复并建立中共鲁西北特委，同时广泛地组织救国会，发动和吸收抗日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抗日群众到抗战中来，这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张霖之同志到山东省委工作，是我于“七、七”事变后向中央提出的要求经中央组织部研究同意的。原来的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是刘宴春同志，当时黄河以北山东所辖的地区叫“鲁西北”，党的名称也因地为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宴春同志因病离职，才由徐运北同志当特委书记的。刘宴

春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抗战前他在鲁西北做了大量工作。

聊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为日寇所攻陷，鲁西北特委机关与山东省委联系暂时中断。一九三九年二月成立了以张霖之同志为书记的中共鲁西区党委，原范筑先将军部党的第十支队和其他几个支队的进步力量，先后改建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正式归一二九师领导。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中共鲁西区党委划归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鲁西北地区就和中共山东分局没有关系了。

笔者附记：本文初稿系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北京访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副部长黎玉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共聊城县委档案组，曾打印出来送请黎玉同志亲自校审，同年一月二十日，六月一日，十月二十日作过三次校订补充。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又在济南访问过一九三八年与黎玉、张经武同志同时到过聊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高克亭同志，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李林同志，再次作了回忆与补充，整理后又请黎玉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作了第四次校订，当他们四十四年前路经聊城的五天中，我作为一个青年新闻工作人员，参加了各种会议采访和接待工作，许多活动情况都是亲自参加过的。本来写过一个长篇报道稿，由于他们正在行军并涉及保密，而未在报纸上发表。事情过去已经快要半个世纪了，回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此文几经核对，今后以此稿为准。

李士钊

一九八三年五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鲁西北党的活动片断

我的一点早期回忆

申怡之

一九二五年初，我毕业于阳谷县安乐镇完小。同年夏，考入省立聊城二中学习。

一九二五年秋，中共山东省地下党派人来东昌府（聊城）地区发动学生中有志青年去广东黄埔军校学习，当时二中高年级同学王寅生（我表兄）、赵以政、聂子政等相继赴黄埔。王寅生同志是政治系毕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赵以政同志于北伐途中入党，他们都是黄埔四期同学。

一九二六年冬，寅生同志奉党中央指示来山东协助邓恩铭、关向应同志开展地下党活动，发展组织，发动群众，以配合北伐军北上。记得寅生同志回来时由陇海铁路开封站下车，身背一架油印机，首先取道回安乐镇老家。当时正值假期，我经常去表哥家（寅生同志家），他给我介绍了很多有关黄埔军校的情况和革命道理，这对于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寅生同志一身正气，人很豪爽，刚直不阿。他经常说：干革命是脖子上挂着个头，不能怕死。他经

常往返于济南、聊城、阳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在济南高中部学习的杨耕心同志（字一斋，原二中高级班学生，阳谷九都杨人），就是由关向应同志和王寅生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寅生同志在安乐镇又介绍了朱华亭、申梅贞等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王寅生、杨耕心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当时我们经常印刷传单进行革命宣传，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张贴散发各乡村。寅生同志刻版印刷，我主要负责张贴和送出。寅生、耕心同志还在九都杨、宋堤口、郭屯、邵楼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并在九都杨办起了农民政治夜校，寅生同志常去夜校讲演。杨耕心在九都杨发展了三、四名党员，并建立了中共九都杨支部。不久，寅生同志又返黄埔。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策划了“四、一二”大屠杀，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和我二堂兄申仲铭（字兰生，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武汉黄埔分校任教官、共产党员）等奉党的指示，相继回聊城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同年秋，寅生同志再次返乡。我和寅生同志从安乐镇步行来聊城，我俩轮流背着油印机，边走边谈，记得寅生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以及下步的工作打算。到聊城后，把油印机放在了赵以政同志家。以政同志家住在城东关姚园子村，比较僻静安全，以后我们经常在那里印传单开会等。记得有一次，王寅生同志在博平城张贴传单被敌人发觉，博平城戒严，四门落锁，对其大肆搜捕，寅生同志机智地从城西北角越墙逃脱。

一九二七年十月，省委派王寅生，丁君羊、张干民等同志

来聊城筹建鲁西中心县委（鲁西特委），当时寅生同志是省委委员，丁君羊同志是省委宣传部长，张干民同志是团省委秘书长。记得丁君羊同志来聊城时住在二中和我挤一张床睡眠，那时我正准备结婚，他得知后还送我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后来省委遭破坏后，他去东北做地下工作被张作霖抓住，张学良易帜后其叔丁惟汾把他要出来，后去德国留学，现在上海。

建立鲁西县委的会议是在赵以政同志家南屋西套间开的，由寅生同志传达了省委关于建立中共鲁西县委的决定，随后宣布县委组成人员。张干民同志任县委书记，王寅生同志任宣传委员，赵以政为组织委员，聂子政为军事委员，袁果任青年农运委员。鲁西中心县委辖聊城、阳谷、博平、临清、东阿、莘县、东平等县。

鲁西县委建立后，辖区各县及聊城三师，二中相继建立了党团组织。三师校长孙东阁及二中校长李鸿庥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对学生中有志青年的爱国活动听之任之，从不过问，因此党团活动较为活跃。当时三师发展的党员计有宋占一、张廷焕、苏连景（后脱党）、哈相越（后叛变）、二中有刘荫昌、赵儒昌、黄文玉、李景卿、景鹤年（脱党）、许先登（叛变）等。上级党还利用转学的办法派宋怀玉同志来二中领导党团工作，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宋任书记，王筱湖任组织委员，筱湖同志是二七年五月由耕心同志介绍入团的，我任宣传委员。我们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宣传共产主义，揭露旧军阀的黑暗统治，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在我们周围，其中不少同志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如初中六的韩之栋、段君毅、初中七的王路宾、任月桓、刘印昌、张廉方，高年

级的同学景鹤年等同志。还有白秋华、章士林、张似乎等同志，后几位同志都在革命中牺牲了，想起来十分难过。当时聊城是奉军军阀张宗昌统治时期，国共两党都处于地下活动，虽然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方到处残杀共产党人，形势非常恶化，但在聊城，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并不大，在三师和二中死硬分子也只有刘建高、朱之梅等少数几个人，广大进步学生都是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旧历腊月二十三），鲁西县委通过杨耕心同志争取了阳谷北部绿林英雄韩建德、王朝举，一举占领了勾结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的坡里天主教堂。原计划是年三十暴动，但韩、王二人心急如火、迫不及待，独自决定提前行动。鲁西县委得知后，在赵以政同志家里召开紧急县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当即决定派聂子政同志前往任政治部主任，孙大安任军事部主任、申仲铭、宋占一负责宣传工作。申并兼韩建德的秘书，郭庆江负责谍报。共设军事、谍报、宣传、民政、财政、总务等八个处，武装部队由韩建德任司令，王朝举、韩建春、曹万年等八人任副司令，下设八个大队，副司令兼八个大队队长。扩大会议散后，县委负责人赵以政同志指派我用他家的毛驴将申仲铭送到阳谷后梨园王筱湖同志家里，筱湖同志家是我党的联络站，夜间再由王筱湖、杨耕心将申送入坡里教堂。当夜，耕心同志让我去定水镇南崔庄找我的伯父申集盘（申仲铭同志的父亲，开明士绅）说明我二堂哥已进入坡里教堂，让他有精神准备，然后要我留在他处探听消息，一旦有新的情况及时通知暴动部队，因为申集盘当时是阳谷县民团副总团长。

坡里暴动成功以后，接着收缴附近村庄地主的枪支，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扩大政治影响。有志青年和农民纷纷参加暴动队伍。由于坡里暴动，对敌人震动很大，住在聊城的东临道尹陆春元，调集了十余县的军警团队数千人围攻坡里教堂，均被我军击溃。接着山东军阀张宗昌又派被北伐军击溃到鲁西南的河南督军寇英杰的一个正规旅约五千人进攻我军，我伯父申集盘得知消息后，让我给杨耕心、王筱湖送信，以便我军有所准备。我方得知消息后，于二月七日（旧历正月十六）夜有计划地撤出坡里教堂。暴动队伍撤到冠县及河北卫东地区后，遭到直隶督军褚玉璞和张宗昌两部的围攻夹击，终因寡不敌众，我军溃散。这次暴动坚持了二十多天，时间虽短，但革命精神却永垂史册。

坡里暴动后，党的组织暴露了，省委为了保存力量，将王寅生、张千民、宋占一、张廷煥调省工作，由赵以政同志代理鲁西县委书记。通知其他同志视情况暂时隐蔽或外出。杨耕心、申仲铭、聂子政等同志相继外出东北各地谋生，记得耕心同志临走前的一夜是在我家住的，我俩叙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怅然分手了。王筱湖和我没有暴露目标，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回二中读书。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所谓第二次北伐，打败了奉军军阀张宗昌和孙传芳残部，于五月初兵临济南，日本为了保护其在山东的利益也由青岛登陆，随后占领济南，蒋军绕道济南往北进占天津、北京。寅生同志暴动后回省委汇报，随后留在济南工作，就在日本鬼子尚未占领济南张宗昌撤退的前夕，寅生同志有事从城里去鲁丰纱厂，路上因身带手枪被敌人查获，后不久被敌人枪杀于千佛山下，

人民的好儿子，我党的优秀党员王寅生同志为人民光荣牺牲了，遇难时年仅二十四岁。他的英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蒋介石反动派部队进入山东后，国民党反动头目王慕桥等联络地主武装，占领了东昌府城。在敌人占领前，鲁西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学校的同志提前回家，各找存身的地方。我于五月份先回家避难。王慕桥一伙占领东昌后，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一时黑云滚滚，形势极其恶化，六月间得知赵以政同志被王慕桥等枪杀，悲痛万分。由于在家已不安全，随奔泰安避难。

一九三〇年三月，形势稍有好转，我便回到阳谷，由于在泰安期间，我考入一个凿井训练班，所以回阳谷后搞到一个技术工作，在建设局任凿井技术员。

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间，杨耕心、王筱湖等地下党员相继回阳谷，杨耕心通过我伯父申集盘的关系，去阿城镇三高当教员，王筱湖先在安乐镇小学当教员，后来韩之栋推荐他到县民众教育馆平民小学教学。杨、王二人做为地下党员，在暗中宣传党的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等主张。见到他们两人，我又与党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二年，申云浦（我的族爷）、盛北光、韩之栋、朱保明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地下党的中坚分子，阳谷地下党的活动逐渐开展起来。

一九三三年秋，韩之栋（即《红岩》中的华子良）由北京来阳谷指示杨耕心、王筱湖下一步如何开展地下活动，北京地下党出了叛徒告密，蒋介石下通缉令捉拿韩之栋、通缉令下达到安乐镇四区二部，区长王作孚是我伯父申集盘的表兄弟，他把此事告诉了申，集盘伯父马上叫我去马韩庄给韩之栋送信，叫他迅速离开，我于傍晚赶到韩家告知此事，

之栋同志当夜便离家躲避，我在他家住了一夜于次日返回。后来之栋同志终于在外被捕，在狱中佯装疯癫，保存了机密，保存了自己，终于在解放前夕，寻机逃出了敌人的魔掌，直到解放后，我俩才又得以相见。

每当忆及往事，心情总不能安定；尤其是想起那些在艰难岁月中牺牲的同志，寅生同志以政同志等的熟悉身影、音容犹然在目，如果他们能知道今天我们的祖国齐心奔四化的大好形势，也可告慰九泉了。

一九八四十二月

编注：申怡之同志原籍阳谷县安乐镇申刘村人，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现离休于聊城地区水利局。

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

生9。18请愿斗争

谢鑫鹤

1930年夏天，我辞退济南隆吉昌染坊学徒的营生，回到故乡博平。到家后不久，就去聊城投考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前期师范（即初级师范）第八级。这个学校的规模比较大，当时后期师范（即高中师范）有五个班，前期有三个班，八个班共有三百多人。教师中有著名的作家夏丏尊、李俊民、韩侍桁等人，省立三师是鲁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学校距离聊城的南城门很近，学生们每天早上都喜欢到城上或城外护城河边去读书散步。在学校东北角不远的地方，是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杨宅，尽管杨家的藏书已于1929年和1930年内战中，在聊城两次被土匪占城时遭到抢劫和破坏，其主要收藏宋之刻本早于1927年就运到天津了，但是一些爱好文学和历史的同学，由于不断从杨宅门前走过，耳闻目濡一些有关杨氏藏书的历史，使同学们受到很多启示，因为那些古籍代表着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精华，熟悉聊城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座自战国以来就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刻书出版业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传统，文物古迹很多，在山东文化历史上素有“东潍（县）西聊（城）”之称。“左传”上有“聊摄二城，齐之西鄙也”，“鲁仲连贻燕将书”那篇

著名的策论文章，当时就被编入中学的国文教科书上，供大家熟读。

早在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共产党人就已开始在聊城一带活动，并在省立第三师范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支部，有一大批进步的优秀青年学生开始参加革命。1927年10月在聊城城建立的中共鲁西县委，也是先在这学校进步学生们所创办的“平民小学”内开始酝酿，而后才在聊城东关姚家园子正式成立的，这个学校历史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如宋占一、张廷焕等山东著名革命烈士，都是这里1927年的地下党员。

1931年9.18事变前后，党在聊城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了，为了便于领导爱国学生运动，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聊城建立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这个总支就设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之内。

中共鲁西总支的主要任务是：开辟鲁西北几处省立中学内党组织的工作，发展党员，开展学生中的爱国运动，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唤起鲁西北的几处省立中学的进步学生，特别在聊城省立三师和省立二中等校内，领导进步学生开展反日爱国活动。中共鲁西总支的第一任书记是三师后期七级二班的刘子蔚同志，他是鲁西北恩县人，1929年在平原县立中学入党，1931年秋天考入三师的。宣传委员孙方茜，组织委员桑艮阳都是三师后期八级二班的学生。当时党的活动比较活跃，在进步学生中的影响很大，但是在白色恐怖的局势下，党的活动受到的局限很大。为了在进步学生中扩大党的影响，积极开展组织活动，先利用合法手段，开展党的外围组织。首先在进步学生中创

办“读书会”，利用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党的革命主张。“读书会”是一种半公开的进步学生革命团体，参加“读书会”的学生，都是事先经过组织考查，认为他思想上倾向进步，并由一个正式会员介绍，经过批准才能入会。我是1931年上半年由孙芳茜介绍而加入“读书会”的。

在“读书会”中，当时能够流通并看到的书籍有：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也看到“独秀之存”和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屠场”，“石炭王”等，还能看到苏联的进步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等等。左联的期刊如“萌芽”、“奔流”和进步杂志“读书生活”。党刊则能看到“十月”、“红旗”和“苏区赤卫队”等等。这些书刊的秘密流传，使进步学生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那时进步书籍是被禁读的，这类书刊只能在读书会员中秘密流传和互相交换，进步学生们则是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去阅读，是用早晨自习时间，两三个人一伙，每人拿上两本教科书把进步书刊夹到中间，拿到城墙上或护城河边去读。这就使别人看来是当着你在读教科书，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得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进步思想，有了些基本的认识，初步了解些革命的道理。

地下党员通过创办“读书会”，利用交朋友的方式，在会员中选取入团入党的发展对象，以扩大党的组织。我是1931年上半年先由孙芳茜介绍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在三师前期师范毕业前，又被吸收加入

“C、P”（中国共产党）的。我们在入团、入党之前，组织上就派人把发展对象的全部情况，全部进行过秘密了解透之后，再通过介绍人来询问，试探你有没有参加革命的决心和信心，看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待认为条件成熟时党组织便交给你一项任务，让你去完成，并以此来对你进行政治和组织考验，你能经得住考验，然后经党组织批准，才由入党介绍人通知你已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样以后你就可以编入党小组，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了。当时发展党团员，可不象现在一发展就是一大批，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发展新党员工作，特别在9.18事变后，三师学生爆发了爱国学生请愿斗争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培养了一批进步骨干分子。这些人会同我们的党员同志一起，在三师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成为三师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

9.18事变发生时，驻在我国东北的几十万东北军部队，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严令下，主动放弃沈阳，拱手将东北三省让给日本人。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起来呼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遍及各地。这一消息传入聊城省立三师后，全校大部分爱国学生和教职员都义愤填膺，大家纷纷议论，为中国的民族命运和前途担忧。出兵抗日问题成了全校爱国师生的谈话中心。不论在校园、课堂、饭厅和宿舍里，到处都可见到三五成群的爱国学生在一起谈论，如何动员全国军民，发动反日爱国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全国各地抗日高潮的兴起，使第三师范出现了空前未有过的新形势，原来多数学生都不关心政治，也不愿意过问政

治，只是一心读书，毕业后找个小学教师当就满足了。但是经过这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的震动，大家已不能安心读书，在教室里也坐不住了。有的要求投笔从戎，有的要响应平、津、沪、济南各地的学生爱国请愿运动，也要到南京去请愿。也有人主张不能念书啦，干脆回家去。

党总支针对这种新形势，召开了紧急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多数学生对9.18事变的认识是积极的。党组织要不失时机地团结爱国师生一起进行斗争，在全校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以揭露蒋介石政府屈辱的卖国行径，使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深入人心，在斗争中使党员受到考验，提高大家的工作能力，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党总支发动党员同志到广大爱国学生中去，利用谈心摸清楚同学们的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使大家敢于向蒋介石政府进行斗争。

九月二十八日的早饭后，各班的学生自动停课，全校学生都集中到大操场上开会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向学校当局提出到南京去请愿，派代表组成“三师学生请愿团”，加入北平、天津、上海和济南各地到南京请愿的革命活动。总支决定由刘子蔚等同志在会上讲话，进而深入发动学生，通过斗争在学生中提高党的威信，以加强领导三师的学生运动。

上午八点以后，全校的学生大部分到场了，孙芳茜同志从教室里搬来一条凳子，刘子蔚和其他几个同志打了招呼，使大家有了准备，然后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救国的主张，听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有人情绪高涨地喊道：“老刘说的对，我们就是要抗日！不抗日国家就亡了！”

有人喊：“日本人已打到咱们的家门上了，有血性的青年还能坐视不理吗？！”

有人喊：“我们要向平、津、上海和济南的同学们学习，要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他们出兵抗日！”。

要求到南京请愿的倡议，立即得到多数同学的热烈赞同。有人大声喊：“找校长去，要他同意我们到南京请愿！”正在群情激昂的时刻，校长周拔夫，训育主任朱衣仙等人都跑到操场上来了。当爱国学生在操场集合时，早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学生，向学校当局作了报告，说操场上集合了人，要闹事，周拔夫等听后着了忙，立即把训育主任、事务主任等都找了来，他们研究了对策，便到操场上来。

学校当局早已了解到学生们的爱国情绪高涨，进而要公开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但对学生要响应全国各地学生要到南京请愿的意图还不了解，他们最初采取不闻不问，一旦学生集会要上南京请愿，才坐不住了。

三师校长周拔夫，训育主任朱衣仙，事务主任魏孝亭等人都是国民党员。周拔夫是个很圆滑的人他想借故耍点手段来平息这场弥漫全国的政治斗争。他一到场就说：“我迟到了一步，请同学们原谅，我虽不才，爱国之心还是有的。出兵抗日是政府的事，我看政府自有救国的韬略和爱民的方针！”

“有个屁韬略呀！见了日本兵就跑了，还有什么韬略？”有人在群众中议论着，周围的人都笑了。周拔夫继续说：“学生要以发奋读书为本，认真读书第一。听说你们要到南京去请愿，我看没有必要！大家能安心读书就是抗日。现在学校经费支绌，没法承担路费，交通又不方便。我看还是安心读书第一。将来毕业后再说……”

申云浦从人群中喊：“校长既同意‘抗日救国’，我们可不用学校的经费，自己想办法去南京，要求政府坚决抗

日。”周拔夫听了立即变了脸并驳斥众议：“不行，平、津、上海、济南的学生去了都不顶用，你们去了更显不着呀！还是老实地读书吧。我宣布从今天起，如有无故旷课的，一定严加追究！”他扭头回办公室去，学生再去叫也不出头了。这次斗争，他们看到爱国学生的力量，为了怕再闹事，采用了提前放假的办法，强迫学生提前离校。

经过这次为“9.18”事变请愿的斗争之后，使多数爱国师生都同情并支持共产党人的主张。但学校当局和学生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分子，更加注意进步学生的思想动向。1932年春季开学后，学校利用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学生”，暗中侦查进步学生中谁是共产党，训育主任朱衣仙借着晚上查宿舍，偷听学生们说话，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因为这些人在正直学生中没有威信，多数人早不理他们，结果一无所得。当时后期师范七级有个叫祁天良（恩县人）的学生，此人的功课和人品都很坏，屡次自动“降班”留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他和刘子蔚是同乡，他认为刘子蔚上次请愿风潮时在群众中露了面，因之向训育主任报告刘是共产党，周拔夫曾把刘子蔚叫了去，进行恐吓威胁，以试探他是否共产党？因为没有抓着任何证据，他们的讯问都被搪塞过去。此后他们更加注意请愿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进步学生严加控制和种种威胁。在学生中造谣说：“谁沾上共产党的边，都有被逮捕和杀头的危险。”这样使部分爱国学生不敢再参加政治活动了，深怕自己也被牵连进去。为了反击反革命气焰并向他们示威，决定在聊城张贴革命标语，以扩大宣传阵地。

四月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派交通员李振山同志，来聊城传达省委指示。根据当时的形势，省委指示要注意保存自

己并确保组织安全，注意团结依靠群众和斗争策略。刘子蔚同志把当时的工作和准备贴标语的事，都告诉李振山请他汇报省委。他对贴标语的事极为赞同，主动愿意承担写标语的任务，这样可以防止敌人查对书写者的笔迹，以转移其注意力。所以把他安置在学校外面一家小茶馆里，找了一间房子请他在那里住了几天，李振山便在这家小茶馆内写了很多大字标语备用。两天之后，各党小组的组长分别去取标语。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都是单线联系，除总支书记外，其他党员都互不来往，彼此的情况都不了解。当时我和申云浦、桑艮阳（肥城人）三人为一个小组，桑艮阳是组长。标语是他去领的，我们的分工是：申云浦刷浆糊，桑艮阳张贴，我负责放哨。使用的浆糊是通过关系托学校伙房工人办的，把浆糊装进几个旧袜筒内，用时往墙上挤，标语则卷成纸筒，以便于一张一张的进行张贴。

张贴标语的地点，首先是学校后面不远的万寿观子上，出了学校的东北小门，绕过“凤凰嘴”胡同往北走几步就到。时间利用晚上上自习时中间休息时出去。同学们平时都惯于这个时间去遛一圈借以休息并换换空气，晚自习时间训育员查堂也比较松些。

在第一节自习的休息时间摇过铃后，我们三个人便悄悄地遛到万寿观子。这条子上居住的多是地方绅缙之流，也有少数劳苦大众。为了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也写过一些对这些人有针对性的标语。在“凤凰嘴”胡同口出去路南是有名的“狮子头上一座庙”，路北就是聊城“海源阁”杨家的探宅大院。当时驻着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第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部。这是反动政权在聊城的军事指挥中

心所在地，我们有的标语就是专门送给这个驻军旅部的。

我们三个人拉开距离在于上走，我在前面伪装散步的样子，慢慢走观察着前后左右的动静。事先早规定下暗号，一旦发现情况，我就先咳嗽一声通知他们两人，就立即停止工作进行工作，迅速隐蔽，以防暴露。

那天晚上八点多钟还有点凉意，于上很黑空无一人。我走在前面，申云浦在中间刷浆糊，他看准合适的地方，就拿出袜筒往墙上抹几下，贴上一张，我们很快的走到万寿观于，这里是驻军旅部的大门，通过杨宅大门时，可以看到卫兵坐在门上打盹，还哼着淫秽的小调。他根本没注意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抓紧这个时机冲到旅部门外，很快的在旅部大门两旁贴上两条醒目的标语：

“打倒国民党！”

“拥护苏维埃！”

然后我们就迅速的向东面的南大口走去。那天晚上，在总支的统一布置下，有几个党小组的同志都出动了，大家分头在城里的主要于道——楼南、楼东大于和光岳楼下，都贴满红绿纸所写的标语：

“共产党万岁！”

“打倒蒋介石！”

“苏维埃政权万岁！”

“打倒国民党政府！”

在一个傍晚把一些革命标语贴满了聊城城厢之内。在三师校内把标语贴到校长室，训育主任，事务主任的办公室门上，新建的课堂大楼左右和几个重要过道里。第二天早上，同学们都争先恐后的去看新张贴的标语，有的大声朗诵，有的窃

窃私语。校长、训育主任等人都着了慌，他们一面派人扯标语，一面忙乱的训斥学生。接着驻军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给周拔夫打来电话，质问他聊城城内发现共产党的标语，甚至贴到他的旅部门上来，他说已下令全城戒严，搜查贴标语的共产党。他认为这些标语的来源，与第三师范中的学生有关，要求学校彻查并向他报告。学校当局推诿校内的标语都在东墙内，可能是外边爬进来的人贴的。他们把全校学生的作文本都交了来，由他和训育主任朱衣仙，特务学生祁天良等一伙子，拿着标语的字体来查对笔迹。但是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想得的结果，只能不了了之。可是这一次张贴革命标语，鼓舞了爱国学生的情绪，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张贴革命标语的事件，震动了聊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旅部。他们摸不清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人在聊城活动。为了加强戒备，原来四个城门各有两个卫兵把守，后来增成四个卫兵搜查过往行人。城里也增派了巡逻队，日夜加紧防范学生的爱国活动。

1932年冬天到1933年春季，聊城第三师范的地下革命组织，又继续在聊城城里发动推水工人，要求增加“推水费”的罢工运动。当时聊城的井水是西关大堤口的“西关井”水最好，城内的大户都用自己的马车往西关去拉水供生活用。有些大商店和住户则靠“买水”生活，每车水只有五分钱。推水工人收入低，生活极度困难。我们在鲁西总支的领导下。利用星期日对推水车的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作了大量工作，直到1933年春天，这次斗争虽然经过多次酝酿，后来省委遭到叛徒的出卖和破坏，聊

城地下革命工作受到影响，可惜未能正式形成一次群众性示威运动，而告其终。

1932年冬天，正当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时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理论，借此对共产党和爱国人民进行镇压。这种反动说法一出头，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学校的国民党反动派学生，却因此找到理论根据而拍手称快！乘机大肆宣传，为他们的卖国求荣作辩解。为了进一步揭露其虚伪性和反动阴谋，地下党为确保安全不暴露组织的前提下，在各班级利用合法的场合与之展开斗争，在第三师范又掀起了一场班级性的政治辩论活动。我们在进步学生中作秘密宣传，讲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通过群众性的大辩论，打击反动派的气焰。每当有人宣传这种反动政策，我们总要发动群众，把他们驳得张口结舌，理屈辞穷。

后来这场辩论，不只进步的学生们参加，连部分进步教师也参加了。有位历史教师龚书筹（地下党员，上课时经常讲唯物辩证法）在上课的时候，公开讲述北宋抗金英雄岳飞受到卖国汉奸秦桧的陷害，因而使国家灭亡的故事来启发大家，他把蒋介石比作秦桧，指出他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要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和历史上的秦桧谋害岳飞是出于同一根源。这场辩论持续地搞了几个月，极大的启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性。经过这几次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使地下党组织在省立第三师范和其他地方都迅速得到发展壮大。

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半个世纪多以来，是鲁西北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五三

惨案”到“九、一八”事变，这里的爱国学生都卷入革命的风暴之中。不仅震动了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鲁西北的反动统治，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大量的有用的人才。

1933年，中共山东省党组织又为叛徒出卖，遭到很大的破坏，但鲁西北的党组织始终未受到波及。一度归中共直南特委刘晏春同志领导，继续坚持地下革命活动并发展党的组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黎玉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在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北地区建立了先后以赵健民、徐运北同志为书记的鲁西北特委，各县都建立了工委和县委我当时曾任博平县委书记，申云浦同志任阳谷县委书记，王晋亭同志先后任特委巡视员和组织部长，刘子蔚同志任恩县工委书记。这些都是聊城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

1939年春天以张霖之同志为首的中共鲁西区党委建成后，我们在博平、茌平、清平、聊城、阳谷、东阿六个县建立了中共运东地委，中共山东省委任命我为第一任地委书记。这是共产党在鲁西北建立的第一个地委，之后，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更加艰苦的斗争阶段。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46年1月1日围攻盘踞在聊城的汉奸国民党合流的伪顽部队，直到1947年1月1日我晋冀鲁豫八路军杨勇和张霖之同志所率领的第七纵队解放聊城，到1949年春夏南下参加解放大江南北各地以及到解放贵州，我都一直坚持在鲁西北一带的革命斗争。

现在回忆我自1930年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习，1931年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到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在回忆往事，缅怀革命先烈的时候，应当向为鲁西北的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我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三师范——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殷切盼望年青一代的教师学生们，要继承这个学校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

1979年11月于北京

编注：谢鑫鹤同志系山东省茌平县（原博平县）谢天贡庄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贵州省委付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付秘书长。第二轻工业部付部长、党组付书记。轻工业部付部长、付书记、第一常务付部长。

跋山涉水去延安

周乐亭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我在聊城政训处认识了从延安来的干部张杨同志，她对我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世界”，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荟萃之地。在那里到处都能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处处呈现出团结活泼的气氛和朝气蓬勃的景象，并建议我到延安抗大去学一期。恰好，政训处（中共鲁西北特委）正准备挑选一批干部以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范筑先将军的名义，送到抗大去培训。我向领导表达了我想去的愿望。（注）

五月中旬，政训处确定少校干事刁子言（邵子言）、上尉服务员晋士林、陈中民、隋家干（李燧英）、赵培同、冯国英等和我共十人为一组，由刁子言带队，前去延安，预定到商邱乘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那里去延安。为了便于路上行动，我们以去西安公干为合法名义，着军官服装，持可在全国通行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的护照。

行前，刁子言同志因事暂留聊城，我们九人到达东阿县黄河渡口时，得知日军大举进攻徐州，徐州至商邱的火车不通了。我们在渡口停了几天，等待通车。但国民党的军队接连败退，通车无望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返回聊城待机西去；一是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长途跋涉，向商邱以西步行，一直走到能通车的地方。经过协商，一致

同意步行西去。于是我们雇了一辆独轮车推行李，唱着救亡歌曲，兴致勃勃地向前走去。

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某小镇的一个小客店里，席地而睡。夜里突然被人唤醒，只见几个民团团丁用步枪对着我们，盘查我们的来历。我们给他们看了护照，说明只借宿一晚，明早起程，交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离去。经过这场虚惊，我们预感到前程还将遇到艰险。

进入河南省境之后，在某一小镇上休息一天。有两个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来到我们住的小店里，与我们交谈并劝我们去参加中央军，他说我们这些有志青年，到了中央军，既能为国效劳，又能发挥个人才能。我们给他看了护照说是奉命到西安公干，有任务在身，必须按时前往。他笑笑说：“西安既没有你们的军队驻防，又没有你们的办事处，有何公干？显然是经过西安，到延安去的。现国军与日军正进行会战。最好就近参加徐州会战。”我们再三说明是去西安，不是去延安，他才离去。不料，我们走了一天之后，又和他住在同一个客店里。他仍劝说我们和他一起走，到他们的部队里去。我们和他讲理，坚持不跟他去。他改了和蔼的态度，板起面孔，骂道：“中国之所以亡国，就亡在一些好高骛远的青年人的手里。他们口称救国，但放在眼前的徐州会战不参加，而到远离前线的延安，去投靠共产党。”然后悻悻而去。虽然他猜中了我们的去向，但我们正在去西安的路上，他不能证明我们的行止。故纠缠了一阵，只好罢休。

又走了一天，当经过某一大村庄时，村民告诉我们，日军昨天曾在该村住宿，并拿出日军遗弃的一些物品给我们看。我们询问陇海路上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只知国军和日

军，最近几天都从这一带走过。我们考虑到这一带是战区，靠近陇海路西行不安全，又不甘心返回聊城，于是停下来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最后议定：南下许昌，由许昌乘火车至郑州，由郑州转车去西安，倘郑州亦不通车，则由许昌南下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新四军去。

到了许昌之后，得知郑洲通车，心中非常高兴，未做停留，即乘上北去火车，到了郑州，未出车站，立即乘上西去的火车。到了西安，进入八路军办事处，一路紧张的心情，才缓和下来。因一路辛劳，便向接待我们的那位同志提出，在西安休息二、三天。他说可以，并告诉我们，要立即改穿便服，否则国民党可以擅自来西安为理由，公开逮捕我们。办事处也不便营救，因他们会说，逮捕的是第三集团军的人，与八路军无关。他还说，为了我们的安全，最好不要到外面游逛。因之，虽然西安有许多古迹名胜，我们都未游览，休息了两天，继续徒步向延安进发。

我们走到三原县城，在南门又受到国民党门卫的留难，他们再三劝我们到国民党的青年训练班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纠缠才肯放行。我们出了三原北门，心神不安地继续北去。虽然渡渭河时，看到泾渭两河相交之后，数十米远仍清浊分明，即常说的“泾渭分明”的奇景，西延公路上，左为葱葱的山林，右为清清的河水的蜿蜒路段，还有中部县的黄陵，我们都无心欣赏和游览，一股劲地向前行进，以便及早进入八路军的防区。

大约走了六、七天，终于到达我们朝思暮想的中国革命圣地——古城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学习。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毕业后，队领导对我们说：“范筑先将军已经牺

牲了，不一定回鲁西北了”，号召我们参加八路军，到由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领导过的红军第一军团改编的一一五师工作，我们听了十分高兴。除晋士林、陈中民仍回鲁西北筑先纵队外，我们七人都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员干部，一九三九年春随陈光代师长、罗荣桓代政委东进，又回到山东地区。

注：当时鲁西北特委尚未公开，对外用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的名义。

一九八六年一月

编注：周乐享同志系聊城城关姚家园子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八二年离休。

中共省立聊城师范党支部在 济宁乡建练训处的活动

周乐亭

一九三六年初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下令，调省立五个高级师范和三个乡村师范的应届毕业生到济宁集训，名曰：“山东八校师范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兼任处长，乡建派的实权人物，乡建实验区的专员梁仲华任副处长，主持这一次训练。主讲人是乡建派的领袖梁漱溟。

乡建派的理论是“乡建救国论”，即从乡村建设着手，使中国富强起来。所采用的方法：把县政府下面的区公所，改为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乡校设校长、教导主任、指导员、事务员及军事教练各一人。乡校的主要工作是对本区的地主子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三个月为一期，每期四十人，自带步枪及子弹。在校的这四十个人，就是乡校的常备武装力量。已毕业的学员，是乡校的后备力量，定期到乡校接受检阅。如有匪患，就到乡校集合，与在校生共同去作战。其次是开办一些小工厂、合作社以及办好初级小学等。

山东省共有一百多个县，每县有若干个区，每个区要配备五名干部，这就需要大量的干部。调这一届毕业的八校师

范生集训，就是解决干部来源的方法之一。

为了促使这一届的学生都去参加集训，省教育厅规定了几条：

（一）本届毕业生一律参加集训（六个月），集训完毕后，发给毕业证书；

（二）集训后自愿从事乡建工作者，再到乡校实习三个月，然后由训练处分配工作，~~海~~师的学生，可取得大专的学历；

（三）不参加集训者，不发给毕业证书。

这年三月，我们聊城师范九级的学生一百余人，来到济宁，住在潘家花园军营内，接受训练。前三个月是军训期，班、排、连长都是从韩复榘的部队中派来的，用训练新兵的一套办法来训练我们，管理既严，操练又苦又累，再加上一部分排、连干部的态度粗暴，在操场上常与学生发生口角；引起多数学生集训不满。

训练处的军事主任是意大利某军校毕业的，他宣扬法西斯蒂（当时翻译英文法西斯为法西斯蒂）的精神，强调军队要绝对服从。在一次会操中，由于天气太热，站立的时间长，一个学生晕倒在地，站在他附近的人忙去抢救和观看，队形紊乱。他竟大声说：没有命令不准动，为了练好兵死几个人没有关系，并发出“立正”的口令。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怒。聊城师范党支部的负责人盛北光同志，抓住这一时机，一面跺脚，一面大声说：保证生命安全，反对法西斯奴化教育。顿时全场发出一片跺脚声和呼喊声，使军事主任狼狈不堪。政治主任陈亚三迅速出面劝慰，一场风波，暂告平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处方撤掉了该军事主任，换了一个表面

和善的张主任，那一部分态度粗暴的连、排干部，也不象以前那样凶了。盛北光同志就是这样巧妙地掀起了一次学潮，自己也没有暴露，取得了打击法西斯蒂气焰的一次胜利。

三个月的军训结束后，转入政治教育，由梁漱溟讲授乡村建设这门主课。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讲的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达到世界大同。但中国的社会没有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之，共产党在中国推行马克思主义行不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讲的很好听，但不能救中国。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当前农民直接受到的威胁是匪患。所以消除土匪，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富有起来，办好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由县教育局管），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把乡村建设好，才是救中国之道。热心救国的青年，应当投入到乡村运动中去。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向华北进逼，“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高潮正向全国深入，上海各界救国会大声疾呼，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但在训练处讲课的教授们，只讲各自的专业，不讲抗日。

潘家花园的营房后面，有一片北伐时阵亡烈士的墓地。每天晚饭后和星期日学生们常到那里去散步谈天。有的赞同梁漱溟的理论，有的说中国明明有阶级，他硬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不符合现实。有些国民党员则大讲“攘外必先安内”、“抗战必先剿共”的谬论，胡说国民政府之所以不能对日作战，是由于共产党制造内乱，牵制了中央军的力量。

根据上述情况，聊城师范党支部的负责人盛北光和宋秋潭同志对我说，我们要利用这一场合，宣传我党的主张，反

驳国民党及梁漱溟的错误言论。咱们各自选择思想较进步的同学，进行个别交谈，先从抗日救国谈起，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以当前中国的各种力量，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经过几次交谈，做到观点一致，感情融合之后，再谈中国的社会性质，现有的各个阶级。说明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剥削阶级不劳而食。要使国家富强起来，最根本的方法是消灭剥削阶级，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然后再说明，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已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将来还要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注这是人类最高的理想。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要走这一条道路，最后达到世界大同。）

为了交谈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盛北光同志要我订阅《新生》等报刊和生活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我一面阅读这些书刊，一面用邹韬奋、杜重远、薛暮桥等爱国人士文章中的论点，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当遇到对方提出的问题，我不能答复时，便去请示盛北光和宋秋潭，他们便给我答复或指定我看有关书刊。

当时潘家花园内，乡建派、国民党及共产党各自宣传本党派的主张，三家争鸣，思想活跃，斗争复杂。当时我党处于非法地位，不能公开的直接的宣传党的主张，也不能公开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和他们争论，只能借用上海各界救国会及后来被称为“七君子”的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等人的言论及文章进行宣传 and 争论。对于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

内”，“抗日必先剿共”的理论，由于反共比较露骨，在学生里面已不得人心，相信的人不多。而梁漱溟的“中国没有阶级”、“防匪保家，发展农村经济、教育”的救国之道，则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所以，当时主要工作，在于揭露乡建派的欺骗性。

在交谈中，我们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各个阶级的现状，反驳梁漱溟的“中国没有阶级”的谬论。并指出办乡农学校，名曰防匪保家，实际上是为军阀韩复榘效劳的。因为韩复榘拥兵自为，既反共又抗蒋（介石），颇感兵力不足。要扩编，一是蒋介石不允许，二是缺乏军费。采用这种“寓兵于农”的方法，平时不花军费，战时可扩编军队。所以韩复榘对他以贵宾相待，下令推行他的办法。现在大敌当前，他们只讲保家防匪，不讲抗日，不抗日，怎能保家。

针对训练处政治主任陈亚三在讲“精神陶炼”课时说的，“为什么大家现在这样想看共产党的书，想了解共产党的情况，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清楚了。一句流行的俗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来’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他用这种庸俗的例子说明，人得不到的东西就是好的，就越想得到，来解释青年们对共产党的向往和追求。我们进而说明了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

针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我们则强调，全国一致对外，共同对日作战，内战自停。并举例说：一家兄弟二人，正在打架，一个强盗跳墙而入，兄弟二人是立即停止打架，共同打强盗好呢，还是兄弟二人争个胜负之后，再打强盗好呢！通过交谈，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

题。这年十一月，集训结束。我们含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潘家花园，到菏泽专区各乡校实习。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和我们交谈过的一些同学，有的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一九三八年我们在延安抗大相见时，畅谈往事，十分高兴。

现在回忆起来，深感当时在我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阻挠和限制的情况下，邹韬奋等爱国人士开办生活书店，出版进步报刊，发表抗日救国的言论，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引导知识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都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的已故总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同志在统战工作上的一个无形的纪念碑。

注：当时把“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译成“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四日

关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是 怎样创建的——重要史料

牛连文口述

李士钊笔记

（一）第三集团军政训处的建立。

1937年9月中旬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适应战时体制需要成立政训处，为了抵制蒋介石派他的嫡系人员来参予这项重要措施，乃聘请冯玉祥将军部队西北军系统著名左派爱国人士余心清先生（安徽安庆人，1898—1966。曾任冯的秘书长，1953年冬作为冯的代表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出任政训处长，同时成立了“第三集团军政治人员训练所”，延揽由北平天津流亡来山东的进步教授和爱国文化人为教师，登报招收平津大中学流亡到济南的学生，部分山东留日学生和山东本地的大中学生和爱国青年入所受训。当时以著名左派教授黄松龄为教务主任，齐燕铭、陈北鸥为教务员，许德瑗、李续刚等人为教师。大量培养军队和地方上需要的抗日救亡干部，学员中包括本地的和外来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与其他各界爱国青年，在日寇大军压境的紧急形势下，多少青年都纷纷投笔从戎，加入抗日战争的行列。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第三集团军的五个师（第20师孙桐萱

部，22师谷良民部，29师曹福林部，74师李汉章部，81师展春堂部以及手枪旅吴化文部。）和六个专署（第一专区菏泽，第二专区济宁，第三专区临沂，第四专区临清，第五专区惠民，第六专区聊城……）都相继成立了政训处，有些师长和专员都自己找了人担任政训处长，如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请了留美学生原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孙芳时（聊城人，一八九八——一九三九）任政训处长，聊城专署范筑先派他的秘书张维翰担任政训处长。由济南政训处派到各专署去的青年，都被顶回来了。许德瑗曾被派到临清第四专署专员赵仁泉（河北雄县人，解放后由北京解回原籍，已被镇压）部去过，周子明和王乐亭等同志就都是被赵仁泉顶回来又转到聊城政训处的。

我在济南曾去找余心清处长谈聊城成立第六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成立政训处的问题。余在北京冯玉祥任陆军十一师师长时代、曾是干部子弟学校——育德中学的校长，是我的老师。他提出政训处正副主任的人选条件：以与山东省政府和第三集团军总部与范筑先有关系的抗日青年为主。我向余推范的秘书张维翰（馆陶人，一九〇九——一九七九也是北京育德中学的学生）和韩复榘的中将顾问姚以价将军的儿子——留日学生——姚第鸿（山西河津人，一九一一——一九三八）为正付处长，余心清了解张维翰是和范同村西北军军长张维玺的胞弟，姚以价和范筑先有私交，对这两个人选都表示同意，随即为他们两人办理了委任手续，张是处长，姚不叫付处长而叫司令部的中校秘书，这样更有利于进行各项工作。

政训所的学员在入校受训两个星期后，就开始向各专区

分配人员。当时决定由黄松龄，齐燕铭，陈北鸥等人带领240个政训所学员到聊城第六专员公署所属的十二个县去工作，每个县都成立政训处办事处，各派二十个人去。

六区司令部政训处长是上校，付处长是中校（缺），下设军事、宣传、组织几个部门（不叫科）各设少校干事一人。所有全体青年干部都一律称“上尉服务员”每个县的办事处由一位少校干事负责工作。这些人员都是由齐燕铭同志在政训所中挑选：政治思想进步和抗日态度坚决的二百多位青年去聊城。我先用长途电话向聊城范筑先专员作了口头报告，（那时聊城正准备成立政训处，处长由专署视导室主任王见行担任，以后又由专署第四科长（教育）乡建派朱芑汀兼任，但当时还未搭成架子），经范同意后，我就请张维翰到政训所对要到聊城工作的学员作了动员报告，向大家介绍范筑先为人忠正廉明，对抗战有决心，热情高等等，我们的发言很受听众欢迎，这时平津流亡学生中的骨干负责人刘子荣（博平人，中国大学学生）和我见了面。以后又介绍刁子言（平原人，现名邵子言，留日学生），管大同（潍县人，一九一三——一九八一，中国大学学生），冯基民（惠民人，留日学生），解彭年（堂邑人，一九〇八——一九七九，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和张舒礼（济南人，现名张绍光，中国大学学生）等人和我见面。

我在济南找山东省公路局刘熙众为我们安排汽车，介绍大家向聊城进军。共分三批出发：第一批由刁子言为领队，第二批由于汇川为领队，第三批由张维翰和姚弟鸿为领队。第一批十月十五日由济南出发的，大家到聊城后都住入状元街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里。第二批由管大同率领

十七日到聊城。范筑先以最热诚的激情欢迎大家的莅临，第三批是由姚弟鸿同志为领队的，他们是十月二十六日才由济南动身，二十七日刚到了黄河大堤上的官庄，范筑先就已奉韩复榘的命令率部退到官庄了。

政训处第一二批学生到聊城后，立即和当地以徐运北，王智亭等地下共产党员与民先队队员等有关同志接上关系，组织群众开大会、鼓舞大家的抗战情绪，教唱救亡歌曲，出墙报，演出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等，使聊城的抗战局面顿时活跃起来。这些场面是从政训处人员十月中旬到聊城至十月二十七日早晨，范筑先专员率队退出聊城之前，把聊城县长一职交由张维翰代理，还发给政训处部分不退走的同志们枪枝弹药和给养，这就成为后来著名的“四十二人守聊城”的前奏，原二十九军冀东保安队的一个连长齐子修，这时由十几个人滚成几十个人，攻进聊城缴了他们的枪，打开监狱放出一些囚犯，抢了当铺之后又退走了。聊城曾一度是由政训处留下来的同志们固守并坚持下来的。

（二）范筑先将军在博平发出“皓”电前后

范筑先专员在十月二十七日率领原第六区专员公署干部，退到长清境内黄河大堤上的官庄时，开始和济南派来的第三批政训处的干部、学员们会唔，我不在场。但十一月初当日寇已打过德州，山东北部局势紧张时，范筑先曾被韩复榘任命为“津浦路北段总指挥”以牵制黄河以北的敌人，同时又被任命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

当范司令在武城收编流散的二十九军保安队连长齐子修为第四营后回到聊城时，当时曾召开专署所属全体人员的紧

急会议，事先曾从济南给我打电话，要我把黄河以北的敌情和布署告诉他，并嘱咐我转报复韩渠：“黄河以北的军民抗战情绪很高，对抗战工作大有可为。”这时我在济南已向韩作了口头汇报，并请他大力支援我们以军械和饷项等军用物资。

在范决定走不走的关键时刻，他曾向专署人员坚决表示：“现在我已决定抗战不再南退了。大家谁感到有困难的，可以请便。”后来他在博平西关一家小店里住宿，由专署秘书后来司令部的秘书处长张×潜（沂水人，号孟龙，一九〇五——一九六九）两个人在午夜反复不成寐的情况下，共同商量拟定的“皓”电（十一月十九日）声明“自己决心不退渡黄河以南”。这个鲁西北抗战史上的著名重要文献，是我在济南发出，先在济南的几家报纸上刊布，又发往南京武汉和全国各地。范筑先经过十月廿七日退聊城，到打高唐夏津收编齐子修回聊城的一段波折决心不走之前，对整个局面需要重新布署，才又由张维翰同志把聊城政训处的青年干部，陆续分发到六区专署所属的各县去的。这时各县的旧政权人员，有的多已溃散逃离，范司令才又先后任命管大同为寿张县长，徐茂里为阳谷县长，吕世隆为莘县县长，在旧政权的骨架上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重新建立抗日政权。这时范司令亲临各县指挥军事。调动抗日力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鼓励很大，并开始奠定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三）韩复榘对范筑先的政治态度

范筑先是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之前，在西北军张维玺部任参赞时，和西北军冯玉祥将军以及一些高级将领相识的。

“九、一八”事变后到山东韩复榘部任参议起到沂水，临沂，再到沂水任县长以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聊城任专员等职，也是由张维玺向韩推荐而来的，韩对范一向很尊重并信任，平常都称范为“大哥”和“范先生”。

在范筑先发表了“皓”电后，韩对他的态度仍然表示很好，希望他能坚持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抗战，对整个山东局势有利。韩曾对我说：“老范有何具体困难，总部可以随时大力支援。”当冯玉祥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节济南，指挥津浦路北段的抗战军事时，范曾专程到过济南谒见冯玉祥将军，请“冯先生”对他在鲁西北的抗战工作进行剴切的指导，范是在津浦宾馆看过冯玉祥将军的。

当日军十月初攻打到禹城平原一带的老黄河崖时，济南的局势已开始动荡，我们知道济南将站不住脚了，今后的出路只有留在山东敌后打游击，可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军事经验，我和当时在省政训所工作的赵伊坪同志，一同去找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张霖之同志进行商谈。有一次在济南小纬五路管大同的叔叔管小峰先生家由赵伊坪介绍我和管大同、冯基民，王幼平等见面，张霖之同志也在座。

我们还在济南经三路纬九路西路北的海德里二号姚第鸿同志的父亲姚以价将军家见面并联系工作。介绍张霖之到聊城政训处任军事干事的介绍信，就是在姚第鸿同志的家里写的。

我的职务原来是六区专署机关的庶务主任，抗战后在济南担任联络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工作，范司令任命我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并责成我专搞部队的后勤工作和山东省政府与第三集团军总部联系，保证物资供应，并向各方面拉干

部，组织各种人才到聊城来，一切工作都叫我全权处理。

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总部未退出济南之前，我几次去见他要求对聊城方面进行补给，他亲手批示发给我们几批军用物资：第一次发给弹药五万发，其中包括手枪子弹，手榴弹，步枪子弹和迫击炮弹等。当韩复榘住千佛山上的西院外一个别墅时，我曾去看过他，他说：“可以把山东省库券的库存，全部交给范，黄河以北的粮券也可以全部交给范。”在济南撤退前的十二月中旬，我从济南商埠经六路大仓库领到两千身棉大衣，棉军服（成套）可以要多少拉多少。这个期间我用山东省公路局的十辆大卡车拉了五趟到聊城，政训处的全体同志们穿的棉大衣等军服，就都是我经手拉回来的。不久之后，韩复榘退出济南之前，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山东民国日报”停刊，人员撤走。余心清曾派齐燕铭，赵伊坪等人接管了全部印刷工具，创办了“救国导报”（日报）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撤守前夕，成为山东当时仅有的一张报纸了。韩在退出济南前，曾命令他的部队把进德会和裕鲁当铺全部烧掉。

当韩复榘退到济宁时到济南南门里潘家大楼院内，我和张郁光，齐燕铭，张霖之，赵伊坪同志等也退到济宁。又去找韩复榘要军用物资，我想要机关枪，他发几百桶汽油，部分现款和手榴弹给我们。在韩由济宁退走之前，我们几个商量，要利用我和韩的私谊，尽一切可能向韩要些军用物资，作为开展游击战争之用。张友渔当时另有别的任务没有到济宁来。

在韩复榘再一步退到曹县时，我又去看他，这时我在韩

的形迹上发现自己已经失望了。我曾问他：“如果你离开山东该怎么办呢？”他对我说：“希望老范坚持到明年春天不退出黄河以北。明年春天我们可以反攻济南。”这时他又给了我们卡车、现款和子弹等补给物资。我在曹县看望韩复榘的目的：想从他的部队里搞些枪支和弹药，希望他能留给我们一批人和枪支。当我想再去看他时，知道他已在开封被扣并解往武汉去了，那时曹县的秩序很乱。那里由韩的廿二师师长孙桐萱在曹县出面维持秩序。

后来我们由廿二师谷良民部队买来廿二挺机关枪，并由冯惊涛、高谊之等人到十支队来组织成十支队机枪营。买这些枪支的经费是由政训处每个工作人员（干事和服务员）捐出一个月的生活津贴，寿张政训处撤出时管大同带出一部分现款，还有范筑先夫人和张维翰都捐出一些钱，总共凑成二千八百元现金。这些枪支的到来，才使我们的第十支队在军事装备上有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曹县之行的目的，除了看当时的政治形势外，更重要的是想尽可能搞到一些必要的军事物资。由于曹县山东省政府的临时驻地已陷于混乱之中，我乃回聊城向范汇报形势，范当时本想给蒋介石打电报支持韩的，后来经过有人劝阻才未果的。

（四）在武汉会见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同志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范司令派张郁光，刘子荣和我三个人，代表他到武汉找蒋介石解决鲁西北抗日部队的编制和供应问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复兴社分子和沈鸿烈等人在武汉到处宣传“聊城已经很红了”，“山东已红了半个天”等

攻击之词，使我们对于武汉之行取得如何的效果和影响信心不大。深恐解决不了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去武汉之前曾和张霖之同志研究过，他叫我们过河南确山时下车，找八路军驻河南办事处的彭雪枫同志，雪枫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到过聊城，代表中共中央联络部对范筑先将军进行过统战工作的安排，后来他曾任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主任，赵伊坪曾专门去看他并阅读了党的一批重要文件，回山东后作了传达。我们过确山时曾下车找过彭雪枫同志，和他商谈如何坚持和巩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向他说明范筑先将军在山东抗日军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能够充分发动群众进入战争，彭雪枫同志盼望我们在山东河北边境一带和八路军129师付师长徐向前同志就近取得联系。

彭雪枫同志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叫我们到武汉找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当时任政治部付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我们到汉口后住在中南饭店后，即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首先见到了负责山东工作的张经武同志，也见到霍炳辉和王梓本同志等人。张经武说，他去冬曾代表中央找过韩复榘，通过韩的亲戚山东省公路局刘熙众见到韩本人一次，当时韩对抗战前途与国共合作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我们到汉口时所抱的希望也不很大，总的目的在于争取些军事物资以开拓根据地，曾分别访问蒋介石、何应钦，冯玉祥，白崇禧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和西北军的张维玺等人，一切都是希望得到多方面的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孔祥熙曾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接见“敌后代表”的名义，招待过我们三个人一次。我也单独去谒见冯玉祥将军和西北军的老将鹿钟麟两位长者，他们都表示“说不上话”，并说若由他

们出面说了话，反而会增加困难。何应钦的态度最不好，蒋介石根本不想见我们，而是指定由何应钦代表他出面接见的。当时沈鸿烈已到山东任省府主席两个多月了，他不同意范派我们三人去汉口活动，沈曾给何应钦发过电报对范进行诽谤和攻击。因之我们三个人去见他时，他早已有了成见而大为不利。结果只给了我们五万颗手榴弹和五万元现款，和一套五万分之一的山东全省军用地图。为了顺利的领到这些东西，我们还大加破钞宴请了包括军需署长在内的一大桌客人，进行拉拢和送礼品，否则领款和物资都是不会顺利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全国学联在汉口开会，黄松龄同志介绍我们去向大会全体出席人员，作过《关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经过》的报告，因为其中谈到平津流亡学生在山东敌后所起的杰出和骨干作用时，有许多与会人员，对于他们的政治情况都十分熟悉，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会后很多代表找我们问长问短，打听他们所熟悉的朋友们的下落和信息，他们后来以极大的热情送给我们一大批书刊画报等精神粮食。如：“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中苏文化”，“反攻”半月刊，“时事类编”，“战歌”半月刊，“救国时报”以及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大公报等报刊，我们带回山东聊城之后，同志们都迫不及待的竞相传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见闻。

此外我们还通过张郁光同志的爱人李昆源同志（临沂人，北京女师大毕业，共产党员，当时在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工作）的亲戚关系，找到了她的表姐夫原北平市市长，廿九军付军长秦德纯（山东沂水人）作桥梁，帮助我们弄到一批医药和器材，并帮助我们举行过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大

家都热情的帮助我们进行宣传，在报刊上发表新闻和访问记，这时正有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由徐州、台儿庄等地采访回来，正酝酿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其中《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蠡等几位朋友，为我们出力最大，大家的宣传工作对我们作了最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时我们这时也冷静的观察国民党政府的反应与对我们态度。

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和张经武同志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关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关怀的。他们帮助我们先后介绍了许多重要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使我们进一步得到各方面的支援。我曾向周恩来同志要求介绍有军事经验的人才到鲁西北来帮助我们开辟工作。周恩来同志曾介绍了老红军干部袁仲贤（长沙人，一九〇五——一九五七，黄埔一期学生，曾参加过湖南秋收起义和长征）、周子珊，杜淑山，曹洪胜等几位同志和我们一道回聊城来。最初原想以袁仲贤同志担任范的参谋长的，因为那时早已公布原保安司令部的中校参谋王金祥为参谋长（寿光人，保定军校八期学生，曾任东北军郭松龄的营长和秦皇岛市的警察局长），只能给袁仲贤以“少将高级参谋”的名义，参加军事机要工作。他到聊城不久，就随同范司令到濮县前沿参加了侧击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进攻徐州会战的战役，取得很大的成果。

另外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这前后还陆续介绍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刘子毅，中国大学学生任仲夷、王玄，以及北京大学学生朱穆之、张昭训（莫循）南开大学的何方、陈力、黄煜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聊城工作。

我们由武汉回聊城时，押运了领来的手榴弹，药品，电

台和通讯器材、还用四百元现金买来一部能照 400分之一秒的德国蔡司厂出品的120照相机和100个120 型胶卷。这个工具以后成为我和姚弟鸿、李士钊等三个人所经常用来拍摄下不少，鲁西北抗日历史场面珍贵记录的重要武器。可惜在十一月十五日聊城战役中丢失了。

我们四月间由汉口回聊城过曹县时，早已知道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对范筑先在黄河南北与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中，已经创造了一个驰名中外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感到头疼和不安；再加上国民党 C C分子、中统、军统和三青团分子包围他、使之造成很深的成见。沈鸿烈本来是个“光杆主席”，自己没有政治班底，更没有可靠的军队。他手下只有从青岛退出来的少数海军陆战队和警察作他的警卫部队，后来收编了韩复榘的手枪旅吴化文部队。作基干部队还曾想把我们的几万抗日游击部队，改编为十个团由他指挥，当然遭到我们的强烈反对。

我们回聊城后，向范司令汇报了武汉之行的见闻和各种政治情况；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和进步舆论在真正支持我们；而蒋介石一伙对我们的态度，则是防范和限制，令人大为失望。从此以后，范筑先更加坚信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真正可靠的朋友。等到沈鸿烈六月底由东阿被日本侵略军攻击时，几乎为日寇所生俘，范筑先指挥自己的部队把他抢救下来。沈到聊城后，虽然也举行几千群众的欢迎大会，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站在群众队伍中，领导大家高呼：“拥护范司令领导抗战！”、“巩固与扩大鲁西北抗日政权！”、“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口号时，使沈感到十分忐忑不安，范与沈之间的政治道路分歧，此

后，就更加明朗化了。

我过曹县时，沈鸿烈曾找我说过话，他说要派胡学仁等十多个人到黄河以北的鲁西北各县去进行视察。他们先到了聊城，名义叫“省府视察团”，又到过高唐、恩县，武城各地去了一趟。胡所到之处，他处处可以看出范筑先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听说各县的会道门和红枪会都列队出来欢迎范筑先。恩县王德三（外号“高粱楂”）也领着胡学仁到处看了一遍，胡得出的印象：看出范筑先真正是群众的领袖，使胡很感到敬畏。后来胡由濮县过黄河经菏泽回到曹县时，向沈鸿烈作了报告，说范筑先在人民群众中，象神话般的人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沈这时又曾想收买范筑先，在聊城设立“山东省政府主席聊城行辕”，任命范筑先为主任，他的内弟胡学仁为付主任。除了安排军统特务殷冠之为第二科长外，还吸收我们延安来的干部、抗大学生、老红军胡耀奇为科长，并找韩复榘时代的民政厅长李树椿从范的内部进行瓦解工作。因为王金祥和李树椿都是保定军校出身的职业军人，后来听说王金祥是梁漱溟介绍来的，实际上范殉职后确实起了分化瓦解作用。

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在曹县时，处处与八路军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为难，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和郭洪涛同志等人过曹县去山东工作时，曹县的群众在地下党的号召下在东关召开欢迎大会，因为有的人在会上高呼“八路军万岁！”的口号，后来被他们驱逐出境，是我设法找了汽车把他们送出曹县的。我本人和吴化文手枪旅的几个团长有私人友谊，他们因作为沈的卫队旅要保护沈鸿烈，因而不能表示支持范筑先而感到为难。

沈鸿烈在以胡学仁为首的视察团回曹县后，曾来电邀范筑先到曹县面晤一次，彼此所说的结果相悖谬，沈要求范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国民党治国精神，排除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办事，要范撤换一批自己委任的青年共产党人县长下台，换上沈所准备的国民党特务来代替等，结果双方不欢而散。范回聊城后即撤消了有共产党员赵伊坪在内的驻曹县办事处。自此以后沈鸿烈便开始千方百计地破坏范筑先与共产党人合作下的若干抗战措施。

沈鸿烈听了胡学仁的报告说：“范筑先已变成红色了，大量的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派来的学生干部，并支持由晋东南到冀南和山东接壤地区的八路军。”当时正住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来电报问：“黄河以北来了多少八路军？延安派多少学生到聊城来？”范的回电中说：“凡是坚决抗战的朋友，不论什么党派、背景、如果来了都一律欢迎！”

不久之后，寿张县长共产党员管大同被撤职，换上沈鸿烈的私人党羽冯谦光，范县县长共产党员周子明也站不住脚而被排挤掉回聊城，当时范司令曾打算叫我担任聊城县长，因为我正在黄河以南的郛城一带，搞第十一支队抗日武装，聊城县县长还是由专署的旧职员沂水来的专署建设科长郑佐衡来担任的。

（五）陪同范筑先（将军）到威县会见徐向前将军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徐州从会战到失守前后，从五月初到六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时间，范司令率领第五支队石洪典部，第六支队韩春和部，第二十一支队刘耀庭部，二十二

支队于跃川部，还有卫队营陆子衡部几千人，在黄河北岸的濮县一带的古云集、孙堤口、王堤口为司令部所在地，指挥部队对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进行牵制性的侧击战斗，历时一个多月，经过濮县西关和七里营战斗到城西的石墓头伏击等战斗，濮县的日军自动撤回县城之后，我军于跃川部队6月9日收复濮县县城，范筑先亲率警卫人员和高级参谋袁仲贤，政治部付主任姚弟鸿，机要参谋李莹（即李力殷）和随军记者李士剑等人，由濮县西部的温庄一带进入县城，视察日军占领一个多月期中奸淫烧杀的情况，在我县政府——原敌军司令部召集部队讲话并拍照留念，被劫后的群众纷纷向范司令痛述日军种种暴行和烧杀遗迹。

在这个时期我曾由聊城到濮县王堤口司令部去见范司令，向他报告八路军129师付师长徐向前将军，已经到达河北山东交界的威县县城，正在等待他进行一次亲切的会晤。六月十日早晨，我们由王堤口出发，动身前，当地群众在村头设酒送别，场面非常动人，范司令一面把酒杯举起来洒在地面上，一面拱手向群众致谢，然后才骑马上路。途经观城城东南的将军寨时，范司令亲自解决了县长姜鸿之与当地农民激起的“事变”，群众感激涕零，我们当天傍晚赶到冠县城十支队所在地。

六月十一日上午，我们又由冠县出发，向西北行经过馆陶县城去河北省南部与山东毗邻的威县县城。这次出发除了袁仲贤、姚弟鸿，李莹外又加上张维翰和我，还有“抗战日报”记者吴弢同志等人同行，此行的目的是去会见徐向前将军，加强友军联系，交换抗战经验，建立情报交换关系等，还参观八路军的部队训练和生活等。

我们到达威县时，八路军 129 师部队早已集合在南关郊外列队相迎，欢迎仪式非常隆重。徐向前将军和 129 师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都亲自参加接待工作，热情洋溢十分感人，还有当时的威县县长范若一同志也参加了双方会谈，当天下午范徐两位将军开始会谈，一直畅叙到深夜，除彼此交换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经验外，还就建立通讯联系和互通情报关系等问题，都达成了友好的协议。

第二天六月十二日上午，驻在威县的八路军 129 师师部的干部和当时的抗战群众团体几千人，召开了盛大的群众欢迎大会，徐范二位将军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谈中八路军方面表示很客气，声明八路军部队绝不进入范筑先将军所辖的境界之内。当时馆陶县境内的绿林武装领袖王来贤部、曾经派人找八路军 129 师领导机关接洽收编和委任问题，徐向前付师长认为馆陶地区属于范筑先司令的工作范围，不宜由八路军收编，曾婉言劝导王来贤部队，应就近在山东境内找范司令接洽收编给番号事宜。后来我们由威县回山东时又经过馆陶，这次对当地的绿林武装王来贤、王金甲和吴作修部进行了收编和发给委任的工作，使这一带的武装在政治上有了归宿，进入抗战的行列。

（六）收编王来贤部队为“民军第一路”

王来贤曾以收集来的宋哲元等二十九军部队留下的手枪队，向范筑先司令示威。在馆陶一座三大间的堂屋里摆了三桌酒席，他的手枪队杀气腾腾的在屋外院子内列队“示威”，大有“鸿门宴”的气势。范筑先司令在宴会之前先讲了话，王来贤的参谋长刘冠千也在会上发言，他气势汹汹的

骄傲的不得了！他说过去曾有人来对他们的部队洽谈收编和加委的事，都因为番号小和官低而未定下来。

范筑先司令针对着他的话，对刘冠干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和批评说：“你在山东教育界工作多年，应该知道些做人的道理，如果一个参谋长做不好参谋工作，造成不良的后果和影响，要承担重大的政治责任！一个人家的大闺女不能随便乱许婆家，虽然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家，但也不能乱许八个头。来贤应以宋朝的岳飞，秦桧与张邦昌的事例为镜子，我知道你是个忠贞老实的人，要走正路不要走错路。抗日救国是个好的和正确的道路，只要你自己能好好地走正道，政府是能宽大为怀并将功折罪的，只要能听指挥更是能大有前途的！希望你不要为别人所左右，对自己应当走的道路要多加考虑才好。”

吃过饭后的当天晚上，张维翰与孙景濂同志等人，又和王来贤在他的家里畅说了几乎一个整夜。第二天上午王来贤才把他的部队主要人员名单拿出来交给范筑先司令。范司令又集合王来贤的主要人员讲了话，当场宣布把他们编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下属的“民军第一路”，并发给他们以正式的委任状，大家热情的鼓掌表示庆祝收编工作的成功。

王金甲部队本来没有多少人，他也带来了名单请求收编为抗战部队，范司令委任他为第二十五支队司令，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扰乱老百姓才有出路，他表示今后唯范司令的命令是从。后来我们又到吴作修的第七支队所在地，范司令又对他们的部队官兵讲了话，勉励他们好好地走上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

我们由馆陶回聊城途中，过堂邑县城时曾受到堂邑抗战

军民的夹道热烈欢迎，当地的民间职业吹打班社，自动的走上街头沿途吹奏欢迎的乐曲，表示欢迎范筑先司令的来临，群众场面的热烈情况是空前的！当天下午我们到达聊城时，由东关东北角的姚家园子街入城，经过越河圈街和运河大闸口，东关大街进城时，沿途的群众倾城而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来表示欢迎范司令在收复濮县县城后胜利归来，有的群众站在房顶上向“抗战老人”欢呼鼓掌，轰动了整个聊城县城。

（七）关于准备把范筑先将军遗骸运出聊城

一九三九年夏天约在阴历六一七月间，漳卫河决口时，我们在馆陶的侦察员不断去聊城进行工作，得知当时驻留在聊城县城中的日本兵很少。聊城文明街著名的大绅士周祖瀚（号荫泉、北洋政府时期的“众议员”，群众称他“京议员”）和伪政权聊城县公署与日本驻军司令部都有些联系。我曾给他写信研究如何把范司令的遗骨设法盗出城外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范司令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聊城战役中光荣殉国后，日军驻军找群众把他的忠骸装殓起来葬埋在城内万寿观后，还立了个木牌“故范筑先之墓”，并为之开过祭悼会。我们和他商量能否设法把范司令的灵柩运出来安葬？他自己表示：“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范司令生前的道德品格极为敬佩，愿意为此出些力。并说如果盗墓获得成功，对于他本人、聊城本县和聊城广大地区的群众而言，都将是一桩重大事件。日本军官和士兵对范司令的伟大人格也都表示崇敬，群众谁都不敢动他的坟墓，只能设法把灵柩偷运出来重行安葬。周对此事表示愿意支持，也同意想办法跟日本人说通，把范司令的棺材运出来，或者把城里的真人真

棺运出去，换成一座空棺和假坟。周还表示如果这件事办成功了，算是了结了他对范司令生前为人尊敬的一大心愿！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周荫泉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后来突然写出一封信来说：七月某日一定把范司令的灵柩运出来，叫我们派人去迎接。这时驻在馆陶的八路军“筑先纵队”领导机关，也准备了隆重的接灵仪式，并准备召开一次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追悼会，以祭吊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规定的日子头四天，我们的侦察员从聊城回来时还没有动静。正在纳闷时又派人去找周荫泉问问他是否有困难？否则我们可以自己着手办理，以后周就不敢出头见面了，我们的内线关系也接不上头了。后来又想弄个空棺材放进坟里去，把范司令的遗骸和真棺材以老百姓家里发丧的形式抬出聊城，希望能通过周荫泉办成这一惊人的大事。可是周荫泉后来没再和我们侦察员见面，这个事才没法进行了。

隔了些日子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周荫泉先生决心办为范司令偷灵事，但又怕事情泄漏惹出大乱子来，因而周老先生为此被吓病不久即病死了，所以运棺的事没能办成功，馆陶“筑先纵队”所作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就全部中止了。这件事如果真的办成功，在当地的人民群众中，聊城和馆陶一带的广大爱国人民中，将会产生极为重大的政治影响并深深激励大家的爱国主义激情，也将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上的一件奇迹和动人心弦的盛事。

当时负责进行侦察和联系工作的人员叫张鉴五，张是聊城人不知现在还健在否？关于周荫泉老先生下最大决心要帮助我们范司令的灵柩运出来的前前后后，外人知道的很少，我估计周荫泉老先生的后代（听说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是他的胞侄周乃彬为他过继）会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从这一件具体事情来看，可以想见生活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爱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少），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是愿意支持和出力的。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办成功，但在我们抗战阵营的军民间，一直作为美谈和传奇故事。后来得知，我们的老战友姜克夫同志他在延安听鲁西北去学习的同志谈过这件事情，后来在重庆出版由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主编的《国讯》旬刊上，一九四〇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天“皖南事变”前后所发表的“山东筑先纵队”一文的长篇连载中，曾有一个章节专门记述这个故事，由于是远道传闻失实，他是把它当做一件真事来加以描述的。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全国和海外的《国讯》旬刊的读者和编辑部的同志们，都会记的有这件事，而且作为一件美谈传播开来的。“皖南事变”之后，重庆市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对进步报刊的审查制度更为严厉，经常出现“原稿被扣”和“开天窗”的事情。这篇“山东筑先纵队”长篇连载的报道文章，正是其中的具体事例之一，凡是读过这篇文稿的同志，今天仍记忆犹新啊！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这座历史上著名的聊城古城，经过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等伪顽部队占领九年之后，为我八路军冀鲁豫第七纵队杨勇部队解放前，曾发布过“八路军解放聊城前为保护聊城固有文化的三项命令”，所有解放区的报刊包括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邯郸中共中央晋鲁豫分区机关报《人民日报》，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等主要报纸上都于一月五日发表了“晋鲁豫前线记者团十二月三十日电”，介绍八路军某部政治机关为保护聊城固有文化，免遭战争损害，在我军

入城前发布三项命令：

（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

（二）保护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图书馆。

（三）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北街的住宅。

这是共产党的一项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重大战略措施，命令全体指战员对范筑先将军坟墓立正敬礼，不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崇敬，也体现了党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文化遗址和在国内外文化界有重大政治与学术影响人物的重视和团结的方针。

我是于1947年聊城解放后不久，进入聊城去祭扫范司令陵墓的，当时只是黄土一杯，另有一个用木板写的“范筑先之墓”的牌子，我虔诚的向范老墓鞠躬敬礼，不由的泪如泉涌，并默默祭告这位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先驱者说：“范老，经过几个年头的历尽沧桑和艰苦奋斗，我们终于来到你的墓前参谒，但是再也听不到您熟悉的声音，看不到您慈祥的面容了！可以告慰您在天之灵的是我们仍在继承您生前未了的心愿、为了祖国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努力！”我和几位同来祭悼的老战友都已泣不成声了。我们看到范老的陵墓太简陋不堪十分难过，曾想用青砖和白灰砌成一座方形陵墓，再树上一座誉写范老姓名与生卒年月和壮烈殉国的事迹丰碑，供子孙后代瞻仰。也有的同志主张把聊城万寿观改建成“范筑先将军纪念馆”，并把范老的遗骸开棺重新装殓，修建一座永久性墓园。我们的这些想法，当时的冀鲁豫六专署负责人谢鑫鹤同志等都表示同意，但不久之后，又开始了解放战争初期的“陇海战役”而中止的。从聊城古城解放到今天（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又已经过九个年头，范老

的遗骸已于五三年清明节被热心的同志迁往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下来，但对聊城的后代子弟却失去了一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文明堡垒，我作为曾经领受过范老生前经常关心爱护和亲切教导的晚辈之一，殷切地盼望在他光荣牺牲的地方，能早日建造一座永垂久远的纪念物，或为之树立一座丰碑和铜像，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一二、九”爱国运动21周年纪念日记于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宿舍。

（二）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整理于济南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小明湖宿舍。时距牛连文同志病歿于广西数年之后。

（三）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重订于聊城故乡，六十八年前出生的故宅院。

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队的产生 及坡赵庄战斗

郑棣先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这篇回忆录，记下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在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队的战斗生活，那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着血与火的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有的倒下了，有的前进了，也有的后退了。我永远深深怀念那些长眠地下的革命同志和青年伙伴们。

一、要抗日，不当亡国奴

一九三五年，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发生了“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东北三省，而且侵略华北，提出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面对日寇的侵略，丧权辱国的蒋介石政权一再退让妥协，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的大祸。在中国共产党的

号召和影响下，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传播，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遭到极大的孤立和反对。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都不愿当亡国奴，纷纷要求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特别在青年学生中，要抗日救国的情绪十分高昂。

当时，我在山东泰安育英中学（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学校里有个姓夏的国文教员（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曾任我地区专员），组织了我们四十来个同学，每星期六下午开时事座谈会，讨论形势问题。通过学习讨论，我们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反感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懂得了一些全民族要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我们这个时事座谈会，后来被学校训育主任解散了，夏老师也被抓走了。不久，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北京学生去南京请愿的代表路经泰安时，我们十几个同学还到车站去欢迎，并且在学校也闹起学潮来了。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这次学潮被学校采取取消考试，提前放假的手段瓦解了。我们只好各自回家。第二年，我出于对教会学校的不满，转入山东聊城省立二中继续读书。那时候，尽管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脑子里，并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领导，但是，要抗日，不当亡国奴的思想是明确的坚决的。这正是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二、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队的产生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的一部份军队在人

民抗日运动推动下进行了抵抗。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同志去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国民党山东聊城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拒不执行蒋介石向南撤退的命令。在他原有武装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抗日队伍，~~进行抗日活动~~。我们党派了张郁光、姚弟鸿等同志到这支队伍中去领导政治工作，并在这支队伍中发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聊城成为当时山东抗日的楷模。

国难当头的时候，谁能够安心读书呢！学校只有放假。我不愿回家，积极想去参加一些抗日活动。这时，范筑先的二儿子范树民也在聊城省立二中读书，而且是民先队员。我的好朋友苗玉池同学与范树民是把兄弟，他们发起组织了一个时事研究会。我当时虽然认识范树民同学，但并不熟悉。经苗玉池同学的介绍，我也参加了这个时事研究会。开始我们只有十二人，活动地点就在范树民的家里。以后发展到三十六人，参加的人基本上是我们二中的学生。随着参加时事研究会的人数增多，就把活动地点迁到了我们二中学生宿舍楼的东面。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在那里正式成立了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队。当时，我们这个组织已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要求参加挺进队的青年学生很多，我也介绍了一些同学参加，其中就有我的姐夫焦锡海。

我们挺进队，名义上是范筑先的一个直属大队，实际上是培养青年军官的教导队。大队长是范树民。我们的课程主要是学习政治军事，学习抗日救国道理，还经常去演讲、演戏，进行抗日宣传。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挺进队的名字就是党里的同志给起的。党组织还派了一

些同志来挺进队做领导工作。我记得有参谋长何方同志、政治教导员阎戎同志，还有一个副大队长。我记不清名字了。

三、初试锋芒的坡赵庄战斗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武汉。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遵照党的部署，范筑先率部进攻济南，以牵制日军兵力。我们挺进队也随军来到齐河县坡赵庄。

在开赴前线之际，为适应打仗的需要，挺进队重新进行了调整。原一区队队长是苗玉池，二区队队长是郭培信，三区队队长是卓自诚。我是一区队一组组长。整编后，将体弱年小的留下，挺进队编成三个分队。我任一分队队长，白子俊任二分队队长，卓自诚任三分队队长。整个大队总共不到一百人。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齐河县的坡赵庄宿营。这个村北面靠近济南，南面有一条从济南经聊城至临清的铁路路基（还没有铺设铁轨）。村庄不大，住处也比较紧，我就在一个老乡的寿材里睡觉。我们住下来后，就派出了岗哨。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我去查岗，天黑沉沉的，村子四周静悄悄，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我那时才十八岁，由于行军的疲劳，查哨回来，倒下就又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轰轰的炮声把我惊醒，我赶紧起来，走到屋外，许多同志都起来了，拿好了武器。因为大家都是初次打仗，心情有点紧张，但谁都没有惊慌。炮声来自村北，一定是日本人的。我立即集合了队伍，向大队长范树民报告了敌情，范树民听后，果断地命令我们一分队和大队部往南打，二分队往西打。于是，我领

着队伍从庄南边冲出去。一路上，耳边炮声隆隆，子弹嗖嗖，大家端着枪，弯着腰，一个紧跟一个勇往直前，走了一里来地，前面就是那条还未建成的铁路路基，路基较高，两边是蓖麻地。我们正准备越过铁路，突然，机枪一阵扫射，有的同志倒下了，大家迅速卧倒，开枪还击。原来，这里有日本军队埋伏，怎么办？我看看周围的战友，个个毫无惧色，都在瞄准敌人射击。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队伍冲出去，保持有生力量。于是，我命令队伍由纵队变成横队，分散冲过去。队伍很快形成一条散兵线，趁敌人枪声停下来的一瞬间，我们迅速跃起，勇猛地冲过铁路。当我越过铁路时，回头一看，大队部人员太密，没有来得及散开，有的战友被打中了，范树民也好像负了伤。当时，情况紧急，我只有先带着队伍冲出去。我们跑出了二十多里地，在一个村庄旁，碰上了范筑先和他的司令部。范筑先向我们问清了情况，就叫我们带了他的两名警卫员和担架队，去救范树民等人。当我们又返回坡赵庄时，敌人已走了。在战场上，我们找到了牺牲的十四名战友的尸体。范树民同志也牺牲了，我们把他的尸体送回了后方。

事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兵第一次打仗，就遭到了敌人的四面包围。尽管敌强我弱，我们也没有经验，但挺进队里的每个战友都是勇敢的，经受了第一次战火的考验。坡赵庄战斗，我们挺进队牺牲了二十来个战友，但没有一个被俘的。我的姐夫焦锡海也牺牲了。我是第二次返回战场时，才找到他的遗体，并把他的尸体送回了家。

坡赵庄战斗后，根据党的指示，我们挺进队选调了六个同志去延安受训。我和白子俊等六个人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

道路。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们赶到一二九师政治部报到，我们同去延安的一共有三百多人，路上走了三十八天，到了延安，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就在去延安的路上，我加入了民先组织。到延安后，我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四年

编注：郑校先同志原籍聊城市城关老柳头村人。现在江西省人大。

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陷害范筑先将军的

冀 鲁

今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是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的七周年纪念日。

谈到范将军的死，在当时仿佛是个“谜”，但事实上不象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想的那么妙，不久即水落石出，早已变成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了。

对于陷害范筑先将军一事，国民党反动派是处心积虑，煞费心机的。

当时鲁西北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为王金祥，事变前他是一个腐朽的旧军人和营营苟苟的小政客，又参加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借韩复榘时代的民政厅长著名的亲日分子李树椿之势，任范将军的参谋长。事变后范在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及数百个平津青年学生的赞助下，孤军奋战于山东的大河以北。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王金祥对抗战没信心，企图动摇逃跑，向范屡进撤退谬谏，并唆使其大小喽罗散播“不能坚持”的失败空气，以包围范，结果遭到范及进步人士的痛斥与反对。俟后鲁西北局面初定，各种工作得到突飞猛进的开展，王金祥自知阴谋不逞，遂顺风转舵，装起抗战的伪君子，潜伏在抗日阵营中，进行其更卑鄙无耻的活动。请看以下他们破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及陷害范将军的阴谋活动吧！

国民党反动派秘密的布置他的党羽在范筑先将军手下做县长，于国民党大军南退时，一部份擅离职守携款潜逃，一部份准备潜逃。当范筑先将军击退进攻聊城之敌并在党邑柳林一带予敌寇以严重打击，使鲁西北稍为缓和后，他们认为仍有官可做。王金祥就利用范将军忙于军事之际，擅行职权滥行委派县长，先造成既成事实，迫范将军承认，另外再通过当时山东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所谓省府主席沈鸿烈、民政厅长李树椿对范施以“行政命令”的压力，由于范素抱委屈求全相忍为国的态度，他们这一幕窃取政权的丑剧算扮演成了。这些反动分子横征暴敛，压制群众，其昏庸腐朽，无异抗战前。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抗战，使群众不能抬头，搅乱根据地，以利于他们实行一党专政，奴役人民，以至动摇妥协投降敌人。

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意见不为范接受以及其祸国殃民的罪行不为范所容的时候，他们知道想破坏鲁西北抗战或以国民党反动派取而代之，让范筑先“转变”跟着他们走的希望已根本不能实施，因之他们对范貌合神离恨入骨髓，并开始引起杀机。时机不成熟前，即破坏范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范的中坚抗日武装就是为群众所爱戴的第十支队（即日后之筑先纵队）及第十三支队。如破坏第十支队的名誉，限制它的发展，减少它的供给，对第十三支队则制造口实坚决消灭之。就在这种阴谋下，把十三支队王付司令及政训处主任明目张胆的枪杀了。在群情激愤之下，范将军毅然下令撤销了反动派王金祥的本兼各职（王兼第二支队司令等职），驱逐王金祥出鲁西北。而山东国民党反动派头子却以上峰的大招牌，又强迫范将军使王金祥留任。

对其他由散兵游勇或土匪改编的二十多个支队，则以其雄厚的金钱及大官衙专门收买其上层，使范将军麾下的抗日武装支离破碎，然后达到破坏鲁西北抗战的目的。

范将军为了巩固部队提高质量，特派大批政工人员到各支队加强政治工作。王金祥则挑拨落后军官与政工人员的关系，挑唆落后军官不接受政治工作。范提出严格部队纪律，提高战斗力，王金祥则怂恿落后军官，使其放僻邪侈为所欲为，使军纪废弛，致使范将军巩固抗日武装的计划，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范将军主张团结一切力量，不分党派阶级、不分畛域，不分男女老幼，共同御侮，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企图把为范将军所器重为广大群众所爱戴的共产党员及先进的平津学生一脚踢开，百般刁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这些先进战士始终与范将军同生死共患难，为缔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流了无数的血。象优秀的共产党员范的总参议张郁光，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等，以及其他许多平津青年学生，在聊城事变时与范将军一同光荣殉国了！

范将军一切正确的为国为民的措施，国民党无不设法积极破坏，如三八年秋，政治部见到当时鲁西北群众负担很重，建议范将军一切抗日军政人员废除薪水制改为津贴制，范当即首肯，而国民党反动派从中作梗，别树一帜，使整个计划不能贯彻。并且更加放恣他的党羽及部下，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降低了群众的抗战情绪。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所加予范将军的阻难罄竹难书，兹再举其荦荦大者如：

当时鲁西北军队号称十万，开支很大，经费拮据，沈、李

从大后方携来巨额钞票，不但不助鲁西北军民分文反而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迫令范将军缴纳“上解款”。

再如范将军敌后抗战，粮饷既缺，弹药尤感困难，而沈鸿烈纵从后方运来弹药数百万发，范将军再三恳请接济，不允，而不久于济南敌人进攻东阿之际，竟把几百万发子弹及巨额钞票拱手送给敌人。

再如范将军向沈、李建议平毁聊(城)(东)阿公路，籍以阻挠敌人进窥聊城及骚扰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腹地，当遭沈、李拒绝，坚持保存此公路，籍口彼辈汽车通行，实则留做日后陷害范将军时，日寇汽车兵临城下之用。

最后，当时鲁西北财政困难，范将军拟印发一定数量的钞票，一则籍舒民困，减少群众负担稳定鲁西北的金融，再则解决军费困难，对部队装备进行必要的补充。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反对，并以“国家法纪”的大帽子来恫吓，结果这件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生死攸关的重要措施，竟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

杀范将军的条件已经酝酿成熟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开始对范筑先将军下了丧尽天良的最后毒手——这就是他们认贼作父去勾结日寇了。

三八年十一月初，国民党反动派为策应敌人进攻聊城，假抗粮抗税为名在阳谷安乐镇、阿城镇、张秋镇一带组织会门——“忠孝团”，连同一些被他们要挟的群众约数千人，屠杀抗日干部，反抗抗日政府，发动武装暴动，顿时扰乱了根据地的抗日秩序。经政府再三宣抚无效，叛乱蔓延，形势日趋恶化。范将军不得已乃抽调防守聊、阿路的第五、第六支队前往救平叛乱。

正当聊、阿路防军调走之际，千余敌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应下乃于十一月十二日夜乘虚自东阿出发，沿平坦的聊阿公路（这条路是国民党反动派故意给敌人保留的）猛扑聊城，国民党反动派既把五、六支队牵引到阳谷去，敌人的快速部队当可一帆风顺的长驱直入。虽经我军沿途数度堵截，由于众寡悬殊，仓促应战，奏效甚微。

十三日晨，敌先头部队已进抵聊城近郊，恰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头子李树椿的汽车进城了，李下车伊始即邀范将军谈话，当时范将军以为情况如此紧张，得上峰前来共商御侮大计，深受感动。李此来目的，主要是想以内线破坏的办法，来配合敌人的进攻，首先探听范对抗敌寇进攻聊城的军事计划，随机应变的予以破坏，王金祥对李泄露了军事秘密，李知范将军已由对聊城可退可守的主张变为暂时退出聊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至此李颇感棘手，深恐其破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及陷害范的阴谋不能得逞，乃转取缓兵之计故意拖长与范谈话的时间，因系上峰，又不悉其底蕴，范将军虽焦急亦无可奈何。聊城周围的枪炮声愈来愈密，敌人的飞机开始轰炸聊城街衢了。李树椿见时机已到，乃用激将的手段虚伪慷慨的告范：“范兄，你赶快走吧！我在这里守城，与聊城共存亡。因为军队均是你手下的，你指挥起来比我方便。”意思即用来要挟范公死守孤城，达到他出卖范公的阴谋。范将军为人豪爽义气，当时被激动了，“厅长，守土抗战乃军人天职，岂肯让上峰守此危城？时间不早了，厅长赶快走吧！”至此范将军激于忠义，变更了暂时放弃聊城的原定计划，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毒狠奸计。离别时李谓：“我到外边调度部队，咱们好内外夹攻。”言罢即扬长而

去，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当李树椿汽车开出西门后，敌人在西大堤已给他让出一个缺口，使汽车逃逸的。

十三日上午十一时许，敌人已四面包围了聊城。因敌人来得太突然，再加驻扎聊城周围县份的部队群龙无首，除莘县县长吕世隆（聊城事变后为王金祥刺杀）亲率县警备队数百人前往营救外，其他多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制止。为范将军所信任的抗战坚决的第十支队，那时驻冠县、馆陶一带，正与馆陶大名之敌奋战。在此要特别值得叙述的，那时冀南八路军闻讯后即派劲旅兼程驰援，因相距太远，甫抵堂北，聊城已不保，范将军已壮烈殉国了。十三晚，范将军拟以全力从西门突围而出，惜聊城四面环水，水面太宽（约一里）、太深（丈余与三五尺不等），水外又有一道环城堤（从西门到堤口只有一条宽约十米的大路相连），再加初冬水寒不易泅渡，所以冲了一次，结果警备队在西门外遗尸数十而失败了。

十四日晨，东关已大部陷落，形势更形紧急。当日王金祥为了最后达其奸计，向范将军建议籍口派大员到城外调集指挥援军，并内外“毛遂自荐”，待逃出城外后大造谣言，“聊城已失守，范总司令已牺牲了。”以及范将军死前授命他为代理人的流言。因之，一些前往解围的部队信以为真，遂伫足中途，或败兴而返。十四日敌人继续围困聊城，夜晚范将军上古楼（聊城最高的建筑物）指挥守军作战，每遥闻城外枪声，辄语左右“援军来矣！”切盼王金祥增援以便突围，屡疑援军已至，而岂知我们的范老将军已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圈套了。

十五日晨，守军弹尽粮绝，范将军在东门指挥战斗时左

臂负伤，旋敌以坦克撞开东门，聊城遂告陷落，范老将军乃壮烈自刎殉国。

范将军死后的翌日，国民党反动派头子沈鸿烈、李树椿目的已达，即明令王金祥代范将军为第六专署的专员兼保安司令。鲁西北国民党反动派的党羽王金祥辈，以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颠覆、范筑先将军的鲜血和鲁西北千百万群众的热泪，换取了他们无耻的弹冠相庆与绞杀人民的权利及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范将军和一批共产党员及广大群众缔造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它并送给敌人，共产党八路军及广大群众又从敌人手里夺回来。虽然那些破坏抗战反人民的能手——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李树椿、王金祥早已公开投降日寇了，但他们并没有随着他的主子——日寇的投降受到人民的惩罚，相反的在卖国贼蒋介石的庇护下，继续进攻人民。范将军已殉国七年了，正凶——汉奸王金祥犹未铲除，凶手头子——蒋介石犹在挥动屠刀杀害人民。我们要惩凶！要粉碎蒋军的进攻！要为死者复仇！

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鲁西北的革命熔炉——政干校

许 法

抗战初期，在鲁西北，一提起政干校来，那是有口皆碑，人人赞颂的。这座抗大式的革命熔炉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于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后退。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令军政人员一律撤退黄河南。成千上万的武装部队和各级政府官员，眼看国土沦丧，人民群众将陷于水深火热的严重灾难中，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放一枪，狼狈南逃。他们所到之处，抢劫民财、杀鸡宰猪、拉夫抓丁、鱼肉乡民。以至各行各业关门闭户，十室九空，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在此紧急关头，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山东省委领导和支持下，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拿起枪上战场，脱下长衫到敌后打游击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服动员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重返聊城守土抗战，根据中共中央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精神，广泛地吸收和动员鲁西北地区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战，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改造旧的部队，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基层政治工作干部。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鲁西北各地，党在盐民、农民、中小学以及师范学校的师生中有党的工作，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的情

况，决定仿效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成立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简称政干校）。开始，拟仿照陕北公学而名为鲁西北公学，后定名为政干校，实际上是党领导的抗大、陕公式的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校址在聊城城内状元街原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校址，即现在的聊城实验小学所在地。一九三八年五月开学。每期学习时间两、三个月。校长范筑先（兼）付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训育长周子明（周自齐）。校部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处。政干校设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巩固（巩子展、巩俊杰），在鲁西北特委和政干校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的组织，开展了党和民先的活动。政干校和抗大一样，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校风。全校实行军事管理以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全校编制一个大队。大队长周子明（兼）、于汇川。大队下设中队，每期中、四个中队。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高境、陈自鸾，高衡书（高衡），李肇安，郝冠英（郝鲁伟、女）王玄（女）担任中队长、指导员。每一中队下设三个小队。中队、小队干部多由第六区保安司令部（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后改为游击司令部）的连排级军官担任。政干校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实施政治训练，培养抗日救亡干部和增强抗战力量为教育宗旨。结业后分配鲁西北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或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在训练期间，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课程。政治课程有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教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队中政治工作、民众动员论，中日问题、国际问题等。军事训练包括游击战术、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防空防毒常识、战

地救护等。还可根据自愿参加日语学习，以便在战争中进行敌军工作。在聊城、临清、菏泽、寿张等地同时招生，男女兼收。聊城的入学考试是在聊城城内司马街原山东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现新华广场）举行的。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但学员的文化程度悬殊，从小学学生到高中毕业生；就年龄说，从十四、五岁到四十多岁；就成分、出身说，有学生、教员，还有个别的旧官吏，如做过堂邑县公安局局长的徐某，也有个别商人如临清的金增光；有农民子弟，也有大地主、大官僚子弟，如原籍馆陶县的旧军阀王占元的外甥等。由于招生对象复杂，举行统一的笔试是有困难的，所以入学考试主要是作文和口试。在口试中多是了解家庭和个人情况，报考目的以及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等，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以及身体健康情况等来确定是否录取，一般的，凡报名者均可录取，所以在招生名额以外要准备相当数量的备取生。经过这种新型的主要依靠口问和目测的入学考试之后，很快在政干校大门对过的粉白影壁上贴了榜示。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亲自讲课。教员称教官。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教官是任夷（任仲夷）、巩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教官是刘子毅，民众动员论由管大同、成润、许法兼课。时事政治教育除由学校领导讲国际国内形势外，经常教育由莫循兼课。李士钊讲音乐课和教唱抗战歌曲。游击战术由红军老干部袁仲贤、胡超仑讲课。周子明、何克讲中日问题。教材由教官或讲课人编写，铅印16开新闻纸版本，内容丰富实际，印刷装帧良好，由学校发给。有时也印发讲义。这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是难得可贵的。每天上午两堂“学科”，每堂两小时。“术科”除早操、课间操

外，每天下午军事训练两小时，学习步兵操典，进行制式教练——立正、稍息、开步走，也“拔慢步”和刺枪等等。在教学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师不仅讲课传授知识，还要指导实践。因为这些学员毕业后就要投身到抗日战场上去，所以课程都是为此服务的。每种课程进行一段还要考试，不论笔试、口试都着重让学员回答，“怎样去做”的问题，如“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法则”，“在宣传时怎样抓住群众的思想情绪”等。在学习过程中，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不仅提高思想理论认识水平，还要有实践的经验 and 体会。学校常组织学员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到前线作宣传和救护工作。也组织学员下乡，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有时也组织野营。讲课时，教官们随形势的发展，深入浅出地讲解，比较生动活泼，容易理解。教官们在讲课时也很“浪漫主义”的，没有传统的“师道尊严”很少生硬的说教，多是启发诱导，生动活泼，有时还出点“洋相”，引得哄堂大笑。有一次一个教师因病不能上课，请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代课。他到了课堂，首先自我介绍，只见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姚第鸿”。把“第”字的最后一撇拉出二尺多长，学员们的紧张情绪便为之一扫而光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今天是课堂上的师生，明天是战壕里的战友，因此紧密地打成一片，教师们满怀热情，为培养抗战力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时请抗日军政领导干部作报告，范筑先多次来学校讲课，每届开学或结业时，他都来校讲话，为大家擂以热烈的掌声。这不仅对学员是一大鼓舞，对他自己也是一种激励。还请过鲁西北第一个民主县政府的县长、共产党员、莘县县长吕世隆作报告，也邀请红军老干部王幼莘、袁仲贤、胡超

仑、还有朱穆之等到校讲话。影响很大，很受欢迎。陪同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到敌后参观考察的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等，到达聊城时来政干校参观，对五百余师生讲话，解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在大家热烈欢迎下，欧阳山尊给大家唱了“游击队歌”。政干校抓住时机，向学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给全校师生以很大的鼓舞，也很受学员欢迎。

每个中队设救亡室。救亡室是组织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中队每月出版壁报一期，有漫画、诗歌、报告文学、速写、散文、评论等文章短小精悍，每次出刊都围满了观众。尤其是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表的《告同学书》，语言生动，热情洋溢，号召力强，扣人心弦。学员们听得热泪盈眶，情绪激昂，师生们情不自禁地高声合唱革命歌曲，特别是《毕业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家唱得最起劲，鼓舞着每个师生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负”已成为每个师生的誓言。

学校领导和被领导，教师和学员都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充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豪情壮志。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共同的战斗目标。他们情同骨肉，亲如手足。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亲密无间，生活上打成一片。今天是课堂上的师生，明天是战壕的战友，他们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满怀豪情壮志，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师生们都有严密的组织生活，每周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流思想认识，学习生活是紧张热烈的。每天上课、出操完毕，即使只有

10分钟的时间，响亮的歌声顿时充满了校园。《救中国》的歌曲是集合队伍时必须唱的，集体唱、男女二重唱有时四部轮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是大家最爱唱的，唱起来热烈激昂，大家满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表达出每个人愤怒的心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救亡进行曲》常常是在队伍行进中和着步伐节拍齐唱的。男女学员最爱唱的一支歌要算《在松花江上》了，唱时如泣如诉，慷慨悲壮，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唱歌，大家为国土沦丧而悲愤，为学好本领上战场而激昂。即使是就餐也有歌唱，叫《吃饭歌》，在吃饭前歌唱。大意是：这些饮食，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当为民出力，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在“杀”的口号声中解散队伍，再到饭厅就餐。每个队又都是啦啦队，你拉我唱，我拉你唱，好不热闹，啦啦队队长高喊一声，欢迎×××唱个×××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好！好！好！”领队又高喊：“大家啦啦啦啦！”大家热烈鼓掌，一直到对方唱了为止，啦啦队拉歌的花样很多，也引人发噱。在学校里约有十分之一的女学员，实行真正的男女平等，打破了过去学校里男女不相往来的封建礼教，男女学员在一起交谈、学习、唱歌。由于这些歌曲紧密反映现实，和抗战密切结合，句句打动人的心弦，歌者、听者感情共鸣，常常一唱百合，此起彼伏。抗战歌曲已成了战斗的号角，它强烈的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鼓舞着人们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紧张的学习之后，校园里立即沸腾起来了，每周总有一两个下午的时间举行集会，由师生表演文娱节目或集体游戏

。这时，校长、教务长、训育长等校领导、教官们、学员们在一起围个半圆形席地而坐，表演的节目有合唱、清唱、吹奏、独幕剧等等。齐燕铭教务长的昆曲，临清学员田德素（田园）和金胖子的京剧捉放曹，还有一位姓葛的学员擅长吹箫，能用嘴和鼻孔一齐吹，发出二重音，都很受欢迎。集体游戏最常做的是，每人自备三个纸条，第一个写“一个人姓名”，第二个写“在什么地方”，第三个写“做什么”。然后分三堆分别敛在一起，由三个人分别随意拣一条，把三个纸条连在一起念，真是五花八门，笑料百出。有一次，有人给位热情大方的大姐开玩笑，把三张纸条连在一起念是“×××”、“在床底下”、“讲恋爱”。把大家笑得肚子疼，她也笑得前仰后合地连声说那个调皮鬼搞的恶作剧。回想起这些情景是多么生动活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切融洽！叫人记忆犹新，好象电影似地一幕幕地活现在眼前。

政干校第四期招生一百三十人，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开学。但是，十一月十五日，日寇侵占聊城。政干校全体师生员工在聊城失守前，已经按照鲁西北特委的指示，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的命令安全撤出，转移到冠县、馆陶一带。后改为筑先抗日学院。迁移到黄河南活动。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政干校，培养了两千左右干部，这批新生力量，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思想理论，认清了形势，踏上了抗日战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有许多干部已经是我国各条战线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流砥柱。这是我们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的伟大胜利。但是，斗争是复杂的，胜利来之不易。奉系军阀余孽，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和他的爪牙，民政厅长李树椿勾结第六区司令部参谋长王金祥，极力造谣破坏，大肆攻击我们党，杀害我党领导干部，拉拢收买部队，建立他们所掌握的学校和各种组织，妄图改变政干校的性质和教育宗旨，要把政干校改成所谓国民党正规课程的旧制学校，与我党争夺青年，争夺群众。沈鸿烈、李树椿之流，在寿张县张秋镇设立山东省政府后，开办联合中学，妄图和我党争夺青年。他们要联合中学的学生“读书救国”，莫谈国事，不问政治。实际上还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毒害青年的老一套。在聊城万寿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常常出现鲁西北民先总队部、政干校的代表和学生发言批判沈鸿烈之流欺骗青年的奇谈谬论，揭露他们毒害青年的阴谋诡计。政干校师生到阳谷、寿张、张秋镇进行宣传活动时，对这些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恶毒和最可恨的是沈鸿烈、李树椿等丧心病狂，勾结日寇攻占聊城。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等数百名将士壮烈殉国。一九八二年三月下旬，笔者到邯郸瞻仰了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馆、烈士墓地见到了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肖永智、刘致远、桂干生、史钦琛，张炳元、徐翼、晋士林、查茂德等烈士，我们尊敬的亲爱的老领导、老战友的灵墓遗像遗物。思绪起伏，既悲痛又激动。今天，我们这些幸存者，看到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告慰牺牲了的战友们，安息吧！你们的战友和学生们正在努力继续完成你们的未竟事业，胜利就在我们前面。

本稿承蒙成润、周子明、范旭光等同志提供材料与修

改，一并致谢。

一九八二年六月脱稿于天津技工师范学院，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修改于北京。

附：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第三届招生广告（注）

一、教育宗旨：本校以适应战时需要，实施政治训练，培养救亡干部及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

二、修业限期：三个月结业，但成绩优良之学生得尽先分发任用。

三、投考资格：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均能报考：

（甲）小学教师。

（乙）初中及乡师毕业或肄业者。

（丙）大学毕业或肄业者。

附记：各救亡团体得保送报名，经考试及格者，准予入学。

四、任用办法：结业学生由政府分发各县任民运工作或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

五、课程要目：

（甲）政治训练——包括政治经济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队中政治工作，中日问题，民众动员论与国际问题等科目。

（乙）军事训练——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游击战术，防空防毒常识及战地救护等科目。

六、学生待遇：除食宿及讲义由学校供给外，概归自备。

七、招收名额：三百名，各取学生暂定一百名。

八、报名地点、日期及手续：

（甲）地点——（一）聊城本校，（二）临清政治部，（三）菏泽（报名及考试地点临时公布）。

（乙）日期——自九月十七日始至十九日止。

（丙）手续——（一）呈验证件，（二）填写表格。

九、~~考试科目~~：

（甲）作文及常识测验，（乙）口试。

十、考试日期及地点：

九月二十日在原报名地点考试。

十一、录取新生入学手续：到校新生须经校医检查身体及格后，始准予向教务处注册，赴训育处登记，由总务处领取学生证后，得入所属队部报到。

十二、开学日期：十月一日。

（注）原载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九月七日聊城《抗战日报》。

聊城抗战移动剧团回忆片断

刘定一

（一）北渡黄河进军鲁西北的第一个抗战移动剧团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山东济南成立了以冯玉祥将军部左派爱国人士余心清为首的第三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政训班）。在我党山东省委和平津流亡学生会党组织的动员和组织下，许多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山东留日学生和山东本地的爱国青年先后参加了这个政训班。教师有张友渔、黄松龄、许德瑗、齐燕铭、李续刚、陈北鸥等人。黄松龄同志是政训班的教务长，齐燕铭同志是教务处的主要工作人员。燕铭同志指定我在政训班的同学中组织一个剧团。十月中旬，政训班的第一批毕业学员，按党的安排，有二百四十人被分配到鲁西北聊城（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将军部）工作。由我组织的这个剧团，定名为“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和他们一同来到了聊城。当时的团长是金肇野，我任付团长。

这个剧团在聊城演出了几次，受到了当地军民的欢迎，可惜它还没来得及与广大群众取得真正的联系，就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调走了。据说韩复榘原本并不晓得有这个剧团，待听到在聊城演戏的这个剧团是从济南出发的，他恼火了，认为这是从他身边开了小差。据此，他下了一道

命令，非要把这个剧团追回济南，并加以查处不可！团长老金和一些团员，听了这道命令，都说先回济南，请余心清和齐燕铭同志向韩加以疏通，然后再作道理。而我想，我们是按齐燕铭同志的指示到聊城来的，在未得到鲁西北政训处（即我党鲁西北特委）和齐燕铭同志的批准之前，是不该回济南去的。政训处秘书姚第鸿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但希望剧团的同志商量着办事。商量的结果是：老金带剧团过河南下，我留在聊城等候齐燕铭同志指示。

齐燕铭同志的指示是通过姚第鸿同志转达给我的。第鸿同志说：“什么叫开小差？当兵的怕死，不敢上前线，半路逃跑，才叫开小差。我们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不仅不是从抗战的前方逃跑，反倒是从后方（黄河南的济南）奔向前方（黄河北的聊城）。因此，这个剧团不但不应受什么‘查处’？反而应该受到奖励才对！”

据说余心清和齐燕铭同志把剧团的情况向韩复榘作了说明之后，韩表示不再追究。但遗憾的很，剧团过了黄河，既没有去济南，也不再回聊城，而是从济宁上火车到了徐州、南京、武汉、重庆去了。再后来，完全散了摊子。金肇野同志又从大后方转去延安。

这个剧团撤走之后，姚第鸿同志对我说：“咱们就在聊城重新组织一个抗战移动剧团吧！”

（二）聊城孩子剧团的诞生

一九三七年冬，古老的东昌府，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抗战景象。光岳楼的东门洞两旁，画有一丈五尺高的壁画：抗战的钢铁战士，向着敌寇英勇冲杀！气壮山河的人民大众，

奋起救国，一往无前！光岳楼上，悬挂起大字标语：“拥护范司令领导抗战！”不少热情奔放的少年儿童，常常在楼前演唱救亡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兵、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跟这些孩子们一同演唱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这伙风华正茂、斗志昂扬的英俊少年组成一个抗战移动剧团吧。鲁西北特委同意我这个提议，接着批准了我所起草的一个《招募抗战移动剧团团员启事》，并在光岳楼前张贴公布。很快就有十几位经常随我一起在街头练演的孩子报名参加这个崭新的团体。由于头一批成员全部是聊城的少年儿童，所以我们把它定名为“聊城孩子剧团”。到一九三八年年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这个剧团，就颇有点影响了。

当年流行的抗战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由成年人扮演的。如大家最熟悉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男主角是个走江湖的卖艺老头，女主角是老头的女儿“香姑娘”。我们剧团的孩子演老头，演大姑娘，就有点滑稽可笑。可是孩子们炽烈的爱国之心，声泪俱下的感人表演，仍然感动了观众，演出常常是极成功的。

孩子演大人，终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的节目应该更适合少年儿童的特点。办法之一把抗战歌曲排成联唱的组曲；二是编写儿童活报剧。如《一堂地理课》，写的是：大型中国地图前面，老师给学生们讲解日寇侵略罪行和全国抗战形势，忽然遭到敌机轰炸，人声鼎沸中，大家奋起走上投笔从戎的路。

自编自演的这些节目，局限性很大，赶不上工作的需

要，我们很想尽快增添一批青年演员，把孩子剧团扩充为名符其实的“抗战移动剧团”。恰好，阳谷县成立了训练青年干部的政训班（由我党县委书记申云浦同志主办）。政训处批准我们到这政训班演出并选收青年演员。我们一行，只有我是穿了军服的成年人，其余年龄最大的才十四、五岁（陈世庄——梅枫，现在山东师大任教），小的才十岁，别看他们年轻幼小，活动量却大的出奇。终日徒步行军不说，每逢大一些的村镇，还要演出宣传，到了住处，又要自理膳宿。我爱这些孩子，常常高兴地暗想，他们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

可惜，刚一到阳谷，就遭到一场意想不到的变故。

（三）一场难以意料的遭遇

一九三七年底，由抗日县长徐茂里，抗日武装特务大队队长赵晓舟统一指挥，以洪涛游击队和特务大队为主力，配合各民团武装，县警察局武装，在县城南门外海村一带，发动联合攻击，一举击退了企图盘踞阳谷城的土匪部队布永言、刘桂安等股匪。

正是这次战斗胜利之后，孩子剧团来到了阳谷，他们在西大街路北青训班所在的一所小学校里住了下来，小团员们一面和青训班爱好文艺活动的学员们一起排演宣传节目，一面给特务大队进行慰问演出。那天晚会开演之后，为了解本县情况和向县工委请示剧团今后工作，我到县政府去拜会徐茂里县长。徐不在，县政府和县政训处（我党县工委机关）的同志对我讲：阳谷最近还是很平静，被我们打退了的股匪并不甘心失败，仍在蠢动，同志们嘱咐我要警惕。

从县府回来，原本盘算着如何保证团员们的安全的，当

我看到孩子们还在收拾演出的幕布、服装和道具时，倒是为他们连日来的劳累担忧了，我什么也没说，只管催促他们赶紧睡觉，不过规定了一条：不论谁也不得脱掉衣服。

第二天，即三月三日（农历二月二日）的凌晨，一阵枪声把我们惊醒，政训班党支书老赵，悄然而又急促地对我说：“我们被土匪包围了！”他随即递给我一套便衣。在我换衣服的时候，他又用剪刀把我戴的双层瓜皮毡帽剪成单层的两顶，安在我头上一顶，拉起我就走，他跳上院墙，要我快跟上他。我爬上墙朝外面看时，想起剧团的孩子们，我绝不能只顾自己脱身，必须把孩子们带出去才行。这样我又跳下墙来，回到住处，首先叫起的是一个机灵小鬼李秋霜，我让他顺着我刚才去过的地方跳过墙去找老赵。等我再安排其他孩子时，迟了，土匪已经狂呼怪叫地，端着刺刀，闯进院子。

我们被闷在教室里，敌人在室外对被他们抓来的老百姓恫吓、搜身、勒索。还开枪追逐逃跑的。我怕流弹伤人，要孩子们坐在草铺上不动，告诉他们：一、把身上带的“山东民生银行”和“山东平市官钱局”的钞票，埋在铺下的土里；二、对付土匪的盘问，听我的话音，看我的眼色；三、说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是我的学生。

接着，两个手提短枪的家伙把住了门，几个端着大枪的土匪冲进室内，我抢先一步对他们说：“弟兄们辛苦了，请您高抬贵手，让我们这群穷孩子过去好了。”土匪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孩子们的老师。”土匪把我浑身上下搜一遍，最后，摘走了我领襟上带的唯一值钱的东西——钢笔。

我们被赶到室外，和老百姓站到一起。有个头目走来训

话。他说他们“八大司令”都进了阳谷城。他还说：“这座阳谷城，范司令能占，他姓布的、姓刘的、姓于的、姓李的、姓葛的……也能占！”他警告我们，说是让我们回到屋里，老实呆着不准动，不许出屋，因为枪子是不长眼的！

土匪把我们男团员赶回教室，把女团员弄到别处去了。听见小姐妹的哭喊，男孩子们不顾所谓不许动的警告，跑向女孩子们的去处，只见几个坏蛋正借口“搜身、搜枪”动手动脚地耍野，男孩们怒目圆睁，双拳紧握，护着女孩们，齐声向土匪说道：“她们小闺女家，上学的学生，哪里来的枪呀？”

我看那个自称“抗日军”的葛姓头头，满口称道范司令，想他一定是承认范司令的地位和威信的，所以就找他说理：我们这群生长在范司令身边的抗战爱国的小学生，如今是在您葛司令保护之下了，万一孩子们出个意外，将来可不好向范司令交待啊！”姓葛的听了这番话，不得不考虑后果，把那几个歹徒赶走。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们被围时，阳谷县政府隔壁院里，还驻有吴仲琨等范县办事处的好几位同志。老吴同志听子说我们聊城政训处的孩子剧团也被围困在城内，唯恐这伙孩子特别是小姑娘遭到意外，所以便设法把我们安排到他们这个院里来一起住了。由于有了老吴等同志的照料和防护，这伙孩子总算确保了安全。尽管如此，有的“司令”还是打着孩子们的主意；有的要我们跟他走；有的打听孩子们的家庭经济情况，企图进行勒索等等。有一位自称国民党游击司令的李某（事后得知他叫李英臣）甚至花言巧语地诱骗这伙孩子们去他的“麾下”工作。孩子们机智地同他周旋，没有一

个人动摇。回想到这里，至今仍为孩子们无畏、镇定和胆量感到自豪。

（四）鲁西北特委的关怀

所谓“八大司令”进城，其实就是布永言、刘桂安等股匪对上次在海村一带遭我军痛击的一次报复性行动。他们事前作了十分奸猾诡秘的准备。三月三日凌晨，布、刘等自范县、阳谷边境奔袭阳谷城，战斗一打响，我县政府、特务大队、县保安队等顽强坚持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决定边打边撤，徐茂里县长带领县政府人员首先撤出了县城，布匪等攻进城后，即以重金悬赏，声言辑拿徐茂里、赵晓舟。

我鲁西北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从范县视察工作来到阳谷，适逢这次变故，便一面指挥特务大队等坚守北门一线阵地，控制通向聊城的要道，一面用电话向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汇报战况，建议范司令兵发阳谷。尔后，为了避免过大伤亡，我特务大队主动撤出了阳谷城。

霖之同志接到幼平同志电话，立即面见范司令，向他汇报了紧急情况，恳请他率师亲征阳谷，营救我被围在城内的所有同志和队伍。消灭或伺机收编股匪武装。

以上军事战斗情况，我们孩子剧团当然是不知道的。我们被围后的一天傍晚，一个身穿便衣的人，把我叫到僻静的地方，向我讲了如下的消息：一范司令已亲临阳谷，县城指日即可重归我手。二布永言等股匪遭我军反包围，恐慌万状。三葛步振（前面提及的葛姓头头）已经派亲信暗中保护剧团。四“八大司令”所带的各股土匪，情况复杂，流氓无赖甚多，必须特别注意保护女孩子的安全。

事后得知，传递消息的人，乃是范司令派进阳谷城内的联络参谋李程九。他与主要匪首布永言有过结拜之交，所以他能得到匪方的情报。

几天过后，一个早春的艳阳天，有位穿兰色中山装的中年汉子来了，他告诉我们：“范司令要城内驻军妥善保护聊城来的少年儿童，即日由东门出城。”由于弄不清这个人的来历，乍听这话，还不敢相信是真。为了慎重，我极力隐忍兴奋心情。只是让孩子们集合，排好队伍，由兰衣使者带路，朝县城东门走。东门夹道集合有上百的陌生人，冲我们鼓掌。这些人，昨天还是看押我们的匪徒，而今天，已变成护送我们的“代表”了。

出得城来，阳谷县长徐茂里、范司令的警卫营长陆子衡等，走上前来问寒问暖，他们身后是一眼望不尽的保安队和警卫营的战士。眼含热泪的孩子们，看见了范司令就在前面等候着，遂急步上前，来到了他的身边。老人家立刻从一张摆着茶具的方桌旁站起来，伸手拍这个孩子的肩膀，摸那个孩子的头顶，问问这个“害怕过没有？”问问那个“想家了没有？”问遍了，才命令大家安心休息。他转身又把我叫住，拿出一张阳谷的街巷地图，指点着标记了土匪住地的位置，问我是否标记的准确，听罢我的汇报，老人说：“敌人知道他们已成了瓮中之鳖，所以才肯跟我们谈判。现在他们把你带领的孩子给我送出城来，预示这场事件即将结束了。”老人最后叮嘱我：“办好一个抗战剧团，很不容易，你们回到聊城，一定要加倍努力，把抗战宣传工作做的好好的。”

（五）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的成长

剧团一回到聊城，政治部和司令部的同志都以赞叹的口吻谈论着：“咱们的孩子剧团回来了！”“别看他们年纪小，倒是能干抗战报国大事！”经过了阳谷事件的考验，承受着范司令的关怀，在党的特委领导下，这个小小的剧团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当年的春夏之际，由于姚第鸿同志的亲自关注，政治部（一九三八年五月聊城政治工作会议之后，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先后从来到鲁西北的同志中，选派了十几位爱好文艺工作的青年到剧团来。其中有：我们的付团长、诗人王今然（现名王化东，合肥人大常委会），他是从范县政训处来的；担任剧务的许可（女，现吉林省建委付主任）；抓政治理论学习的扬固（女），都是从延安陕北公学来的；刘敏书（女、刘颖，已故）；王惠芳来自寿张政训处；孙建民来自济南，是个能拉、能唱、能演的多面手；还有从聊城政干校来了饶子春（女）、刘元仲、殷晋成；于涛、颜菊清（女）、王玉浩（女，已故）、肖斌（女）、鲁奇（女，曾任武汉劳动局付局长）；豆秀余（女，现名林柏，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付书记）等同志，都来到剧团。有了这些生力军，再加上原孩子剧团的李秋霜（现名李秘）、李士钧（李犁、现名、李方诗），剧团就有了二十多名演员（这里还应提到，我们曾吸收过一位名叫朱育唐的盲艺人，家在高唐，二十几岁，弹唱皆精，又肯学习，以河西大鼓见长。现在高唐扬官屯乡东朱庄。

生长在战争年代的这伙青、少年，穿上军衣，他们热血沸腾，朝气蓬勃，为了经常保持他们的优良品质，不断发挥其革命精神，那就必须：一、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争取国家民

族的独立和解放，我们秘密地进行党的知识和共产主义教育（有的入了党，有的加入民先队）。二、要有丰富多彩的学习和生活内容。除了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办法外，还常常通过政治部邀请一些学有专长的同志、到剧团作报告或讲课，当年《抗战日报》的总编辑齐燕铭，报社的记者和编辑李士钊，莫循、吴韬等同志，政干校的教师任仲夷，王玄夫妇，还有巩固同志，都是我们的义务老师。李士钊同志原是国立上海音专的学生，他不断到剧团来用风琴教我们的团员练声和唱歌。三、严肃认真地开展工作，到广大群众中汲取营养，凡重要节日，或遇比较重要的纪念活动，都要事先紧张地排练新节目，在万寿观举行盛大演出，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欢迎美国大使馆海军参赞友好人士卡尔逊少校（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同志陪同），庆祝濮阳大捷等，都是如此。三八年七月中、下旬，我们开始了巡回公演，几乎走遍原山东第六专区所属各县，不仅演戏做宣传工作，还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的组织青年、妇女、儿童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我们和群众关系更密切了。

随着鲁西北抗战形势的发展，抗战移动剧团也开始往返于河北省南宫、临清之间，还曾由聊城出发，到南宫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文工团（团长巩廊如）、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宣传队（队长边疆）交流经验并联合公演。这之后，于返回聊城的中途，七月廿四日住宿于临清战委会，当时，听说欧阳山尊等同志一行也在临清，当天夜晚请他为我们讲“化装术”连讲加实习，直到十一点才放他回去休息。

南宫之行，特别值得记述，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冀所领导的威震中外的大部队的八路军。这是我们全体团员向

柱已久的事啊。在南宫的联合公演，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他们的节目十分精彩，那“红小鬼”表演的各种舞蹈，十分引人入胜。我们演出的是宋之的所作话剧《烙印》，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活在洋溢着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气氛的环境里，深深受到教育和鼓舞。

还应回叙一下，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我们和一些剧团有过很好的交往。曾和我党领导的十支队衡锋剧团联合演出，他们在南宫一二九师文工团学习过，他们的演出使人感到一股清新文气，犹如春风扑面。我们还和以共产党员邹鲁风，周持衡为首的山东省巡回宣传队一起演出，他们这个文艺团体，专家很多，艺术水平很高。另一个从武汉来到鲁西北的山东省抗战移动剧团，由钟志清率领，当时归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属，后来有一部分人到了八路军——五师战士剧社。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聊城失守后，我们这个剧团一部分同志到冀南地区参加了冀南宣传队，一部分同志到了泰西地区，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的战斗剧社。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同志英勇牺牲，如殷晋成（抗日战争期间在冀南四分区任总支书记，牺牲于反扫荡战斗中）、孙建民（冀豫鲁豫七纵队文工团长，牺牲于解放战争初期）。有些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去世了，如刘元仲（原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刘敏书（原四机部标准化研究所党委书记），还有不少同志健在，他们正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担负着党交给的重托，当年孩子剧团的李士钧、李秋霜同志一直在人民解放军的队列中，而且担任了领导职务。

当我写这篇回忆片断的时候，不仅异常想恋往日所有参

加过“鲁西北（聊城）抗战移动剧团”的同志，想念所有领导过我们的同志，尤其是已牺牲和故去的范筑先将军、姚第鸿、张耕之、齐燕铭同志，也同样想念多方面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欧阳山尊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
开封河南师范大学

我对聊城北杨集革命七烈士的回忆

沈廷梅

那是一九四〇年二月底三月初的一天，鲁西特委组织部长邵子言同志，把我叫到他屋里介绍了北杨集一带的革命斗争情况。最后，他说：“北杨集党支部在赵春华同志的领导下，群众运动搞得很有成效。你去那里以后，帮助他们在聊城沦陷后的新形势下，扩大党的队伍，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向鬼子汉奸继续开展斗争，把抗日的烈火烧起来。”

次日傍晚，我扮成小商贩模样，背着半口袋花生，顶着刺骨的寒风，向北杨集走去。自此，我就和赵春华、赵春湖、翟修安等同志一起工作和战斗。

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赵春华等七同志不幸被捕，先后壮烈牺牲。时隔四十多年，每当我想起他们那一幕幕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场景，仍使我万分激动……党和人民为永远纪念他们，特地在北杨集烈士亭《浩气长存》的碑文上写下了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

（一）遭灾受盘剥，群起闹革命

一九三七年，北杨集一带遭了大水灾，平地三尺水，大路能行船，庄稼除高粮外，其他作物颗粒未收。百姓四处逃荒，而大地主翟东成家的粮仓却囤积如山。村里人如向他借一斗粮到秋后就得还两斗，大地主翟东成不光把粮食高价折成钱，实行五、六分的高利息，还用土地作保，借粮的人如

到时还不起，土地就归翟家所有。即使这样，村民也常常借不出一斗半碗的粮食。除此之外，翟东成还依仗他在省立聊城二中教书的哥哥翟东升和国民党聊城县县长郑佐衡，以及在梁庄区当区长的堂兄弟翟东岱的势力，大肆搜刮民财，把繁重的“村花费”强加在村民头上，谁要是拿不出来，就要被抓到村公所惨遭毒打。广大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过着苦难的生活。

这时，北杨集的党组织根据鲁西特委的指示，发动党员分头串联群众，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互助组。党支部为进一步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地向翟东成提出了“借粮度荒，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的要求。

群众发动起来了，翟东成这个民族败类，对此恨之入骨，他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他不但不答复群众的合理要求，反而蛮横无理地说：“想要粮食，颗粒没有，要打官司，走遍山东。翟家的人处处有，有本事告到专员那里，我也不怕！”

群众被激怒了。赵春华和全体党员带领群众要清算翟东成当村长几十年的“村花费”帐，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愤怒的群众面前，翟东成吓坏了，龟缩在家里不敢出来，他要“农民互助组”派代表谈判。在强大的群众力量面前，翟东成不得不作些让步。

（二）建立村政府，改选伪村长

经过“借粮”“算账”的斗争，广大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心。为了保住胜利果实，群众决定选村长，把翟东成的权夺过来，换上自己的人。党支部

对这件事作了具体研究，一面派耿玉明等十来个人找翟东成交涉，一面组织群众上街游行，强迫翟东成同意改选。不料，翟东成用了缓兵之计，他表面同意改选，背后却把他哥哥翟东升，堂兄弟翟东岱，国民党县长郑佐衡叫到家里，大摆酒席，策划阴谋，想让他们狗腿子唐庆云当村长。

党支部探听到他们的阴谋以后，便把“农民互助组”会员集合起来开会。会员们议论纷纷：“翟东成怎么要把村长让给唐庆云呢？”不难理解，因为唐庆云是翟东成的狗腿子、帮凶。唐庆云从他爹那辈儿来到北杨集，全村就他一户姓唐的，谁不知他家外号叫“小唐庄”，如果让他当了村长，还不是前门出虎、后门进狼，与翟东成当村长时没什么两样，老百姓还得受苦。会员正讨论着，春华同志从外面走进来，笑嘻嘻地对大家说：“庄乡爷们，翟东成当村长是不是当够了？大家说的对，没有！从他爹翟汉臣那辈起，他家从来没有说过够字。很明显，他推出唐庆云当村长，是用来哄骗人，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于是，大家又议论起让谁当村长来，有的说让翟修安当，有的说让赵春华当，春华说：“我不行，村长这活得让识文断字的人干，就让修安当吧。”

正在这时，“叭勾……叭勾……叭勾……”夜空里突然传来三声枪响。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有些慌乱。

春华脸上仍带着笑，很镇定，他摆手让大家不要怕，说：“刚才这枪是翟东成打的，最近他联合各村大小地主成立了红枪会，昨天，才从省城买来十二支枪，这会儿他们正在佛堂里碰头哩。他打枪是向咱们示威，咱就跟他来个针尖对麦芒！”春华同志在村里威信很高，经他这么一说，大家

都振奋起来：“春华，你说吧，俺们大伙跟着你干，都不会当孬种！”，“对！咱们不能怕他个龟孙子！”

春华很有胆识，很有才能，他看到大家这个劲头，心里也很激动，思索了一下，果断地说：“农民互助组明天一早集合，给翟东成个样子看看，他有红缨枪，咱有粪杈子。今晚每人按一把七、八尺长的粪杈子，咱们来个粪杈子队上街游行，向翟东成夺权、算账、清算‘村花费’账”。 “对！他红缨枪捅咱一个眼儿，咱粪杈子捅他五个眼儿！”会场上爆发出一阵低沉有力的呼喊声。

夜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有的刮木把，有的安粪杈头，充满着战斗前的紧张气氛。春华等几个党员，挨家挨户的检查、布置，一直忙到东方发亮。

一阵清脆的锣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全村立刻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少一齐涌了出来，每人肩上扛着一把长杆粪杈子，组成了一支长长的威武雄壮的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夺回村政权！清算土地税！实行合理负担！”“坚决不选唐庆云当村长！”愤怒的口号声响彻全村上空。

示威队伍包围了翟家大院，愤怒的火焰在人们心中燃烧。多少辈子了，贫苦的庄稼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这样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说话了。翟家大院是用青砖青瓦砌成的院落，黑漆漆的大门上一对虎头门环龇牙裂嘴，露出凶相。

粪杈子队伍包围了翟家整整一上午，大院里死一般寂静。翟东成这条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狗，现在躲在家里吓傻了。随后，赵春华把群众集合起来，他站在一个石台

上高声讲道：“随北杨集的，同意翟修安当村长的，到这边报名！”人们忽啦一下子都围了过来，异口同声地说：“我随北杨集！”“我同意修安当村长！”“坚决不随小唐庄。”在翟修安被选成村长后，群众情绪达到了高潮。翟修安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宣布：“立即组成清查小组，拿尺子，算盘去丈量翟家在聊城、博平两县的土地，跟翟东成清算‘村花费’。”

政权落在穷人手里了。翟东成又恼又恨，他急着找他家的“刀笔”翟东岱，向聊城县县长郑佐衡写了一份密报。

（三）据理打官司，威震伪县令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哀叹：“山东红了半边天。”他指示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聊城县县长郑佐衡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破坏鲁西北的抗日局面。郑佐衡这个死心塌地的狗汉奸，他接到翟东成的密报后，十分高兴，他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这次向沈鸿烈“进贡”的好机会。

一天下午，春华接到信要他到县政府去一趟，说是郑佐衡要见他。春华与同志们分析了敌人的阴谋，当晚便向鲁西特委作了回报。特委领导指示：“我们有理有据，可以大胆揭露，针锋相对。”

经过一番准备，郑佐衡为了制造反共磨擦，粉墨登台了。断官司这天，县府里一派森严，在大堂之外，春华对同来的春湖、修安等几人嘱咐道：“你们在这里等着，郑麻子如果不讲理，你们就见机行事。”正说着，只听一声喊：“北杨集赵春华来了么？”“来啦！”春华答应一声，昂首走进

大堂，一看，翟东成坐在椅子上吸烟，看他那神气劲，好象这场官司已经打赢了。

郑佐衡看了春华一眼，慢条斯理问道：“你就是赵春华？”春华答道：“是”。

郑佐衡把这位瘦高个子的庄稼人又打量了两眼，说：“你聚众闹事，图谋不轨，强夺村长，有这事吗？”“有”。春华的回答这样铿锵有力，郑佐衡不由得一愣。

翟东成刚要插嘴，春华接着说：“这几件事我不明白，想问问县长：日本鬼子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我们庄稼人说几句抗日的话，做点抗日的事这就叫聚众闹事？我们按政府法令，种地纳粮，忍饥挨饿，支援军需，这叫图谋不轨？！”

郑佐衡听了这些话，心里一缩，没料到这个庄稼人先发制人这样厉害。他忙岔开话题，耍开了威风：“我没问你这个，你们兴师动武，强夺村长，是国法不容的！”

“那么欺压百姓，贿赂官员，走私漏税哄骗政府是合法吗？”

“他胡说八道！”翟东成跳起来叫道。

“不作贼不心虚。”春华轻蔑瞥了他一眼说。

“你有凭据吗？”郑佐衡厉声问道。

春华微微一笑：“出官车，他家大骡子大马不去，硬派老百姓的小牛去；他家在聊城，博平两县有三百多亩土地，聊城县收税，他推说在博平拿了；博平收税，他说在聊城拿了，从中投机漏税。请县长看吧！”说着，从兜里掏出几张纸，那上边把翟家的地亩算得一清二楚。

郑佐衡看了吃惊不小，支吾其词：“这……这确实

吗？”

“郑县长，一个月前，翟家那一百块现洋送到谁手里，恐怕只有县长你最清楚吧！”

郑佐衡的脸刷的变成铁青，两手扶椅，不知怎么好。翟东成也顿时目瞪口呆，张开的嘴不知说什么好。大堂上鸦雀无声，观审的人面面相觑，来参加观审的中共鲁西特委委员成润同志坐在那里微微而笑。

郑佐衡为了挽救败局，瞪着贼眼怒喝道：“在我这里非同儿戏，你红口白牙，要句句说实话。”他转向呆在那里的翟东成求援了：“翟东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翟东成无言以答“我……请县长明察。”

郑佐衡贼心不死，转向赵春华：“谁来给你作证？”

春华一身坦然，冷笑一声：“北杨集一千多男女老少，郑县长，你是县官去访一访吧！”话音刚落，“我们来证明！”修安、春湖等十几个人涌了进来。大家七嘴八舌，揭发的翟东成脸色发紫，郑佐衡哑口无言。这家伙到底善于周旋，装出一付笑脸，说：“你们都是老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件事交给我了，你们都回去吧！”一场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春华和成润一起离开县政府，谈笑着来到鲁西特委。一进门，成润就高兴地说：“这场舌战真带劲哪！”大家坐下来分析了一下形势，决定把北杨集这场斗争在鲁西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上刊登出去，广泛宣传。成润兴奋地说：“我去写稿。”

报纸印出来了，消息传遍了整个鲁西北，这一下捅到了顽固派的疼处。翟家兄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

跑到城里找郑佐衡想办法。他们哪里知道郑佐衡更急：这样下去，聊城的局面更难收拾，他怎么向自己的上司沈鸿烈交待啊！

（四）识破敌阴谋，智斗显神通

武汉失陷后，日军逐渐把主力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国民党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在这种形势下，梁庄区伪区长翟东岱下令各村红枪会在吴庄“亮团”，以此来恫吓抗日群众，郑佐衡还要亲临现场呢。

春华召开支部会研究对策，通知各村“农民抗日救国会”去吴庄“欢迎”郑佐衡。

“亮团”的这天，通往吴庄的各条路上都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十几个村的群众拥挤在路旁，等待着郑佐衡的到来。

太阳冒红的时候，春华领着北杨集的群众，拿着绿小旗来到吴庄村西头，十几个积极分子在一片坟地里和鲁西特委的于同志见了面。于同志说：“郑佐衡这次来是要公开解散这一带的群众救国团体，还准备抓人，咱们要智斗。”不大一会儿，只见通往聊城的公路上烟尘四起，郑佐衡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策马而来。没等他下马，口号声响成了一片：“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保卫鲁西北的干净国土！”“拥护范司令抗战到底！”“欢迎郑县长坚决抗战！”

郑佐衡在马上向四外一看，只见人头攒动，人山人海，这阵势不免使他头皮发麻，他气哼哼地听着群众喊口号，嘴

里嘟噜着：“那个，白说。”他刚想往前走，就见北杨集的人们打着小旗拥了过来，口号喊得震天动地。他东张西望，就是不见他安排的人，心里一沉，眉头皱成了疙瘩。他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进了乡公所，他屁股还没坐稳，就下令道：“把村头那些拿小旗的人叫来！”

春华带着十来个人来到乡公所，刚一进门，郑佐衡劈头就问：“你们是什么组织的人？”春华笑笑：“北杨集抗日救国会。怎么，郑县长忘了？”“你们今天来干什么？”“噫，郑县长来开会，我们欢迎你呀。”“我看你们不是来欢迎我，是想闹事！博平县已被共产党拉到大坑里，你们想把我也拉到大坑里去吗？”“郑县长，你这话什么意思？俺是看着你是跟着范专员抗日的俺才拥护你。你不让俺接，俺就不接！”郑佐衡一看找不出岔子，黑驴长脸一耷拉说：“我让你们这样迎接吗？谁让你们呼呼喊口号。”“你说怎么接好呢？”“这……，我看你们别这样，抗日是政府的事，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政府——国民革命政府。什么这个团，那个体的，都是非法的。你们不要听信共产党的宣传，搞什么经济斗争，政治鼓动，这些事连我都不懂，搞这些没用。”

“抗日是政府的事儿，那就不要跟老百姓要粮要人。日本人来了，让他们都去找你县长，俺老百姓就不用管了？”郑佐衡听不下去，怒火直冲脑门子，知道这个庄稼人不好斗。他正要发作，一个随从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县长，外边满满的人把乡公所围起来了。”接着，一阵口号声从屋外传来：“要求郑县长抗日！”“反对投降，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一致对外！”

郑佐衡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郑佐衡本来准备演讲，可是这阵儿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让他的秘书——一个大胖子出面讲话。不料，大胖子刚说了一句：“大家要听政府的话……”就被群众愤怒的吼声打断了。

“政府就该支持我们抗日！”

“蒋总裁跑到四川去保险了，日本人来了，我们往哪里跑呀！”

郑佐衡听了很恼火，走出来拍着桌子威胁说：“你们里面有红头造反，想煽动百姓跟政府对抗！不准任何人借反对翟东成来跟政府捣乱！”几百名群众听了顿时哄喊起来：

“叫他说清楚，翟东成是他的什么人？”“不说清楚，别放他走！”有的群众把小旗扔到郑佐衡的脚前，说：“不欢迎郑县长了！”郑佐衡又气又怕，脸色气得黑里透黄，他让随从拉过马来，一溜烟窜回聊城城里去了。

回到聊城，他连家门都没进，就气急败坏地去找王金祥。在王金祥的怂恿和支持下，他闹到了范筑先那里，说：

“范司令，这真共产党好说，假共产党也好说，可这半真半假的共产党怎么着呢？”

范筑先拈着胡子，似笑非笑地说：“不论真的假的，枪口对外，打日本鬼子，就是好中国人！”

“北杨集的人整天闹乱子，谁说也不听，看来非要二小姐去一趟才行。”郑佐衡按照王金祥的旨意，想“将”范筑先一“军”。范筑先将军哈哈笑了起来，说：“那好，就让她去一趟。”郑佐衡听了心想：北杨集的问题交给你了，处理得好坏是你的事了。你要支持共产党，我就到省里告你一状！

没隔几天，范筑先将军的二小姐范树坤带着宣传队来到北杨集，在谢家台子演出。范二小姐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听说她来了，男女老少都涌出来欢迎她来演出。她那嘹亮的歌声在天空中回荡，鼓舞激励着人们去战斗。

河里的水哟黄又黄，
日本鬼子太猖狂，
昨日烧了张家寨，
今日又抢王家庄。
抓住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年送军粮，
大好河山被侵占，
中华人民要遭殃。
坚决不当亡国奴，
拿起刀枪上战场。

.....

（五）轻敌遭奸计，七英被囚禁

聊城失陷后，根据抗日需要，我来到北杨集，以北杨集中心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聊城东北地区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工委书记，赵春华同志任民运部长，孟筱澎同志任组织部长，袁兆文同志任宣传部长，并组织了一支秘密武装，在聊城、茌平、博平三县边界不断割电线，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打击日寇汉奸的活动。

日本人对这一地区的“治安”十分恼火，责令聊城伪县长李汉章限期找到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线索。翟东成也随之疯狂起来，他天天把红枪会集合在佛堂里，烧香、磕头、

画符、念咒、练武，还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狗腿子唐庆云说：“哈哈，走了个郑佐衡，又来了个李汉章，还是我翟家的人，真是天不灭曹哇！我翟东成不会倒的。哼哼，赵春华呀赵春华，四指的小条叫你上西天！”随后，他写了北杨集党员，积极分子的名单送给李汉章。

一天伪县长问伪区长张洪恩：“北杨集有个叫赵春华的没有？”张洪恩说：“有。”

伪县长李汉章说：“有人告他，你把他叫来，我见见，绝不扣他。”

张洪恩来找赵春华，告诉了他，并问他去不去见李汉章，赵春华说：“让我考虑一下，我如果要去，明天就去找你。”到晚上，春华同志就召集党支部的几个负责人赵春湖、翟修安、王宪伦等三位同志，把张洪恩说的情况给他们讲了一遍，大家很担心，怎么办？去好还是不去好，大家沉思了很长时间都拿不定主意。春华同志说：“还是去好，如果不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也会来抓我的，那样就更不好了。我还是去，如果他们扣留了我，我就给他打官司，绝不向敌人屈服，也绝不会出卖组织。我走了以后，由修安同志负责，如果不扣留我就更好了。”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春华就和张洪恩一起去见伪县长李汉章。这个老奸巨滑的伪县长，见到赵春华，装出一付伪善的笑脸问他：“你就是赵春华吗？”“我就是赵春华。”“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春华回答：“听说了，可我不是共产党，只是范司令在时，参加过抗日救国会，翟东成也参加过。”

伪县长问：“那为什么他还告你？”春华答道：“他就是为了想当村长没当上。”李汉章说：“既然是这样，你们就再选一次行不行？”“行啊”。“那么，我们就定个时间好不好？”就这样，定下了于北杨集大集后第二天选村长。

春华同志回到家，把与伪县长见面的情况给同志们讲了一遍。大家认为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都是支持我们的，再选村长我们一定会胜利，就通知全村群众来开会选举村长。而没有想到选村长是敌人要的一个阴谋，是敌人企图把北杨集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一网打尽的一个罪恶阴谋。

我当时正在地委开会，开完会的那天夜里我回到了北杨集，立即召集党支部的几个领导同志开会，传达了地委的指示精神，并提出在第二天召开工委会会议。春华同志说不行，开不成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行，春华说：“我们已经决定在明天改选村长了。”我觉得很奇怪，不是有村长了吗，为什么又选呢？我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春华同志就把翟东成告他的事跟我讲了一遍。我当时有些疑心，会不会是敌人要的什么阴谋，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也就没有马上表示什么意见。这时大家见我沒有说话，就说：“我们还不怕，你怕什么，我们的人多，选举一定能胜利。”春华同志说：“现在你也别走了，我们多放两个岗哨。明天你就去耿玉明家里听候消息，有事的时候也好商量。”听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同意了，决定把工委会的时间推迟到选村长以后再开。

第二天早饭后，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几十公尺外就看不清人。八、九点钟，太阳才上树梢的时候，忽然三辆满载着鬼子汉奸的汽车开到了村边。我们的岗哨发现情况不

好，撒腿跑向会场报信，但是已经晚了：村子被包围了。敌人一面在村内搜查，一面向会场包围过来，一架架机枪在墙头上瞄准会场的群众；一柄柄刺刀闪着寒光。龟田嚎叫着，汉奸翻译南云成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在他身边，龟田叫喊一句，南云成就象哈叭狗一样翻译一句：“太君告诉你们不要怕，他是来看望你们的。我们来到中国，是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共亲共荣。你们里面有八路反对太君，反对大东亚圣战，反对日本帝国，抓住死了死了的！”

这时候，他们把翟东成假逮捕，捆起来推上汽车，然后，鬼子让群众在汽车跟前一一走过，只要翟东成闭一闭眼，这个人就立刻被敌人抓走。

春华看到这种情景，考虑到突围是没有希望了，有翟东成这个坏家伙在眼前，回避也不可能，敌人抓不到我，是不会罢休的。我是共产党员，决不能眼看着群众惨遭杀害。翟修安一把没抓住，春华虎步走向前去，怒视着龟田和南云成：“你们不是找我吗？”“你是谁？”“赵春华！”南云成翻译给龟田，龟田拉着战刀，围着赵春华转了一圈，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有名的、使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感到头痛和扎手的共产党人，然后伸出手指，作了个八字：“好，好的，你的这个？”

“我是八路军。”春华昂首挺胸、声音铿锵有力的回答。

龟田嚎叫一声，南云成翻译一次：“太君问你还有谁是八路军？”“就我一个！”“嗯？”龟田龇牙裂嘴一笑，摇了摇头，把南云成手里的名单拿过来晃了晃。

人们被鬼子汉奸押着，一个个走过，南云成逐个问着名

字。当翟修安走过时，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翟敬申。”翟修安临时化了个名，南云成看了看名单上没有这个名字，正在犹豫。只见汽车上的翟东成闭了闭眼，翟修安立刻被拳打脚踢，押了起来。就这样，北杨集党支部的七名党员和六十多名积极分子全部被抓走了。

当敌人包围村子的时候，我正在耿玉明家里打听开会的消息。忽然，耿玉明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说：“沈五哥，鬼子包围了村子，春华让我告诉你，赶快离开这里，只要敌人抓不到你，我们就好办。你要通知各村干部马上转移！”接着就传来了鬼子的叫喊声。我来不及多想，连翻了几道墙，跳到王四叔家，钻进柴禾堆里藏起来。鬼子汉奸喳喳呼呼来到柴禾堆前，连扎了几刀，几乎扎到我的头。直到鬼子走了，我才从王四叔家里出来，直奔距北杨集七里路的袁楼，让那里的同志向周围各村党组织送个信，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并回到地委汇报情况，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和群众。

（六）为党捐身躯，业迹垂千古

凶狠的龟田逮捕了赵春华等人以后，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他们。在刑堂上，龟田指着各种刑具对他们说：“那边是死路，这边是生路，你们无论是谁，只要供出党员和你们的领导，就放他回家，还可在家里给他个差事干，谁要不说，就让他尝尝这些刑具的厉害。”等了好长时间没有人回答。龟田咆哮着说：“你们说不说？不说我就要动刑了！”还是没有人回答。龟田气得龇牙裂嘴，恶狠狠地把王宪伦拉了过去，喊道：“你的快说！”王宪伦毫无惧色的

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龟田说：“我的知道，不动刑你是不会说的。来呀，给他点颜色看看！”几个鬼子上来，把王宪伦又是皮鞭抽，又是老虎橙、压杠子、灌凉水，灌了又用脚踩出来，踩出来再灌。反反复复，一连几次都未能使王宪伦屈服。敌人又把王宪伦吊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烙得他浑身冒油，汗似水一样直流，死去活来，昏倒又浇冷水，但始终也没能从他的口中掏出一点情况来。龟田无可奈何的哀叹说：“好小子，真不愧是个共产党员。”

龟田无法，又把赵春华拉出来审问：“你说谁是共产党？”赵春华说：“就我是一个是共产党，别的人都不是。”“你的上级是谁，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气得龟田暴跳如雷：“你的死了死了的。”春华正气凛然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谁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你们能杀死我一个赵春华，但是还会出来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尽的！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被推上人民的审判台，受到应得的惩罚的。”龟田听了，气得直打颤，想要马上杀掉赵春华又怕断了线索，只好把他押了下去，又去审问别的人。几个同志先后都经受了同样的酷刑，但是，龟田始终什么东西都没有捞到，落了一场空，法庭，反而成了斗争龟田的场所。

春华同志回到敌人的监狱里想到，龟田这个野兽妄想在我身上突破，那是井底的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当晚，赵春华同志为了不让敌人从自己身上得到一点东西，也料到敌人不会轻易放过，就为革命而自尽了。

敌人在赵春华死后，又把唐庆云塞进监狱来劝降，遭到

了同志们的怒骂。敌人黔驴技穷，最后恼羞成怒，再施用酷刑将赵春湖、王宪伦、张子杰、翟林臣等几位同志先后杀害。耿玉明经受了敌人的酷刑后，敌人没得到一点东西，无可奈何，只好允许取保放了。回家后，他嫉恶如仇，带着眼泪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由于受刑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不久也牺牲了。

一九四〇年四月的一天，鬼子把翟修安同志押往济南。当汽车即将开走的时候，翟修安等同志深情地望着养育自己的家乡，多么希望村里的乡亲来说几句亲热的话啊。但是，为了群众的安全，党已经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屠杀，永远吓不倒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英雄的北杨集人民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烈士的尸体，从秘密到公开拉起游击队，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

编注：沈廷梅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太平庄战斗

张侠

一九四一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驻聊城的日军采取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向我抗日根据地筑先县（现聊城市）进行疯狂地清剿扫荡，形势十分险恶。那时，我任这个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兼县大队长。当时，全县日伪共有五千左右兵力，据点星罗棋布，岗楼四处林立，封锁沟纵横遍布，使我们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县抗日民主政府不得不迁徙到本县的边缘地区——东、西太平庄一带活动。

东、西太平庄位于筑先、阳谷、东阿三县的交界处。村子不大，只有八、九十户，三百多口人，但地形十分有利，村南不足两里地，便是阳谷县的孙庄、陈庄；东面穿过黄河故道一片沙滩，越过四新河，便是东阿县的梁庄、任庄、赵寺；北面二里多路便是位庄；西面的前后刘皋、裴、王寨都不过三、五里路。村落稠密，交通便利，形成了本县坚强的联防区之一。并且，这个庄子南面有一片近二里方园的灌木丛生的碱土岭子，大的几丈长，丈多高，小的七、八尺，象一座座小山头。高低起伏，犬牙交错，是一个打麻雀战、游击战的理想阵地。加上这一带党的组织健全、党员数量多，质量高，联防队实力强，神枪手也特别多，男女老少都有和汉奸土匪做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太平庄和裴、王寨的自卫

队，是一九三九年在地下党员王鲁光、刘子华、宗曙光同志领导下建立的，已有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多次击溃过敌人的骚扰和进攻。因此说，太平庄又是我县中一个负有盛名的抗日堡垒村。

我们为了加快武装各村的联防队，还在西太平庄建立了一个小型兵工厂，负责翻新枪支、制造弹药，并已具有日产手榴弹约三百枚的规模。基于上述原因，太平庄自然成了敌手的眼中钉、肉中刺。

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县政府秘书华川、干部刘效韩、韩效民、韩培成等同志正在商量小兵工厂的事情，忽然，县政府干部杜杰同志带领侦察员匆匆赶来报告说：“刘道之、周店、谭庄、高香坊等周围据点里伪军正在集结，准备合围扫荡太平庄。”

这时我县大队战斗员和所在区队加在一起不足一百人，联防骨干村不超过二十个，敌我力量的悬殊可想而知。我立即决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便叫通讯员朱海同志：“马上通知县大队、区队、联防队负责人来开会。”朱海应声一溜烟儿跑出去了。

没过多久，县大队的干部以及公安局长李诚、武工队长韩学水，所在区区长、区队付队长，联防队大队长吴汉三和东西太平庄的几个干部都陆续来到。两间小屋挤得满满的，气氛非常紧张。好大会儿功夫，没人吭声，大家都把眼光投向我。

我沉思了片刻，严肃地说：“同志们，据可靠情报，谭庄、刘道之、高香坊、花牛陈据点的敌人，在汉奸队长谢奎奎、付崇鲁的带领下，还有洼东的伪军，就要合围我们太平

庄了，咱们是打是走？打，怎么个打法？走，，往那里走？小兵工厂怎么搬？群众如何转移？大家商量一下。”

“我们不走了，就在这里跟敌人干吧！”我的话音刚落。大家便异口同声的说。

西太平庄的老村长周茂铎站起来挥着拳头说：“张县长，我们村这三百多口人，最少有二百口子能拿家伙的，你说怎么打法吧！”

大家的战斗情绪使我更坚定了打的决心，而且一个比较成熟的作战方案在我脑子里也逐渐形成。我看了看同志们那一张张愤怒的面孔说：“同志们的意见我完全赞成。不煞煞狗汉奸的威风是不行的。要准备打一场恶仗。周茂铎同志说得好，咱们不分男女老少，能上阵的都上，所有能杀敌的武器都拿出来。在这里的县大队、区队、联防队，拉到村南藏土岭子埋伏起来，太平庄的联防队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到那里去。打它个伏击。兵工厂的机器、工具等一切东西先分散藏起来，并立即组织年老体弱的乡亲们转移。”

布置完毕后，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我带着通讯员朱海、刘登基等同志，跟吴汉三，周茂铎一起，齐奔西太平庄村东头查看岗哨。路上吴汉三忧心忡忡地问：“张县长，县政府走不走？你走不走？”

我笑笑说：“县政府那些不能参加打仗的人走，我不走。”

“你真不走吗？”他们惊讶地说：“张县长，这可是场恶仗，你在这里可太危险了啊！”

这时，县政府秘书华川，公安局长李诚同志以及县大队的干部也为我的安全担心，他们纷纷前来劝我说：“县大队

的干部留下指挥战斗就行了，你在这，万一有个好歹，政治影响太大，我们也不好交待。你还是走吧！”

这时，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我想：我是共产党员，是抗日政府的县长，敌人眼看要来，情况这么紧张，我怎能在这节骨眼上丢下老百姓不管而自图安全呢？再说，我一走就等于整个县政府都走了。因此，我坚定地对同志们说：“怕死就不抗日了！要死，咱们一起死，要活，咱们活在一起，谁也不要再说了，就这样定了。”

他们听后很激动，吴汉三说：“张县长，你不走，咱县政府不走，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俺老百姓就更不怕了。”

“县长不走，县政府不走”的消息飞快地传到了广大指战员、联防队民兵和群众中去，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磨刀擦枪，准备接受这场恶战。

查哨回来，我刚回到屋里不久，就听到外面咋唬起来：“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周围联防村也吹起了号角，锣、鼓、钟声响成一片。我赶忙拔出手枪，跑到街上。

这时，天还黑乎乎的。只听到纷沓的脚步声，嘈杂的男女叫声。我忙命令：“敲鼓打钟吹号角、按原计划行动。”便招呼村自卫队长郎宗义、周庆智带领民兵，连同手拿各式各样武器的老头子、小青年、大姑娘、小媳妇、还有部分儿童团员，各自迅速地奔向自己的战斗阵地。

我和周茂铎、周海等人带着部分战士和白卫队员来到村后交通沟里，借着星光往北一看，敌人已从东北向东南摆了个扇形，黑鸦鸦地包抄过来，足足有四、五百人。

“哗哗哗”一阵拉枪栓的声音。战士和民兵们都把子弹顶上了膛，手榴弹放到了沟沿上，激愤的嚷嚷道：“张县长，

打吧！”

“靠近一点”。我紧盯着蜂群般的敌人，冷静地回答。

敌人加快了进攻步伐。近了，更近了，东北面的敌人已靠近村口的壕沿，我才低声命令：“打！”

步枪、土枪、手榴弹，还有装十二公斤炸药的土抬杆炮，一齐向敌人开了火，当场就撂倒几十个敌人。

敌人本来气焰十分嚣张，出乎他们意料地迎头挨了一顿闷棍，被打得个愣怔。稍停，他们又恶狠狠地向我们扑来。机枪、步枪、子弹从我们头顶上嗖嗖飞过，手榴弹不断地落在沟沿、村边，打得尘土飞扬，浓烟滚滚。

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火力不足。抵挡不住敌人密集的火力，用土抬杆轰了几炮，便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从村南、村西分两路边打边顺着交通沟撤退，将敌人引向我们的伏击圈。

敌人象野牛一样闯入碱土岭子之后，等候多时的县大队、区队民兵杀了出来，跟敌人展开了麻雀战，捉开了迷藏。只听东边呐喊，又见西边冒烟、这个碱土岭子上响起了枪声，那片灌木丛中扔出了手榴弹，这里撂倒几个敌人，那边活捉了几个伪军，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前后刘皋、裴王寨位庄等村的联防民兵，从西面和北面包抄了敌人的后路，使敌人陷入了腹背受击的困境。汉奸头子谢金奎一看情况不妙，翻身上马抢先逃跑。那些幸存的残兵败将，也都只恨他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拚命地往回逃窜。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战斗，敌人死伤惨重，其余溃不成军，狼狈逃窜。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战地一片欢腾。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又重整人马，卷土重来，接连几天向我联防区反扑，而且来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炮火一次比一次猛烈，气焰一次比一次嚣张。

我们呢？越打越会打，越打越有经验。我们把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墙壁都掏空、挖透，房顶修筑了掩护工事。使全村家连家、户连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能攻能守，能随时撤退的完整的防御体系”。就这样，敌人的反扑非但没有捞到便宜，反而损兵折将，耗费武器弹药。经过几天的战斗，我抗日民主政府仍然活动在东、西太平庄一带。

这一下，可气坏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汉奸李汉章。他们密谋策划，派伪军县大队长赵振华、伪三支队团长田福州，配合城里的鬼子少佐小野，又纠集了花牛陈、赵鸭子庄、周庄等据点的日伪军约七、八百人，配备小钢炮四门，轻重机枪十几挺，于腊月二十八日夜晚，乘老乡们都忙着过年之机，鬼鬼祟祟地绕过联防区，偷袭太平庄。并偷偷地占领了村南的碱土岭子。这天夜里，乌云压顶，北风怒吼，雪花飞舞。敌人选择这种鬼天气来偷袭，是想打我们个冷不防，这时，县政府、县大队，区队分住在周围各村子，唯一的战斗力量是太平庄的联防民兵和群众。

深夜三点多钟，各方面的情报陆续不断地报告给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村长周茂铎，自卫队长郎宗义、周庆智等同志，他们分析了敌情，制定了作战方案，认为组织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村南唯一好的地形被敌人占领，只有坚守村子和敌人血战到底。敌人这次暗着来，我们也不能明着打。另外派人从西面绕过敌人，报告县政府、县大队、区队和到东阿县赵寺一带找军分区主力部队，请他们火急来支援。

寒风仍在呼啸，雪花还在飞舞。太平庄的民兵自卫队 and 全村能打仗的男女老少没有击鼓敲锣，而是静悄悄的。拿着各种杀敌武器，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果不出所料，时隔不久东北面的敌人首先向村里开了火。

敌人打了一阵枪炮，看着村子里毫无动静，便鬼叫狼嚎恶狠狠地扑了过来。眼看敌人快到交通沟沿了，村长队长才下命令向敌人进行了还击。

钢枪、土枪、手榴弹、老抬杆一齐射向敌人，只一阵，就撂倒二、三十个敌人。这批敌人暂时后退了。但稍停片刻之后，敌人恼羞成怒，更加疯狂地组织起第二次进攻。这次炮火比第一次更猛烈、更集中。埋伏在村南碱土岭子里的敌人，看没有上他们的当，也往村里开火了。

这时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敌人越来越疯狂，战斗越打越激烈。民兵和乡亲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自卫队战士田绪荣中弹牺牲，他父亲接过儿子的枪立即向敌人射击。民兵田成香被流弹震昏倒在地上，他爱人胡月梅拿起丈夫的武器，带着复仇的怒火，第一枪就打死了一个鬼子，子弹打完了，就抓起了手榴弹投向敌群，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民兵周庆林头部负伤鲜血直流，仍坚持战斗。老自卫队员周茂盈越来越勇，右腿负重伤不下火线。老猎手周茂庆举起猎枪，拿出当年打野兽的威风连续撂倒好几个鬼子伪军。击鼓老人周荣敬为了鼓舞士气把鼓敲烂了，又吹起了号角。七十多岁的田大娘，看到炮手负伤后，不顾一切，点燃老抬杆，炮炮都在敌群中开花……。

战况越来越危急，民兵自卫队的阵地越缩越小了，子弹打完了，就抓起了手榴弹，手榴弹甩完了，又拿起大刀片、木棍等，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粪叉子、锄头、铁火棍、菜刀、长矛……在战场上都发挥了威力。敌人爬墙头了姑娘媳妇们就用菜刀砍敌人的手，鬼子进胡同了，老乡们就用棍子打、锄头砸、大刀砍、长矛刺……。

正当全村老幼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南面东南面响起了我援军的枪声。军分区主力部队，在我县大队、区队和各村联防队的配合下赶来了。他们包抄了敌人的后路、使我们的战斗形势霎时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同志们，乡亲们听到我援军的枪声，情绪更加激昂、敲锣声、击鼓声、号角声、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响彻云霄。敌人一发现被反包围了，顿时乱成了一窝蜂。也顾不得巷战了，丢盔弃甲，拔腿就跑。

敌人刚逃到村东头，就被我军分区主力部队截住了。一阵猛烈的炮火，打得鬼子、汉奸、鬼哭狼嚎。敌人腹背挨打，伤亡惨重。小钢炮不响了，轻重机枪也哑叭了，马匹乱窜乱叫，枪支弹药丢的一片狼籍。小野的帽子被打飞了，战刀被打掉。翻译官的望远镜等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谢金奎被打下马，几乎被活捉。同时，我们还拿着话筒，向伪军展开了攻心战：“伪军弟兄们，放下武器吧！小日本狗命不长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光荣，当汉奸可耻！”果然，有好些伪军，双手举起武器，跑到我这边来了。

敌人的偷袭进犯，就这样又被我们击败了！

这时已是早晨七、八点钟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我全体军民在西太平庄胜利会师了。太平庄的抗日联防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聊城抗日县政府从成立至聊城

解放期间的工作片断

李诚

一、聊城抗日县政府演变经过及主要干部配备情况。

聊城抗日县政府是一九四〇年初成立的。县长是张武云，秘书孙寒光，财政科长李诚，粮食科长杜灼（又名杜润如）。那时由于环境恶劣，敌情紧张，我们武装又很少，因而，秘书、科长，夜间轮流在村头站岗，工作是隐蔽的，加之群众不了解情况，对抗日政府缺乏认识，不光不准住宿，还有的拿出红枪来示威，故，只好在村外地里住一夜。如在二区太平庄南碱土岗子里，我们不止住过一次，后经向群众宣传解释，，或利用熟人关系，才让住下来。

一九四〇年秋，县长换了牛连文、孙寒光调走，秘书孟筱澎（又名石磊），李诚改任实业科长，郝子修任财政科长。一九四一年春，牛连文调走，张侠来任县长，华川任秘书，李惠民任民政科长。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成立公安局，李诚任公安局长。胡学伦任司法科长，许维任财政科长，×××任武装科长，付懿远任过一个时期的秘书。

聊城抗日县政府初成立后，短时期曾归冀南专署领导。王笑一专员，周持衡秘书在聊西圣庄开会接收的，当时还接受范筑先组织的聊西抗日自卫团（范筑先发的公章），团长

李道一，共有一百余人。王笑一向自卫团讲了话，作为聊城抗日县政府骨干力量，继续在聊西一带活动。范筑先时的第三支队齐子修已叛变投敌，夏天占据了聊西一带。三支队的一个旅长邵继胜住李海、白堂。抗日队伍在这一带不能活动，在莘县北部桃家楼被日本鬼子包围击散，只剩下李道一、李修身、朱立平三人。找到王笑一专员，又重新组织队伍，成立聊西办事处，新组织的这批队伍作为县大队，刘泮溪任秘书，李道一指挥武装，准备向东开发地区，走到沙镇东王楼，又被叛徒王奎一部队包围击散。李道一从此离开大队去冀鲁豫行署任参议，他在莘县北部、冠县东部活动。群众没有不知道的，聊城抗日县政府逐渐向东，在城南、城东南的聊阳边，聊阿边活动，这时又归六专署领导。牛连文同志来了后，为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聊城抗日县政府，改为筑先县抗日政府，聊城解放后又改为聊城县政府。

二、聊城抗日县政府的主要工作情况

（一九四〇——一九四六年）

聊城抗日县政府初成立时，只有武装二、三十人，名为二中队，李景山任队长，枪支多是本地造，子弹也很少，有阳谷县的四大队徐翼同志来聊城掩护县政府的活动。在聊西成立了一个区，李士彬任区长，时间不久，打仗时被日本鬼子俘虏，叛变投了敌，以后县政府的武装继续扩大，才自己独立活动。牛连文县长来了后，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一举建立了四个区，城南为一二区，东南为三区，城东和城北为四区，一区区长谭浩庵，二区区长韩效民，韩牺牲换了谭启明，三区区长张佃一，四区区长白东白，后又换了王梅轩（民主人

士)。四个区建立后开展的工作概况。

1、组织民兵配合政府抗击敌人，建立根据地。

牛连文调走，张侠同志来了后，环境逐渐恶化，敌人不断出来烧、杀、抢、掠，群众非常恐慌而又痛恨，于是向群众展开宣传工作。教育群众，组织民兵协助政府抗击敌人，保卫家乡，保卫财产，群众逐步有了认识。又选择地方上同情抗日，在群众中较有威望的民主人士吴汉三先动员起来，协助开展民兵工作，所以很快就组织起民兵联防大队，吴汉三任大队长。白天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夜间民兵守卫，逐步形成了抗日根据地，敌人来的少了就抵抗，多了就掩护群众转移。民兵战斗有名的是二区太平庄，日本鬼子以为该村住有八路军，拂晓时将村子包围起来（其实并没住八路军），该村长周茂铎则立即号召并组织群众英勇抵抗，连妇女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有的牺牲了，任何人也不准哭，一直坚持七、八个小时，敌人始终没敢进村。县大队闻讯后，急忙跑去支援，进行外围攻击，迫使敌人退走，根据地的群众觉悟提高了，都拥护自己的政府，自觉地向抗日政府交公粮，敌人也不敢向根据地去催粮。

2、挖路清沟，旁种麻子，便于隐蔽，开展游击活动。

根据平原地形特点，为搞好隐蔽，有利开展对敌游击活动，当时，把村与村相通的路均挖成深沟，并在路旁种上麻子。这样搞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致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3、协助农民种地生产，爱护群众，和群众建立密切关系。

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在农忙时帮助群众生产收割，替

老弱打水扫院子，并严守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而，党群、干群形成了鱼水关系。

4、坚壁清野。

聊城城内的敌人不断出来扫荡，烧、杀、抢、掠，我政府便号召农民群众以坚壁清野的精神将粮食衣物等藏起来，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就采取在地里挖坑，用泥坯铺底，四周用泥坯砌好，盖好，这样一般不容易过潮。敌人若来了，便把被褥搭在牛身上牵着就走，所以敌人什么也抢不了去。

5、开展敌伪工作。

聊城环境最恶劣时，到处是据点，碉堡，封锁沟，纵横相离不过五、六里，最远十余里，敌据点最少有敌人一个中队，碉堡有敌人一个班。封锁沟纵横交错，深、宽都一丈多。给我们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为此，我们就大力开展敌伪工作，利用打入敌内部的情报人员，及时掌握敌情。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在敌人范围圈子里活动。

6、自力更生建立修械所，修理枪支造子弹。

我们的枪支本地造多，打一次仗要坏一些，子弹也很缺，因此，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收集过去在东临工厂造过枪的人成立修械所，枪支坏了及时修理，打一次仗要把子弹壳拣回来再造子弹，这样，我们能坚持长期打击敌人。

7、坚持镇压反革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树立民主政府的威望。

我们和敌人的斗争非常尖锐，凡是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坚决予以镇压，举几个例子说明如下：

①、军王屯据点里的汉奸区长兼剿共班长和红枪会头子王殿明，非常反动，人人痛恨，我抗日县政府决定由县公安

局付局长张宗谦指挥，挑选英勇的公安战士代伯明、杨金玉和县大队的韩学水三人进据点枪决王殿明。县大队一个连在外面准备迎接，他们三人伪装成农民，扶着高粱叶，里面藏着枪，解决了大寨子、小寨子的门岗后，直接闯进院子里，汉奸正在院子里开饭。王殿明在北屋吃饭，代伯明走到门口，第一枪没打中，王殿明钻在桌子底下，顶着桌子往外跑，被屋门挡住，于是他从桌子底下钻出去，被另一同志接连几枪打死在院子里，其余的汉奸都钻了床底，三个人立即撤出来，这时围子外边也响起枪来，汉奸始络未敢动。

②派武工队长韩学水和侦察股长孟克同志，带着战士利用夜间到聊城东关米市街治安军团付家中，将伪团付和一个通讯员抓来，后经教育转送到了军分区处理。此举，大大威胁了敌人。

③派公安队员夜间到聊城东关，将抓我们的家属的伪警官从家里捉来给予镇压，安慰了家属，警告了敌人。

④、派人到敌占区将叛变投敌分子许风程捉来，给予了镇压，打击了敌人，巩固了自己的队伍。

⑤、拔除位庄伪据点前，派我们的村长韩学生（灰色的）到据点里将汉奸小队长代理中队长的张子顺诓出来，说他母亲病危让他回家看看，张便随韩出了据点先到了韩家里，公安局得信将张扣了起来，接着我们的队伍拔除了位庄伪据点。

其他如办教育，成立抗日学校，培养革命下一代，为避免敌人袭击，背着被子经常移动上课地点。

8、抗日人员的生活情况。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好年景

吃小米白面，灾荒年就吃糠咽菜和树皮，特别是高粱壳、玉米芯、棉花籽等混合磨的面子，吃后大便下不来，穿的衣服，一般夏天一身裤褂，冬天一身棉衣，不论冬夏，都是和衣而睡，以便有了情况马上集合出动，环境紧张时，常在野外庄稼地里睡。致使衣服破烂不堪，虱子特别多，最明显的是开会时，一面开会，一面摸虱子，有的虱子钻到烂棉袄里，捉不到它。成群接队一小堆儿。可是，一想到天下老百姓的痛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杀敌更猛。

三、一九四六年围攻聊城的部队的番号和主要领导人姓名：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拂晓开始围攻聊城，那时的主力部队是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共三个旅。四旅旅长孔庆德，五旅旅长雷少康，政委冠庆延，六旅旅长周发田。地方部队，东面来的是六分区，司令员罗仁全，下边有二团，团长张××，参谋长谭浩庵，此外，还有六团，团长岳舜卿，七团团长×××，其他是县大队。西面来的是冀南军分区，司令员是赵健民。二十四团团团长李善亭，其他是聊堂县大队，冠县大队，莘朝大队。

四、关于我方派三个代表准备进城交涉，叫敌人放城内老百姓的问题。

我们的部队快要攻开聊城时，美国搞三人小组谈判停战，停战后，聊城仍在我们的包围中，这时逢上级指示，派代表进城和敌人交涉，三个代表是：有冀鲁豫军区第六公安分局局长孙寒光，聊城县公安局长李诚，另外是军队二纵的

一个同志。确定代表不带枪，警卫员可以带枪，警卫人员是第六公安分局公安大队长段亭，聊城公安队长李福和代伯明，周仪安两同志。我们在东门外水桥上，桥里面是敌人的岗，桥外面是我们的岗，城墙上站满了敌人，托着枪，我们将三人小组的公函传给敌人，在桥头等着，等了一个时间，敌人传出信来说，叫我们再等等，他们的旅长王金祥来接我们，等了好长时间没有音信，再催，又说开着会哩，叫我们再等，再催，又说他们旅长不知那去了。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那天是阴天刮着东北风，天气很冷，这时宋政委披着大衣也来到小桥上。显然是敌人不让我们进，经请示我们回来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艰难的岁月里

杜仲文

侵华日军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于一九四二年秋，集大批日伪军向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濮、范、观地区发动疯狂的扫荡。“九·二七”大扫荡后，日伪又向各地县抗日根据地扫荡，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的建设。此外，还增设了一些日伪据点，致使抗日根据地缩小，抗日斗争处于极为困苦艰难之中。

聊城县地处大运河东西两边，敌人十分集中，绝大多数村庄为日伪军统治，仅有城东南孙堂、李海子、魏庄、杜庄等一、二十个村庄是我们抗日政府和部队活动的根基地。而且，这些村子离敌伪据点很近，近的几里路，远的不过十里左右。当时，七级镇、周店、刘道之、花牛陈等都是日伪据点。日伪军经常出来扫荡，使这一带村庄处于紧张的斗争中，群众说：“这是一枪打透的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十月间，日伪军集中兵力向聊城县仅有的这一小块根据地发动了扫荡清剿，抢掠破坏极其残酷。并在魏庄、太平庄、刘皋、姚庄、中杜庄、东洼等地安设了据点。他们不仅时而外出抢掠，而且向群众要粮要钱，强迫群众给他们修碉堡，挖大封锁沟（从周店经魏庄到王官庙，挖了近二十里长的大封锁沟），以便于他们消灭抗日力量。同时，为防备我军袭击，竟把这一带群众赖以生活的枣格子的

树砍掉拿去围在碉堡周围。致使群众遭受莫大苦难。

当时魏庄的上层人物吴世杰家中也被日伪军破坏。因而，他也随抗日县政府活动，并带出部分民兵。我家（东杜庄）也是遭受敌人摧残很惨的一家。当时，村上其他人家虽受蹂躏，但，舍不得家，还在村上居住着。唯独我家人不能在家居住，全家十多口人，只好逃散到外村亲戚家暂住。（因为我父杜尚杰在村上曾当抗日村长，加之我在外搞抗日工作）。这年当地逢有旱灾，秋收的粮食和家物等都被汉奸抢劫一空，全家人为此也只好逃到外村亲家，以后，为了解决家人生活困难，又通过关系把土地廉价卖掉一部分，买点粮食，加上亲戚的帮助，才得以勉强度日。

我们这一带村民由于受到抗日的宣传教育和对敌斗争的锻炼，抗日爱国的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对日伪军恨之入骨。因而，广大民兵都积极配合抗日游击队搞反扫荡，袭击敌人，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捕捉敌探等活动。并有一部分精干民兵暂时脱产，随县政府县大队开展对敌斗争活动。当时，我弟弟杜仰斌即参加县大队三中队（即我们这一带村上的民兵暂编的一个中队）搞负责工作（指导员）。当时，县大队长是马锐锋。县大队只有两个中队（一中队指导员是杨诚同志，二中队指导员是梁景星同志），一共一百多人，加上我们暂编的三中队也不超过二百人，这支很小的抗日部队是聊城县主要的抗日力量，在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平原地区坚持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好在人心是向我们的。我们多在夜间行军活动，往往是在日伪据点很近的村庄夜宿，并得很快转移，防止敌人袭击。

我们所到之处，群众不光积极给我们腾房子，筹粮柴帮

帮助我们搞饭吃；而且，主动给我们传递消息，报告敌情，有的还密报危害抗日军民的不良分子，使我们政府及时采取了措施，做到防患未然。

那时，我在县大队一方面负责三中队的领导工作，一方面在县长张侠和县武装部长韩效民同志的指导下，注意搜集魏庄日伪据点敌人的情况。根据张侠县长的指示，我兄长仰孔设法仍回魏庄据点，弄清日伪军情况，以便内外结合袭击魏庄日伪据点，回想起来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通过内外配合进行工作，基本搞清了魏庄日伪据点的情况。于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夜间，由分区三团及县大队配合袭击了魏庄日伪据点，当时仰孔已打开敌据点门，但因部队调动不及时，加之敌据点兵力强，而没有攻开，就撤退了。

自此以后，日伪想方设法追捕我家的人。汉奸队长陈长柱指使汉奸小队长杜金刚带着汉奸兵多人到我家抓我家人（还有我村上汉奸杜茂清等人参加），我父母等人为了逃避敌人的抓捕，虽远去东阿县官庄村亲戚家躲避，但汉奸因在家抓不到我家的人，却把我家族叔杜尚员抓到日伪据点活活整死了。此时，我家中及叔父家的人极度悲伤，其困境可想而知。

在这困苦艰难的时日，我仍在县大队工作，以后因三中队是暂时脱产的民兵，有的正式参加县大队，有的就回乡去了。我被调到了一中队工作。部队一方面与日寇汉奸做斗争，一方面帮助群众生产，并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回赎的斗争（因一九四二年大灾荒，有些贫农因无粮生活，很便宜的把土地卖掉，按政策应支持贫农把卖掉的土地赎回来），因而深得基本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到一九四四年春，我就调到聊城县三区，后又到二区委作

地方党的工作了。那时，常到日伪据点花牛陈附近村庄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四五年秋，侵华日军投降了，魏庄等日伪据点的敌人也逃窜了，我的家乡杜庄一带村庄终于解放了。当时群众争先恐后地抢先去摧毁日伪的乌龟壳，以后还积极地挖土填平大封锁沟，恢复田园，种地安家。我家人回到了家中，一贫如洗，只好重建破烂不堪的家园。在无耕畜农具的情况下，安家种地糊口困难不少。但环境安定了，心情舒畅了，可以用自己劳动的双手把家园建设好。年迈的父亲回家后在整顿破烂的家时，却在家中挖出一些铜钱，这是前几年敌人扫荡安据点前我父亲给抗日政府挖坑存放的，日伪军没有搜挖到，这次挖出来了。我父亲将这些钱又主动交给了政府。

月八日

编注：杜仲文同志系山东聊城市于集乡东杜人，一九四四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贵阳市政协工作。

在二区委工作时情况

杜仲文

我是于一九四四年底由聊城县三区调到二区委工作的。

当时，二区虽基础较好，但周围有一些敌伪据点。因此，时而受据点内日伪军的出动袭扰，致使群众生产、生活很不安定。区委、区政府也不能固定地点工作。

我去二区后，区委是由沈廷梅（区委书记兼抗联主任）姜力民（兼区长）、孟景侠（组织委员）和我（宣传委员）等人组成的。后来刘泽民同志调来任区委书记，沈廷梅任付书记兼抗联主任。由于环境关系，区委、区政府除及时了解和应付敌情外，主要是发动组织群众，推行抗日政府的政策，法令，反对资敌等斗争。为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区委成员实行了分片负责制。沈廷梅、孟景侠等同志主要在孙堂、于集一带，我被分配到二区东部沙店集，白庄一带。

沙店集、白庄这一带有一、二十个村庄，我们的工作基础很差，有些村庄是新区，尤其是沙店集、贾庄一带，离日伪据点花牛陈很近，不光时常受到日伪汉奸的抢掠，民不聊生，而且这一带村庄封建势力较大，还有坏人通敌，迫害群众。我抗日游击队长梁伯河被花牛陈的红枪会头子陈玉怀于一九三九年在二区贾庄附近杀害的。还有二区助理员杜传新也是在这一带被坏人杀害的。

和我一块工作的，开始只有四个干部，以后增加到七

个，我的记忆，有赵思源、张廷贵、王明、孟××等同志。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抓点带面。选择了离敌伪据点较近，而封建势力较大的沙店集作为重点。深入到村，与贫雇农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疾苦，取得群众信任，密切了干群关系。我们则因势利导，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和阶级斗争教育。首先依靠雇工王××串连组织了贫雇农小组，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斗争。经过反复的教育发动，几十个贫雇农小组成员对地、富提出了增加工资、减租减息等要求。首先和大地主张万明进行了说理斗争，地主张万明在贫雇农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了要求。因而，其他地富也相继答应了贫雇农小组的要求。斗争的胜利使广大贫雇农群众享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改善了生活状况，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

当时，我们趁热打铁，进一步依靠贫雇农组织，发动组织更多的贫农、下中农，并团结组织中农，开展了反资敌及地富隐瞒土地转嫁负担等斗争。基本群众在贫雇农小组和工作组的发动支持下，继而成立了农会，选出了赵文善、赵文明等农会负责人，依靠农会组织贯彻合理负担政策、法令，进行反对资敌等斗争。

过去有的群众虽然知道地、富隐瞒土地和转嫁负担等不合理的问题，但由于村政权被地、富把持，群众没有组织起来，也就敢怒而不敢言。自有了农会组织和工作组的支持，基本群众敢于进行揭发斗争了。由农会组织出面，先找几户隐瞒土地较多的地、富进行说理斗争，打开局面，而后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并令隐瞒土地的地、富自报隐瞒土地数量，把地亩负担搞合理。为了发动群众，并对较顽固而隐瞒土地

较多的地、富，经农会评议，令其补交因隐瞒土地而少交的钱粮。这些地、富补交的钱粮由农会作为胜利果实进行分配。这样农会不仅从政治上取得胜利，而且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由此群众抗日、反封建压迫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为保卫斗争果实，村上很快组织起民兵，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的活动，使群众得以安心生产。由于村农会组织的优势，村上没有人敢资敌了。当时，村政权基本上为农会所控制，村上摊派钱粮等要首先取得农会组织的同意才能进行。农会还对村政权的财务账目进行监督清查，防止营私舞弊。另外，对妇女进行发动组织，成立了妇女会。还开办了小学，对青年、儿童进行抗日教育，这样在离日伪据点很近的村庄也听到抗日的歌声，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

点上的农会骨干，不仅负责本村的工作，还在工作组的带领下到外村发动组织群众。因此，周围村的基本群众也很快发动组织起来了，对个别恶霸地主进行了控诉和说理斗争。当时，经过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敌伪和封建势力大为削弱。在斗争中不断涌现出一批批农会骨干。如白庄的白成庆（党员）、白固堆的白林盛、沙店集的赵文善、牟庄的牟文月、贾庄的孟光斗、李庄的李风桐、金吕庄的金学海等同志。他们由于在斗争中受到锻炼，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逐步认识了共产党的性质及共产主义的道理，先后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由于发展了党员，有的村便成立了党支部。这样，抗日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落实更加有了保证。

抗日根据地的逐步扩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一九四五年，我军向城乡日伪据点攻击时，这一带村民不仅筹了一批粮、钱，还派出了一些民夫、担架，对抗日战争做出了

一定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年底，聊城县由于根据地扩大，我由二区调到八区委工作，以后调十二区委（后改为聊城县二区）任区委书记。一九四九年春南下，先到江西省，后到贵州省三穗等县工作，一九五〇年底调贵阳市委工作。我时常想念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怀念那里的群众和党员。那时二区金吕庄的农会积极分子、党员金学海同志，以后脱产并随军南下到贵州省铜仁地区工作，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虽平反，但每当念及，哀惋之至。

一九八五年春

忆国、共、美三方代表 在山东省筑先县（聊城）和谈片断

（一九四六年二月）

张 侠

一、谈判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了。它是被中、苏、美联合力量打败的。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日寇铁蹄所至，狼烟四起，庐舍为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奸淫。国民党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并采取积极反共政策，指示其一部分留在敌后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等人员投降日寇，搞所谓“曲线救国论”，利用或配合日寇直接残杀我敌后抗日党、政、军、民，其残忍程度在某些方面不逊于日寇，而山东省筑先县（聊城）的国民党投降人员在这方面更甚。

聊城在鲁西北，是辖附近几十个县的重镇，是历代统治者的必争之地。该古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修葺加固，城河之宽，城墙、城门之固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城池，能够与之相比，城内还矗立一座全国少有的钟古楼。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该城被日寇攻陷后，范筑先将军英勇殉国。以王金祥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由在范筑先时代

的“明抗战暗反共”，变为直接勾结投降日寇，联合日寇，共同反共、反人民。聊城失守后，国民党委任王金祥为聊城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又呈报委任齐子修为保安副司令。齐对外号称有九个旅三万余人（实际只有万余人）。一九四一年王、齐命九旅副参谋长王克庄和该旅营长赵振华，付崇鲁等率部公开投敌参加伪军

齐部三次公开投敌约一千余人，其余部队也和日寇、伪军一样，在我抗日根据地周围和内地大肆修筑围寨。他们与日寇、伪军的驻地仅相距十几华里或三、五华里，彼此互不相扰。眉来眼去，并配合日寇或亲自率部攻打我抗日军民，这些民族败类所实行的政策和日寇一模一样（三光政策），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曲线救国论”作为遮羞布，不但不以投降日寇当汉奸为耻，反认为这是在敌后保存扩大势力，反共反人民的良策妙计。所以，日寇宣布投降后，这部分在八年抗战中为虎作伥，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无耻之徒，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他们龟缩在城里，接替了日寇的防地，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伪政权、伪秩序、伪人员，对我抗日军民负隅继续顽抗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我筑先县（聊城）党、政、军、民根据毛主席发表的《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的精神，团结一致，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拔掉城外所有敌伪据点，平掉所有敌伪壕沟，解放了广大农村老百姓，将这一股伪顽党、政、军团团包围在弹丸之地古城里。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城外周围挖了封锁沟，敌人不投降就困死其城里，我抗日军政机关随即迁移到县城东关，抗日民主县政府、县大队均住城小东关博聊关小学，八路军主力三纵十团住城大东关。

二、谈判经过

饱经战争磨难的筑先县（聊城）人民，听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地投降，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抗日军、民多么渴望有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民阖家又多么渴望能够团聚，在一块好好的过上几天好日子。但人们的美好愿望却变成泡影。靠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军火横财参战又晚的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侵略者，在八年抗战中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代替了汪精卫，中国广大抗日人民前门赶走了两只狼，却从后门又窜进了两只虎，这些屠杀中国人民不眨眼的刽子手们，时刻从没停止向人民进攻。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美帝国主义随即动用他的大批军舰、飞机不分昼夜地把蒋介石的正规军以及作战物资运到被我党、政、军、民正要解放的大、中城市，以及其他战略要点和解放区前沿。我筑先县天空刚显露出一线曙光顿时就被美帝国主义运送蒋军的飞机和内战乌云遮盖住了，黑暗的气氛笼罩大地，沉闷的空气使人们喘不过气来。人们欢庆胜利的笑声顿时被飞机嗡嗡怪叫的嘈杂声以及城里伪军趾高气扬的漫骂声所吞噬了，人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因这时全国性的内战未准备就绪，就一面加紧内战准备，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如美、蒋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以及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搞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进行所谓“调处”。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成立了山东省济南执行小组，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二月初济南“三人小组”来

到我筑先县（聊城）进行所谓调处，我方代表是宋任穷同志和邝任农同志，国民党代表是张叔衡（少将），美国代表是戴维斯（少将）。国民党代表还隐瞒了身份，自称是校级官衔。筑先县（聊城）地方代表由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陶东岱同志和我作为该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也参加了这次和谈。

我筑先县（聊城）党、政、军、民在当时物资极端缺乏，地方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奉上级命令怀着亲切盼望和平的心情，积极做好筹备工作，为即将到来的“三人小组”提供良好的食宿条件。住宿所用被褥、床单、枕头统统是新棉布做的，酒会宴席所用山珍海味，高级名酒不惜用高价到外地采购，并动员了全县所有名厨师前来掌勺。所有上下服务人员不分昼夜的为其提供殷勤的服务。上上下下和全县人民都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一天的下午四点多钟，三方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共约五、六十人分别乘大、小汽车二十多辆直奔我抗日民主县政府以及我八路军二纵十团防地——筑先县（聊城）而来，美国代表乘的是大型吉普车、自带行军睡具，代表们除在县政府安排一部份外，其余的被安排在附近学校，教堂等处。

代表们住下吃过了晚饭，十九点左右代表们来到东关天主教堂（美国代表住址）进北门往东拐一排平房北屋通间里，它象个大会议室，在灯烛辉映下，桌子接桌子用白布罩起来的长方形会议桌，显得格外交雅，代表们按名字依次就座开始了谈判，美国代表这晚托病说身体不舒没出席会议，当晚据伺候美方代表的我方小服务员张杰同志报告：实际上美代表一点病没有，还暗地给他些钞票美金说是给他的小

费。叫他有些事要保密等。张杰同志将所谓小费如数交给了领导上，国民党代表全体出席，我方首席代表是宋任穷同志出席了会议。

双方见面寒暄了几句后，国民党首席代表张叔衡谈判，一开始就以骄横的态度宣称他们这次来聊的任务，就是执行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强调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以及执行经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先生签署的文件（实际是诈讹），来此改编城里的这部分驻军为正式国军的，其他所有行政文职人员继续供职等候调迁。另外他还要求我方迅速修复所占区交通公路、桥梁等。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文件包里拿出所谓北平“三人小组”签署的几份文件，在手里不停地摇晃着，以此来施加压力妄图压我们接受由他们改编城里所谓驻军的方案。

国民党代表发言后，以宋任穷同志为首的我方代表发言，我方在发言中根本没有理睬他们的所谓什么文件和“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而理直气壮地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城里伪军在八年抗战中对聊城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指出这部分伪军根本不是什么，也不可能编成什么“国军”，而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如果国民党中央政府将这些民族败类改编为中央军，那么中央政府的立场就无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站在一块去了。这是筑先县（聊城）全县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双方代表这样的激烈辩论持续到凌晨的两点多钟，历时七个多小时，最后直到我们将国民党代表驳得目瞪口呆体无完肤才散会。

会后我方人员又在宋任穷同志的主持下继续开会，商量

天亮后的对策。大家一致意见是：（一）发动全县受害群众推选代表，用铁的事实来向美、蒋代表控诉城里这部分汉奸队伍以及其他伪职人残害群众的种种罪行；（二）在会上继续揭露批驳美蒋的假和平真内战阴谋、以及所谓“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谬论。我们谈判的指导方针是对和谈不抱任何幻想，不相信美、蒋代表的“好话”，不害怕美、蒋代表的恐吓，站在自卫立场上，根据朱德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发布的关于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的命令精神，即凡被我抗日军民所包围的城里伪军和其他伪行政人员只有我军有权收缴其武器，按其罪恶大小处理。至于公路和桥梁的修复问题，待被围困的城里和其他据点的残敌受降或被处理后，我们自然会进行这项工作的。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

早饭后我们按照会议的决定分别行动。上午九点多钟陶东岱同志和我准备继续参加三方会议，但因国民党首席代表借故说是由于昨晚参加会议疲劳过度病倒了，不能出席会议，致使会议未开成。当时我们分析，他是被我方驳得理屈辞穷，无地自容而不敢参加了，虽然会议没有开成，但三方每时每刻也都没停止自己私下里的活动。

这一天，美、蒋代表频频接触，并派人与城里伪军、政头目联系，让他们推选代表出城和我们见面并出席三方的正式会议，我方只允许他们和我们接触，不同意这些罪恶多端的伪军、政头目们和我们坐在一起出席三方的正式会议。三方就此达成了口头默许。

第三天的上午，城里伪军头目×××和伪县长×××等十几人，所谓“代表”出城来了。仇人相遇格外眼红，我们

一见这些汉奸卖国贼就怒从心头起。这些所谓的“代表”身穿各种颜色的便衣，头戴大小不一的瓜皮等杂色帽子，多是大烟鬼白面客（海洛因毒品），脸色腊黄，个个瘦的皮包骨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是风吹就倒，精神萎靡不振，见我们后耷拉着脑袋，说话少气无力。有的还带着近视眼镜，镶着几颗金牙，说起话来闪闪发光。满口是国民党和汉奸的腔调。如说“敌人在城里给日本方面供职，是奉上峰的指示和命令，是权宜之计，现在日本方面投降了，应遵照中央政府蒋委员长的训令办事”等。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

我们当场质问这些民族败类们说：“你们的上峰是否指示你们和日寇一道残杀中国人民，一道对中国人民施行‘三光政策’，一道奸污千千万万的中国无辜妇女”，问得这些坏蛋们低头不敢正视我们，无言答对，只是嘘声嘘气结结巴巴地用“这都是过去的事啦，是误会”等言词来搪塞。

这时我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代表控诉团象潮水般地涌来；代表们住满了城东关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庄，并带来了大批血泪斑斑的控诉材料和物证。很多受害致残的典型人物也亲自来了。这些汉奸卖国贼见势不妙，就想溜回城去。但是回城必须路过四、五华里的东关大街，大街两旁这时已站满了愤怒控诉的群众，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向他们讨还血债！”愤怒的吼声惊天动地，振耳欲聋，锣鼓声，喇叭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事前要不是规定了“只准动口，不准动手”的纪律，群众准会把这伙卖国贼撕成碎片，这些家伙们见了怒不可遏的群众，个个象惊弓之鸟，丧家之犬，灰溜溜地通过人群，争先恐后，抱头鼠窜，跑回了城里。

群众代表以后又分别聚集到美、蒋代表团的住地，要求

美、蒋代表出来接受对城内汉奸、卖国贼的控诉。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美、蒋代表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国民党代表借病龟缩在屋里宁死也不敢出来和群众见面，只有美国代表还貌似公正地，走出屋来，站在大汽车上、高台上，挥舞着两只大手，摇头晃脑装腔作势地向愤怒的群众演讲，他阴险狡猾地说：“我们美国是公正的，是来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的。听了大家的控诉我深表同情，请大家先回去好好过日子，我一定公正地处理问题”等。想以花言巧语来搪塞迷惑群众。但群众不听他的那一套，住下来未走。

第二次谈判是在第三天的晚上，国民党首席代表还是“托病”不出席，美国代表也均未出席。只是国民党其他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那副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的态度消失了，但一接触实质性的问题，如城里伪军应由谁来受降问题他们就采取玩弄推、拖、磨的手法，重谈原来的老调，如说：什么这是上峰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啊！他们的首席代表有病未能出席，有些事情他们不好说，不能当家啊。等等，就这样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磨蹭到凌晨一点多。结果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只好未果而散，但美、蒋收编伪军的阴谋也未得逞。

三、结尾

美、蒋代表第四天见情况对他们不利，便单独离开我县溜回了济南。他们走后，宋任穷同志又召集我方全体与会同志开会，总结这次谈判的经验，我记得大致有如下三条：一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对敌斗争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只要好好的学习，认真贯彻执行，就能克服困难。

二是我们共产党人时时刻刻不管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我们就战无不胜。这次谈判国民党代表刚刚来不是气势汹汹，拿着所谓“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文件来压我们吗？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但只要我们立场站得稳，有党中央、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精神，我们就能打败任何强大凶恶狡猾的敌人。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只要发动起来了，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次群众对城里伪军控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会后，我方所有代表全部离开本县，各地来的群众代表控诉团也陆续返回自己的家乡，至此三方代表和谈暂告结束。城里伪军仍然继续被我军、民紧紧地围困起来。

1985年6月初稿于郑州

反“国际救济总署”资敌片断

张 侠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共、美三方在筑先县（聊城）和谈，美蒋收编城里伪军的企图失败后，我们即向城里伪军政头目们提出将城里无辜的居民放出来谋生，由我方负责安置救济，解决其生活问题的建议，但敌人怕居民出城后涣散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因此不准城里任何一个居民出城，如果有人出城即按“私通八路”论处，这样以来，被围困在城里的伪军、伪职人员以及广大居民从日本宣布投降至今已八、九个月之久，生活陷入极端困难之中。

在此期间，敌人夜间曾派小股部队到城外抢粮，均被我军打垮截获。国民党在济南曾用飞机向城里伪军空投物资，我军虽无飞机截击，高射炮阻击，但我围城部队用步枪、机关枪射击，迫使敌机由低飞改为高飞，所投物资降落在城里寥寥无几，而大部分物资飘落在我军阵地上，敌人象饿狼一样为了争夺空投物资经常发生械斗，互相残杀。

国民党空投失败后，于是又和美帝国主义策划出了另一个资敌阴谋，打上国际救济总署的招牌，以救济城里居民的名义，向城里伪军运送物资。五月初的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在“三人小组”（国、共、美三方代表）护送下，从济南乘五辆吉普车，十二辆大卡车（每辆载重5—8吨）满载生活物

资，直奔我筑先县（聊城）城而来。

这时，县委书记陶东岱同志和我以及其他县委负责同志，均在博平县城里参加由地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忽有县政府秘书唐立全同志派通讯员持信而到，说：“接署通知，‘三人小组’今下午到筑先县叫你立即回县政府”。

我给陶东岱同志看了来信，交待了几句便急忙带上通讯员刘登基（憨二）、王正印同志骑马返回县政府驻地小东关博聊关小学。到达时已下午七点多钟了。只见县政府秘书、科、局长到一般干部、公务人员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为“三人小组”筹备食宿哩，好在我们有上一次接待三方谈判代表团的经验和条件，食宿问题很快就安排就绪了。这次来的人数和二月份差不多，只是汽车司机和其他杂务人员多了些。

八点多钟，夜幕降临，城里边漆黑一团；除敌人岗哨口令声外，是座阴森寂寞、恐怖可怕的古城。而城外东关却是千家万户灯光点点，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县政府和“三人小组”住处里里外外布置得灯火辉煌。不一会儿我哨兵跑来报告说：“由聊东北杨集方向公路上开来了一辆汽车。”

这辆军用吉普车直开到县政府驻地门口，从车上钻出来了一位身高一米六、七，体壮，魁梧，脸白，两眼炯炯有神，约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军官，身穿草绿色军装，胸前佩戴有闪闪发亮的“中共代表”字样的徽章。他下车后我便大步迎上前去与他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也自我介绍说：

“我姓高，叫月明，是中共代表”，他又说：“大批车队在后边，我眼前的任务是通知驻军哨卡放行”，说完他要求我马上将他领到一个僻静屋里去，有要紧的话要说。

我急急忙忙将他领到一个屋子里，这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他神态紧张严肃地说：“这次美、蒋代表来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昨晚在济南国民党省政府设宴招待赴聊执行救济任务的三方代表，宴会上主席何思源对我说的尽是一些奉承、颂扬恭维的话。什么高代表如何英俊、精干啊！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这次赴聊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等。但饭后他却叫我一个人到隔壁房间休息，自己和美蒋代表嘀嘀咕咕地谈到凌晨一两点钟。他们一定有鬼”。

高代表又说：“我分析何思源除给美蒋代表口头交待有任务外，还可能有给城里伪军头目王金祥的信件，这信件藏在车队什么地方，或藏在什么人身上，我还不知道。我认为他们名义上是将这批物资运往城里救济居民，实际上是给伪军的，反正他们这里边有鬼，但不知鬼在什么地方”。

接着他又说：“如果你们要检查他们，我在跟前不好说话，最好我回避下，你们就说我有病去医院了。县长同志，这事，由你们地方定吧”。

这时，县委书记和专署、军分区负责同志没有一个在聊的，驻军围城的仅有二纵十团苏参谋长在此。在突然发生此事的紧急情况下，只能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对此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确实难啊，但还必须当即立断。最后决定，只好先将高代表安置到一个僻静地方，然后我立即派人将苏参谋长请来，将情况扼要地介绍一下，问他说怎么办好啊。苏半开玩笑的说：“县长同志说怎办就怎办，咱部队保大驾就是了”。我说先通知哨兵将他们放进来吧，待他们来后，今晚无论如何拖住他，不能让他们进城，另外派人火速到军分区报告，请军分区首长快来。苏参谋长同意后，便通知哨兵放行。

刚布置完毕，车队已来到了县政府驻地后边大操场，黑鸦鸦大小汽车占满了操场。汽车上的喇叭声，人们下车后喊叫声交织噪杂，汽车灯上的光束划破了漆黑寂静的夜空。此时，已晚上九点多钟了。我和苏参谋长快步迎上前去，请美蒋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到县政府驻地吃晚饭。

美代表斯士如（上校）四十岁左右，大个子，高鼻梁，凸脑门，两只大蓝眼睛，大厚嘴唇，一脸胡碴子，身穿一身黄橙色军装，足穿黑色大皮靴，他原是我国某地教堂多年的神甫，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比较了解熟悉，操着一口漂亮、流利的中国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钻出车后，看上去举止傲慢，神气十足，目空一切。国民党代表丛大泉（上校），三十多岁，中等身材，腊黄色尖下巴，脸上配有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身穿黄色军服头戴大沿帽，足穿深红色皮鞋，看上去阴阳怪气，狡诈莫测。

见面后，同他们彼此握手、相互介绍、寒暄了几句，便将他们引到县政府备好的餐厅就餐，这些人也可能是饿得厉害了，见了丰富的佳肴，鸡、鸭、鱼、肉便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起来。

美代表边吃边问，说：“县长先生，高代表那里去了，他为什么不来吃饭？”我毫不在意地回答说：“高代表身体有些不舒服，休息去啦”，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饭后，美、蒋代表第二次提出请高代表出来，并说他们和车队当晚要进城。美国代表说：“中国有句古语，救灾如救火，今晚必须进城，这是上峰的命令，救济任务是有限的，误了时间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等等。我不慌不忙地说：“代表先生，中国也有这么一句俗话，就是‘欲速则不

达’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你们进城要经过我驻军的防地，路上埋设了很多路障，如地雷，炸药等等爆炸物，还有木桩、芦柴等，要进城必须预先清理这些障碍、你们来到我军防地，我们需要对你们的人身安全负责，况且今天已晚了，现已十一点多钟了，待明天再说吧”。

这时，美、蒋代表相互看了下，美国代表将两只大手向胸前一伸，问蒋代表说：“咋办啊？”（假民主），蒋代表少气无力地回答说：“只有如此了，待明日再进吧”。

初次舌战迫使美、蒋代表同意了明天进城。这时，屋内空气立即缓和下来，大家开始有说有笑。于是我们就张罗着安排代表们以及随行人员的住宿。我们有意识地将美、蒋代表分别安排到县政府内，相距较远的不同房间，并以“保卫他们安全”的名义派干部和战士，分别将他们监视起来，不让他们夜间彼此接触，以防搞鬼。其他随行人员和司机则分别住在县政府外边，派干部主动热情地接触他们，通过接触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揭露城里敌人的罪恶，并了解对方此行的一些情况。

待所有代表、随行人员睡下，一切就绪后，已夜深十二点钟了。我和苏参谋长面对辉煌发亮的烛灯，一边分析研究着美、蒋代表第二天将会提出的活动要求，一边焦急地盼望等待军分区首长的到来。等啊等，一直等到凌晨两点多钟，哨兵来报告说：“军分区朱子伟参谋长骑马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来了。”我俩立即迎了出去。

朱参谋长是个中等身材，三十多岁，瘦白脸，看上去身体很健壮，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象是一个教员。他见面便笑嘻嘻地说：“叫你们二位久等

了。”我们回答说：“没啥，只要首长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啦”。

参谋长进屋坐下便说：“那就请你们谈谈情况吧”。我请苏参谋长先说，苏风趣地说：“还是请县太爷同志从头至尾地说吧！”于是我开始谈起来。朱参谋长拿出小本子认真地记录着。

当我汇报到高代表如何介绍情况，我如何舌战美、蒋代表时，朱参谋长微笑了笑，点了点头以示赞许。当我提出了明天上午检查美、蒋车队时参谋长停止了记录，睁大了眼睛，态度忽然严肃起来。他说：“接到你们的报告后，分区党委决定叫我来了。我来是参加和美、蒋代表谈判的，不是来检查人家的什么车队的。当然，高代表说的这些情况我预先也不知道，但你们检查何思源省主席给伪军头目王金祥的信件，这么大的车队，来了这么多人，无疑是海底捞针。检查出来一切都好说，如检查不出来那就麻烦了。你想美、蒋代表那时能和我们善罢甘休吗？这不就形成了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大问题了吗？那时，政治影响将是很坏的，到时有谁负责呢？我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因此，我的意见还是不检查为好”。

朱参谋长这番话使我和苏参谋长楞住了，不知回答什么是好。这时，我和苏参谋长相互看了下，我也睁大了眼睛争辩说：“明知其中有鬼，难道就瞪着眼睛看着让美、蒋代表将这批物资白白的送给我们围困已久的敌人吗？”

朱参谋长又说：“同志啊，这种情况不光我们这里有，听说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说：“外地区情况我不知道，而这批物资发生在这个县，我们绝不能让其资助

和我们打了八年仗的敌人”。朱参谋长问我：“你想咋办？”我回答说：“我还是想检查他们”。

朱参谋长生气了，气呼呼地说：“你这个同志为什么还是这么犟，你为什么一句话也听不进”。这时，苏参谋长在一旁也坐不住了，帮我说：“张侠同志在这个县和这部分敌人打了六、七年仗，这些敌人又很顽固，至今还在负隅顽抗、这些坏家伙最近还打死杀害我们很多抗日人员和老百姓。旧帐未清又欠下新债。张侠同志这种心情领导上应该理解，是否能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苏参谋长发言后，室内空气稍缓和了些，朱参谋长的气消了些，态度也逐渐冷静下来。他说：“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这样好吗？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前朱参谋长不要露面，我和苏参谋长布置人检查，如检查出来，那就一切都好说了，若检查不出来，你就出来说刚刚赶到此地，将检查的责任都推到我个人身上，到那时任凭上级对我进行处分，直至坐牢，杀头我在所不惜。不过我仅希望朱参谋长在党内、在地委，专署，分区首长面前替我说句公道话就行了，苏参谋长也在此，我别无他求”。朱参谋长叹了口气说道：“天快亮了，就按你的意见去办吧”，我和苏参谋长说了声：“是”安排下朱参谋长休息就退了出来。

我和苏参谋长简单地商量了下，由他回团部调两个连配合我县大队负责外围警戒，我在县政府县大队，公安局抽调些短枪人员进行武装检查和内部保卫。

安排好之后，我回住室便刷牙、洗脸。这时，不由地想起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我虽无功劳也有苦劳，如这次检查出美、蒋的罪证来，一切都好说，否则落个前功尽弃，

身败名裂，功亏一篑。但我又立刻想到，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被日寇和汉奸们杀害、奸淫，无数烈士为抗日而英勇牺牲，我意识到这不是严重的自私自利可耻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在头脑里作怪吗？在此关键时刻自己想这些干什么呢？

这时候，高代表笑嘻嘻地进来了，他进门就问：“县长同志，检查定了吗？”我回答说：“今上午就检查，我们昨晚定了的”，高代表说：“那好，请你快派人送我回我军驻地太安县某地吧，我必须马上离开此地，祝你们成功”。我立即找人拉了两匹马送走了高代表。

此时，美、蒋代表尚未起床呢，我又立即召集有县大队，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负责人紧急会议，商量如何抽人抽枪组成临时执行检查任务和内部保卫队伍，制定检查办法等。

会议结束后，各部门回去落实任务，美、蒋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均起床刷牙、洗脸了，我们已准备好了早餐，请他们进入餐厅就餐，然后我也进入餐厅。

美、蒋代表见面就问：“县长先生，高代表呢？”我若无其事的回答说：“他病情严重送往医院了，咱们吃饭吧！”美代表狡猾得很，他预感到情况不妙，他说：“我们马上去看高代表”。我说：“咱们吃了饭再说吧！请大家先吃饭，先吃饭”。

我这样，一让一催，他们的随行人员不约而同地拥到餐桌就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其他代表也随着吃起来。美、蒋首席代表相互看了看，在此情况下也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就餐。

饭后，已快八点了，我请美、蒋代表到会议室去坐，到会议室后，美代表又提出他们要立即去医院看高代表。我回

答说：“不用了，医院离这里四、五十华里，路面又被破坏，只能步行，不能通车，你们看不成了，美、蒋代表相互递了下眼色，蒋代表便说：“县长先生那就让我们的车队进城吧！”我说：“进城的路障尚未清理，你们暂时还不能进”。

美、蒋代表有些生气了，他说：“为什么至今还未清理？”我说“清理路障需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蒋代表说：

“不行我们去找你的上级”。我说：“不用啦！我们已派人去请示了，不过派出去的人和上级领导均还未来到”。这时，美、蒋代表坐不住了，美代表真的生气动怒了，他忽地站了起来说：“县长先生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检查你们的车子，在我的领导人未到前，我要认真进行检查，你们这批物资有鬼……，检查不完，你们休想进城”。这时，美国代表象是发了疯似的，他大手一挥，啪嚓一声，拍得桌子上的茶具乱跳，碗里的茶水向四处飞溅，淌了一桌子，他那充满了血丝的大蓝眼睛瞪得象两只铜铃，大嘴裂得象尊凶神，脸上的横肉颤抖着，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恨不得一口将我吞噬了。他用手指着，龇牙咧嘴地嚎叫着，说什么：“你这个县长的胆子真大呀，你不要命了”，他又说：“在你们中国任何地区，甚至在全世界，我们国际救济总署的车队畅行无阻，没有任何部队、任何个人敢出来检查的”等等。

我镇静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只是冷笑了笑回击说：“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也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重庆，而是我们抗日民主县政府所在地，绝不容许你们在此称王称霸，撒野横行。来人啊，去操场检查他们的车队。”这时，立刻从屋外拥进来十几名体态魁梧、手

提匣枪怒气冲冲的游击队员，分别站在美、蒋代表的身旁。

美代表说：“这……”。我说：“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请吧，代表先生，随我一同去操场检查车队吧。”这时，美、蒋代表有些神色恍惚，象泄了气的皮球，只好跟我们向操场走去。

我们来到操场后，见苏参谋长和县大队付政委代更寅同志，已将荷枪实弹的战士们布置好警戒，几挺机关枪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了车队，战士们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寒光逼人；他们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县政府临时组成的武装检查人员腰掖短枪，个个精神抖擞，正在等待下达检查的命令，他们临时又分了几个班，分配了检查任务。摄影师架好了摄影机，调整着角度准备现场拍照，操场周围，人山人海地涌满了围观检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不同颜色服装的居民。

我和美、蒋代表站到美、蒋代表乘坐的吉普车旁边，叫他们的随行人员和司机在大卡车附近站成横队，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负责这次检查任务的是公安局保卫队长，独胆英雄神枪手代伯明同志，他二十多岁，中等身材，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曾化装农民潜入敌穴亲自击毙过伪区长兼红枪会头子玉殿明，为人民立了功。这时，他跑到我面前报告说：“县长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把手一挥，说了声：“开始”，只见我们的战士敏捷而有秩序地跳上了车队的一辆一辆的大卡车，七手八脚而紧张地检查起来。约半个小时过后，各班长陆续下车回来向队长报告，都说没有查出可疑的东西。

这时，队长带着紧张的神态跑到我面前报告：“县长，

各班检查没发现什么东西，咋办？”美、蒋代表听后均露出洋洋得意的样子。蒋代表两只小眼睛瞪得圆圆的，仰脸冷笑了笑说：“县长先生，怎么样啊？”我态度严肃地对队长命令说：“你叫各班长认真的第二次检查，包括吉普车在内”。

一说二次检查，并包括“吉普车”在内，美、蒋代表立即收敛了笑容。美代表气呼呼地跑出来阻拦说：“县长先生，你…你做得太过分了吧，竟检查到我们代表头上来了。我们代表的车子，从未遭到任何人检查过，这…这真是岂有此理，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我回答说：“是人民”。

我一挥手，来了几个战士阻拦了美国代表的去路，不准其乱动。第二次检查又开始了，这次检查比第一次认真细致了，检查了约四、五十分钟，在其中一辆大卡车上，查出一批一般的反共宣传品，里边有漫画，图片等。队长拿到我面前，美、蒋代表还是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蒋代表说：

“县长先生，这部分宣传品，是过去往国军防区捎带的，不知那位勤杂人员未清理好车辆带到了贵军防地，这些东西能作为凭证吗？”

我察觉到美国代表的神态很不正常，从一、二次检查中，他的两只蓝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他乘坐的那辆大型的“吉普车”。这时，我也有点紧张了。但又一转念，意识到，作为一个领导人越在此紧要关头，越要沉着、冷静思考问题，战胜困难，任何慌乱疏忽只能会贻误大事，导致失败。我立即回答说：“代表先生，你不要解释了，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检查完哩”。

我当即命令队长说：“你带人亲自仔细认真地检查美国代表乘坐的这辆汽车。背脊见晃都要检查到，翻它个底朝

天，懂吗？”队长应了一声“是”，便带了几个战士钻进樊代表乘坐的车子里。

美国代表这时神态紧张了，瞪着两个大眼睛，挥舞两只大拳头，嘴里嗷嗷地叫嚷起来，说：“县长先生，你为什么单检查我的车子，太野蛮粗暴了，”等等我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你干涉不了”。我和他边吵边检查，又约检查了二、三十分钟，终于从美国代表乘坐的汽车座垫子底下查出了一封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给聊城城内伪顽反共头子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用毛笔楷体写的亲笔信。

信中大意是：“金祥兄勋鉴，阁下率全体官兵扼守鲁西北重镇，该城被共军已围困近九个月余。在军需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阁下身先士卒率部英勇抵御共军侵入城内，其效忠党国事业到底的精神可嘉，望阁下再接再厉，坚守不懈，不日我国军将大举进攻，至时，围城共军不攻自溃。现有三方代表，美国朋友斯士如，我方代表冯大泉，共军代表高月明，以国际救济总署的名义，给阁下全体官兵运去生活物资一批，以解燃眉之急。望阁下见信后热情款待三方代表为何。

省主席何思源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 日）

即（1946年5月21）

附运输物资清单如下：

白面××吨，牛肉干××吨，猪肉罐头××箱，白糖××吨，冰糖××吨，香肠××吨，咸鱼××吨，水果罐头××

箱，绸缎××匹，衬衫、毛巾、袜子、鞋子、牙刷、搪瓷盆、香水、香皂、胭脂粉等各多少。

总之，吃、穿、用应有尽有，省主席对伪军的关怀可算是无微不至，我拿着这封信在美、蒋代表眼前摇晃了几下，质问道：“代表先生，这是什么？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批物资是救济城里居民的吗？可惜你们省主席何先生在信中交待得很清楚了，你们还有啥话可说。”我立即叫将摄影机移过来，把代表先生们以及他们的“吉普车”、运输大卡车、物资等统统地拍照下来。

这时，美国代表神经紧张起来，他哇喇哇喇地大叫起来，一面指着蒋代表说：“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一面转身对我说：“县长先生，他们把我当成了义务铁邮政啦！”我说：“代表先生，你是否被人利用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先拍照。”这时，摄影机已架到“吉普车”前边，镜头正对准美、蒋代表以及他们乘坐的“吉普车”，片子滋滋不停地转动着，一见真的要拍照了，美国代表惊慌失措瞪着两只蓝眼睛，咧着一张大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大声喊道：“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他边喊叫，边拖着两只大皮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避开摄影机的镜头，围绕着吉普车东摇西晃地跑着躲藏着。蒋代表象个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一步一趋地紧跟在他主子的屁股后头。人山人海围观的群众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叫骂声，嘲笑讥讽声，

“不要叫美国鬼子跑了，要照上他！照上他！”等等，美、蒋代表既象小孩子捉迷藏，又象走马灯样不停地绕围着“吉普车”旋转。

就这样，一个要照、一个要跑、双方僵持足有一、二十

分钟，美国代表见我们一定要照，他干脆撒开两脚，离开“吉普”车拚命地往县政府里边跑去，蒋代表也一股脑儿跟了上去。围观的群众又是一阵嘲笑漫骂声“美国鬼子跑啦，截住他，不要叫他跑了，抓回来，抓回来！”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仅将其“吉普车”、卡车以及物资进行了拍照。

拍照完毕，美、蒋代表的其他随行人员垂头丧气地排队各回昨晚原住地。汽车司机、工勤人员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表示敬意和同情。这时，苏参谋长和县大队代副政委撤走了外围警戒部队，县政府除留少数武装人员看守车辆外，其余皆都撤了下来。围观的群众也边议论边逐渐散去。

我和苏参谋长虽然一昼夜未眠，今天又紧张战斗了一个晌午，但查到这封铁证如山的信，彼此毫无倦意，怀着胜利的喜悦，急步走向朱参谋长住地。刚踏进大门，便见参谋长正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着的在等候我们哩，他见我俩笑嘻嘻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回答说首长更辛苦。站在旁边腰掖匣枪的警卫员小王撅着小嘴气呼呼地插话说：“你俩自这里走后，参谋长一直就没休息，我劝他睡一会儿，他就是不肯，老是这样走来走去的。”参谋长笑着说：“这小鬼怕我搞坏了身体，其实没事，我这不是挺好吗？”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参谋长又说：“请屋里坐吧。”我们三人进了屋子，分别坐下。我便向苏参谋长递了个眼色说：“老苏啊，请你向参谋长汇报吧。”朱参谋长笑了笑说：“不用啦，你们走后我随即派人参加了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每一个行动他们都轮流来向我汇报了。哈哈，大概你们还不知道吧？咱们现在商量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吧。”

我顺手把何思源给王金祥的亲笔信交给了朱参谋长。他边看信边说：“美帝国主义者就是狡猾的很，善于挂羊头卖狗肉，满口是仁义道德，做出事来却是男盗女娼。”我插话说：“美代表说他被人利用当了义务铁邮政啦。”朱参谋长气愤地说：“那是鬼话，傻瓜才会相信哩。不过我们还要给他留个台阶下，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好办了”。我说下一步咋办哩。他说：“还是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对蒋介石、国民党斗争原则办事，就是有理，有利，有节。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后盾，以何思源给王金祥的这封信为证据，这样，我们在谈判桌上就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我们用这封信首先在心理上战胜对方，迫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图办事。”

我们三人又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时间已到上午十二点了，我说：“参谋长到吃饭的时候了。”苏参谋长插话说：

“朱参谋长该出场了。给他们见个面就吃午饭，下午开始谈判如何。”朱参谋代表同意，于是我们来到了县政府会议室。

这时，美、蒋代表坐在椅子上，神色恍惚，呆若木鸡，以忧郁的心情两眼睛紧紧盯着会议室的门口。当我们进去，他们慌手慌脚地站了起来，那种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目空一切的神态消失了，换成了嘻皮笑脸，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地一副丑态。我以蔑视的眼光环视了一下，说道：“代表先生们，让你们久等了，我上级军分区朱参谋长刚来到，他是代表我方和代表先生们谈判的，现在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

美、蒋代表及其随行人员都自我报名、作了介绍，朱参

谋长说：“好，好，都快坐下。因路远不好走，我来迟了一步，让先生们等得不耐烦了吧。再则由于地方条件差，可能招待不周，望诸位先生原谅。”美、蒋代表齐声说：“哪里、哪里，县长先生和苏参谋长招待很好，很好，我们感谢不尽。”我说：“不必客气了，咱们去餐厅吃午饭吧，饭后休息一下，到下午三点钟在此会议室开会如何？”朱参谋长和美、蒋代表都表示同意，大家便去餐厅就餐。

下午，三方代表按时来到会议室，朱参谋长主持了会议。他首先请美国代表发言，美代表涨红了脸发了言，他还是重复上午那些陈词滥调，并且指着国民党代表说：“是他们利用了我……”，他活象个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有声有色，他越说越生气越激动，最后，干脆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国民党代表的鼻子，骂国民党做事不讲信义，叫他当了铁的义务邮政等。以表白美方如何公正。如何为了城里受苦受难的居民生活着想，救济总署又如何素以人道主义慈善事业为宗旨等等，把给城里伪军输送物资以及给王金祥携带信件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自己打扮成公正无私完美无瑕大慈大悲的活菩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美代表发言后，朱参谋长冷笑了一下，没表态。接着国民党代表用他的两只圆溜溜地小眼睛向周围环视了一下，干瘪的薄嘴唇颤动着开始诡辩起来，他说：“这次给聊城城里运输的物资，是上峰的命令，这批物资运到城里分配给谁，如何分配我也不清楚。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贵军将这封信件检查出来后我才知道是分给城里驻军的，对上峰的信和事我作为下级来说也不便多问的。下级执行上峰任务是我的天职本份”等。

这样一来，美代表将责任推给蒋代表，蒋代表又推给他的所谓上峰省主席，结果推来推去谁也没责任，谁也不涉及实质性的问题。

美、蒋代表发言后，我有些气愤，坐不住了，我发言说：“首先应认定城里这部分部队的性质是什么？是伪军还是你们的所谓国军？第二，这部分物资应该分配给谁？是分配给城里居民，还是分配给你们的所谓国军。第三，这部分物资具体分配手续由谁承办？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必须有个明确答案，否则，筑先县（聊城）广大受害群众是不会答应的。”

我发言后，朱参谋长也气呼呼的用城里伪军如何残害我军战士和抗属的典型事例指责国民党代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苏发言后，国民党代表耍起无赖来了，进行狡辩说：“城里驻军收编为国军是按照国民政府关于‘统一军令’的精神办理的，这不光涉及聊城一地，而是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况且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在文件上签过字的（假话），城里驻军总要生活吃饭的嘛！即便何主席把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城里驻军，我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等等。

这时，美代表在旁边坐山观虎斗，一言不发，我和苏参谋长据理驳斥国民党代表的这些无耻谎言，当以大量事实驳得他理亏词穷的时候，他便耷拉着脑袋采取软磨要死狗的手法对付我们。这样僵持互不相让的马拉松式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二十点，我向朱参谋长递了个眼色说：“我建议休会吃晚饭吧，至于国民党代表先生所说的城里驻军是国军还是汉奸

卖国贼，那就让筑先县（聊城）饱受战火灾难的广大群众作证，说话吧。”与会者同意我的提议，马上休会吃晚饭，实际上大家的肚子早就饥肠辘辘的响了。

晚饭后，美、蒋代表休息，我们照老办法还是以保卫代表安全的名义，派人将他们隔离，分别监视起来，不让他们串连开小会。我和朱、苏参谋长商量决定当夜由我召开各区负责人紧急会议，分配赴县向美、蒋代表控诉城里伪军罪恶的群众代表人数和布置注意事项等。

待我把任务布置完后，东方已露出鱼肚白色。我的通信员刘登基（外号憨二）和王正印面带焦急忧愁地说：“县长，你两天两夜没好好的睡个觉了，快睡一会吧，这样下去会将身体搞垮的”我伸了下两个拳头笑哈哈地说：“没事，你看我的身体多棒，放心吧，城里的敌人消灭不了，我是不会垮的”。

早饭后，双方代表又来到了会议室，为了等待各区群众代表的到来，朱参谋长宣布：“今天上午不正式开会了，大家休息一下也可以在一块随便聊聊天。”这时，美国代表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他换了副象小孩子样天真活泼逗人乐地笑脸，有说有笑以中国通自居，说笑话讲故事，主动介绍他的家庭情况，自己的经历身世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民情的了解等等。我见他尽出洋相，便提议叫他学说中国地方方言，学中国多种动物叫唤声。这个大鼻子蓝眼睛毫不推辞，便真的站了起来，耸了耸肩膀，咳嗽了两声，清理了下嗓子，象个相声口技演员，学起中国的各种动物叫唤声。如公鸡叫鸣、母鸡下蛋，大猪哼，小猪叫，大、小山羊叫，大狗小狗叫，大猫小猫怎么叫，他又说又学又表演，说得他嘴角往外流白

沫，逗得会议室与会人员前仰后合地捧腹大笑，有的笑出眼泪，有的笑得喘不上气来憋红了脸，可以说，与会者这时情绪达到了最高潮。

国民党代表则不然，他沉闷寡言，有时勉强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神态恍惚，焦虑不安，他可能已预感到更为严重的斗争风暴将要临头。

果不出他所料，下午两点多种，怒不可遏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打着红、绿旗子敲锣打鼓吹着号角，挥舞着拳头，不断地振臂高呼打倒城里汉奸卖国贼王金祥，强烈要求美、蒋代表接受群众代表对汉奸走狗的控诉，口号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霄，美、蒋代表住地周围的空气顿时骤变，正在午睡的美、蒋代表从梦乡中惊醒了，有的人慌慌张张穿错了衣服，戴错了帽子，真是丑态百出，他们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

这时，我和朱、苏参谋长正在会议室议论着什么，美、蒋代表如惊弓之鸟，面呈土色，大步跑到会议室，见面就问：

“参谋长，县长先生，这…这是怎么回事？”朱参谋长冷笑了一下坦然自如地回答说：“筑先县（聊城）深受城里汉奸迫害的群众代表们，要求你们两位出去和他们见见面，没别的意思。”这帮平时过着花天酒地生活骑在人民头上作福作威的家伙们，一听说叫他去见群众，好象押他们去赴刑场，尤其是蒋代表吓得象被打伤的一只落水狗，全身颤抖，连话也说不完整了，只说：“我死也不去见他们，叫我死就死在县政府会议室里。”等等，美国代表还假装镇静，但观其神态也有些紧张不安。

这时，街上群众代表的口号声，锣鼓声，号角声高一阵

低一阵地震耳欲聋，回荡在县政府会议室里。有的群众代表高声喊道：“如他们不出来接见，我们就冲进县政府会议室，到时，别说我们无理，后果由他们自负”等等。朱参谋长说：“如果国民党代表先生，实在不肯出去接见，那就只有请美国代表先生出去了！否则，群众冲了进来，我们负不了这个责。”我看美国代表吱吱唔唔地也是不愿意出去，我插话说：“如美国代表先生出去我可以陪同，只要你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公正，我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这样，美代表到街上，广场上，站到高台上、汽车上接见了群众群众代表，群众用血泪斑斑的事实，高举着被汉奸杀害的亲人的血衣血物泣不成声地向美代表控诉城里这帮汉奸卖国贼的种种罪行，有的群众质问美代表：“你们知道不知道老百姓八年抗日的日子是咋过的，亲人被这帮卖国贼伙同日本鬼子杀害了，房子被烧了，我们老少无家可归，粮食衣物被汉奸抢光了，我们连糠菜都没得吃，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们运来的白面是给谁吃的？你们必须有个明白的答复”等等。

美代表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貌似公正，冠冕堂皇摇头晃脑地向群众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美国代表是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受尽了战火和自然灾害之苦，我们美国代表对你们深表同情。国际救济总署以慈善事业为宗旨，我们主张叫老百姓过和平生活富裕的好日子，至于运来的这批物资，救济总署是救济灾民的，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些物资，我们还要和国民党代表先生们商量，然后再作答复”。

听讲的群众又发出了阵阵的怒吼声：“你既不能答复，

快叫国民党代表出来，再不出来，别怪我们无理。”也有的人说国民党代表和汉奸是一个鼻孔眼里出气，一路货色，都是坑害老百姓的，也有的说不行将国民党代表拉出来斗他一场再说，将他撒成碎片算啦，总之，七嘴八舌说法不一，我小声向美代表说：“咋办啊？对群众没有个明确的答复他们是不会回去的。”美代表回答说：“县长先生，请你叫老百姓先生回去，咱们回县政府和国府代表谈判好吗？”我说：

“问下群众再说吧。”我对群众传达了美代表的意见，群众代表说：“不行，没个明确答复我们回去没法向在家的父老兄弟姐妹交待。”我对美国代表说：“请你转告国民党代表先生，办事要明智点才好，中国有句俗话叫挨了鞭子还得过河，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呢。”美代表点头表示同意。我又对群众代表说：“你们今晚先在此住下，待商量有个结果再转告各位代表好吗？”群众齐声答：“可以。”

群众代表住满了大东关，小东关家家户户和县政府周围。这时，夜幕降临，满天星斗，一轮明月在东方升起，而抗日的歌声四起，号角声此起彼伏，锣鼓声震撼了寂静的夜空。美、蒋代表晚上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商量了些什么。朱、苏参谋长和我这晚上也没闲着，讨论了一个第二天上午会议纪要草稿，准备借群众的威力在谈判桌上迫使美、蒋代表按我们的意图签字。否则，错过机会拖长时间对我们不利。我建议，朱参谋长第二天上午在谈判桌上对准国民党代表开火，兵对兵，将对将，狠狠地训斥他一顿，迫使对方让步，交械的条件已成熟了。朱、苏参谋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双方代表人员均到了会议室，国

民党代表没精打彩，耷拉着脑袋，面色腊黄走进了会议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一言不发，象是要死狗。美国代表两只大蓝眼睛痴呆呆，面带忧愁，神色不安。人到齐后，朱参谋长态度严肃起来，他首先发言说：“这几天我们对美国朋友和国民党代表先生以礼相待，真诚希望讨论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但是国民党代表先生却不和我们合作，对谈判毫无诚意，对一些实质性问题强词夺理，甚至歪曲事实，耍些流氓、无赖手段等等，你的这一切举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奉劝代表先生首先对些实质性的问题要端正态度，对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歪曲的真相，否则后果自负。”

朱参谋长发言后，国民党代表少气无力的说：“你们对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是什么？”朱参谋长说：“那就叫张县长说吧。”我立即将昨日晚上拟定的方案草稿逐条宣读了一遍：

第一条，国际救济总署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日运往山东省筑先县（聊城）的救济物资各若干（附表）是救济聊城灾民的。

第二条，具体分配物资手续经三方同意委托当地筑先县（聊城）抗日民主县政府办理。

第三条，这批物资在未分配给灾民前，三方同意委托当地筑先县（聊城）抗日民主县政府妥善贮存，其他方面不得干涉。

第四条，代表们及其随行人员，所有车辆均安全无损，全部返回济南。

以上协议，自三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用中文共签署三

份，各份均有效。

国民党代表丛大泉（上校） 签字

中共代表朱子伟（军分区参谋长） 签字

美国代表斯士如（上校） 签字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日即一九四六年五月×日

地址，山东省筑先县（聊城）抗日民主县政府驻地。

这时，美、蒋代表颤抖着手，无可奈何地在会议纪要草案上分别签了字。国民党代表边签字边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质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哭丧着脸狼狈不堪地说：“我这个小职员回去就把饭碗砸了，弄不好还要被撤职查办，事情办地这么糟，回去咋交差哩，唉！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没可怜理睬他。我想，任何人只要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正该如此。他要高兴了，我们和老百姓必然要倒霉，这是水火不相容两种不同立场所决定的。这就是不可磨灭的真理。

三方代表签字后，我立即叫人用照像机将会议纪要全部进行了拍照，待拍照完毕，美、蒋代表少气无力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的象刚举手交械的俘虏样退了会场。

朱、苏谋长和我商量下午如何组织搬贮物资等事宜，并决定明天上午让所有代表离去。当天下午朱参谋长就带上会议纪要满意地回军分区了。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美、蒋代表及其随行人员，所有车辆也灰溜溜地返回了济南。群众控诉代表团带着这一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分别回到各区、村庄向深受灾难的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对广大抗日党政军民是一个

很大的鼓舞。

通过以上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刻，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甚至献出自己生命在所不惜。只有千百万共产党员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才能推动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蓬勃不断地向前发展。进一步带领广大劳苦大众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附：临时抽调武装检查，保卫人员部分名单：

代伯明 杨金玉 周蜜子 刘洪轩 付德平 刘学忠
李庆海

一九八五年七月于郑州初稿

筑先县教育片断

梁 金 中

前 言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四十年了，一些从事抗日教育工作的老同志，大部相继去世，鉴此，我执笔写了这个材料。在写法上，是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首先叙述一下当时当地的抗日概况，继而再谈如何开展抗日教育的，并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写。

一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四〇年初，聊城东南的农村概况和学校教育

（一）农村概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占领了聊城县城，聊东南处于一片混乱，土匪四起，民不聊生。同时，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在聊东南成立了比较有名的两个民团。每个民团都控制着一、二十个村庄。一个是以红枪会头子陈玉怀（花牛陈庄人）为首，投降日本，称为陈团；另一个是以民主人士聊阿阳三县大士绅白凤仪（白庄人）为首，倾向抗日的民团，称为白团。汉奸陈玉怀，仇恨抗日，一九三九年秋，带领汉奸团和红枪会武装拆了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队长梁伯河（二区梁庄人）、付队长何器之（二区中杜人）的家，并把梁伯河，何器之逮到花牛陈据点

扣压起来。在陈玉怀去抓梁伯河，何器之这天中午，白凤仪把全团武装，布置在王官庙以西洼涯上，并通知所属人员，如果陈玉怀到洼东来，就暗他拚杀。结果陈玉怀没敢向东来，在洼西前高向东北走了。后来，我党通过地方社会人士关系，把梁、何二人要回。

一九三九年春天，聊、阿边既有公开的武装土匪，也有夜聚明散、牵牛架户的土匪，王明君是明牌土匪，有长、短枪八九支，还有一匹马。一九三九年古历三月二十八日，在王官庙骡马大会上，公开抢劫，并在王官庙冷家店里，捆绑吊打牛贩子。白凤仪劝他们不要在王官庙左右胡作非为，王明君不听，白凤仪要消灭他们，在古历四月初一日下午，把擦枪油发给队员，并说要打王明君。我们在团部院内（王官庙西头，原乡农学校），都忙着擦枪，因保密不好，当日半天西王明君他们就走了，只剩他一个名叫小锁的警卫员，在冷家店西屋里坐着。这时，白凤仪又想劝他们都离开王官庙就算了。他说：“金中，你到冷家店里去叫小锁来，我给他谈谈。”我就出院向西走了几步，王明君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伙人又回来了，又到冷家店里去了。我立即跑回团部，报告了情况。白凤仪马上集合全团武装，将其包围，战斗半个小时，将王明君的人员全部捕获。把王明君和他的警卫员小锁在沙河里枪毙了，其余的全部释放。

一九三九年秋末，顽军冯二皮（冯寿彭）的队伍，在东阿刘集、南双庙一带，被日本鬼子打垮了，有五匹脱缰掉鞍的战马跑到王官庙，被白团人员逮着了，第三天，白凤仪即把战马全部交给住在界牌的八路军先遣纵队第四游击大队徐翼。

聊南夏庄（现属朱老庄乡），有一个土匪叫夏长法。他本人谈，他是国民党聊城县长魏光武的人，他有一棵水连珠大枪，并持有国民党县政府发给的枪证。一九三九年冬（古历十一月），他凑集了四、五个土匪，夜间偷偷来到聊、阿边王官庙南三华里的赵寺（原东阿县）架户，把富裕中农郭玉昌绑架带走。民团白凤仪得知，以鼓为令，集合几百人的民团武装，一直赶到聊南，将夏庄包围。在夏长法家里逮了两个土匪，缴获大枪一支，手榴弹四、五枚，自行车一辆。并把夏长法和两个土匪带回来，经审问，土匪供出来“内线人”，当夜在赵寺村古寺上，群众把“内线人”枪毙了。后来经过说合，双方同意，民团把三个土匪放回，土匪把郭玉昌放回，才算了事。

（二）在社会动乱，无政府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有三种情况：

一是封建教育有所抬头。有的地富，把五、六十岁的老私塾先生请出来教书。学生多是地富或比较富裕人家的子弟，学生十几人，或八、九人不等。开学时，由老师带领家长和学生，先给孔子的牌位（在屋内墙上贴着：“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红纸条）叩头，而后学生再给老师叩头，这算认老师了。学生读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八九岁的小学生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或山西杂字。这种学校，按家长的愿望，是叫孩子识几个字，能写会算，不当文盲，长大了，出入头地，光宗耀祖。实质上，是为敌人所欢喜的奴化教育。这种学校当时赵庄、西董各有一处。

二是由村上学董（群众推选的办学人员）出头，按地亩

或学生人数摊敛凑钱，请一位青壮年老师教书，念的是战前初小旧课本，或者是老师抄写的课本。这样的学校老师多数有爱国思想，也进行一些抗日教育。

三是在敌占区除有以上两种学校外，也有日本汉奸办的学校，日本人利用中国人尊孔的思想，凡日本办的学校，都供奉汉奸政府发给的孔子像。老师的津贴待遇，由敌人发给，进行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奴化教育。但也有我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或同情抗日的积极分子，以教师的合法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工作的。这样的同志在城内或敌占区都有。例如，李纯礼同志在聊城城内当教员，但他是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杨金岭、付朝河在敌占区当教员，都为我党作些工作（付朝河的哥哥付朝杰是我们的情报站长）。

二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三年根据地的创建和敌我斗争及抗日教育。

（一）敌我斗争简况：我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长梁伯河被陈玉怀抓去放回来以后，重整旗鼓，于一九四〇年古历八月十五日，在徐翼第四游击大队的配合下，进攻花牛陈汉奸团失利，梁伯河同志牺牲陈玉怀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树上示威。当时，陈玉怀十分猖狂，因白凤仪赞助八路军抗日，陈玉环、陈万泗两个汉奸头子带着红枪会在日伪军配合下，把白凤仪的家给烧了。后来，我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来聊东南活动，攻打花牛陈，把花牛陈陈团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了，陈玉怀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门了。在我党的动员下白凤仪带领全团正式投靠八路军，建立了八路军运东抗日

游击大队，并很快发展为三、四百人枪的队伍，活动在聊、阿、阳、茌边境，后来部队升级，被编为军分区三团。一九四〇年春，抗日县政府成立，一九四〇年秋为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牛县长在祝寨士绅名流大会上宣布，将聊城县改为筑先县，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筑先抗日政府，除政工人员外，县大队发展为有一百多人枪的队伍，一、二、三区的区队也都发展为二、三十人枪的小游击队在各区活动，各村村政权、自卫队（即民兵）也建立起来了，村与村之间的抗日路沟也都挖通了。一九四一年秋，太平庄、魏庄一带自卫队，以民主人士吴汉三为首成立了抗日联防大队，不断反击敌人。当时，农民在地里干活都背着大枪，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镢，进行生产。

从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二年底，是日伪敌人最疯狂的时期，也是我抗日军民最艰苦的斗争岁月。一九四一年秋，敌人在三区（现东阿县顾官屯一带）九家庄、柿子园、小姚庄、果子王、马海子、高园都安上了据点。一九四二年秋末，汉奸头子赵振华带领日本鬼子六、七十人，伪军一千多人，还有在敌占区征调的很多民伕，气势汹汹的来二区安据点。光在太平庄、魏庄、刘皋三村之间，按了三个据点，修了围墙，在马庄东南洼里封锁沟涯上安了炮楼。一九四二年底，敌人在二区（于集）周庄、王官庙、赵鸭庄、前高、周店、魏庄、王西庄、姚庄、刘道之等村都安上了据点，并在据点与据点之间挖有封锁沟，至此，根据地又变成了敌占区，我们的游击队活动就很困难了，因而改变策略，深入到敌占区活动。

到一九四三年秋，抗日战争开始反攻，拔掉据点，平掉

封锁沟，逐步走向抗日战争胜利阶段。

（二）抗日学校教聊情况有两种：

一是抗日小学，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抗日人民政府刚刚成立，除和敌人进行游击战外，忙于县、区、村的政权建设，教育科就科长于鲁农（于景洲）一个人，区里也没文教助理员，是无暇顾及抗日教育事业的。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抗日小学也寥寥无几。在赵庄梁金贵建立了一处小学，太平庄有一处小学，魏庄柴东岭（敌人扫荡时牺牲）建立了一处小学，任寨王东洲建立了一处小学。裴王寨当时是抗日人民政府的实验村，村长谭启明兼任，可能也有一、二处小学，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抗日小学多一些。一九四三年春，敌人在我根据地内按满了据点，有些学校暂时停办。记得这时任过抗日教员的有：杜仰仲（在济南离休回家）、董芝普（武城县县长离休）、白昭武（范县法院院长）、何振南（新乡报社、病故）、高绍禹（南京下关区委书记）、刁俊然（腾县工作，离休）、郭守成（齐河卫生局长，病故）、刘祥廷（聊城县党校校长病故）、杨金岭（许营公社书记，病故）、陈玉魁（聊城县人大主任，离休）、何光（病故）、齐家旭（离休）、姚中正（离休）、付朝河（聊城县卫生局长，离休）等同志。

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抗日战争年代，学校当然是进行抗日教育。当时在课程设置上，文化课有语文、算术，另外还有唱歌以活跃学生生活。当时办学是很困难的，学生没有课本，一、二年级课本是用毛头纸油印的，算术课有时甚至语文课由教师自编自教。内容都要为抗战服务。例如：一年级语文，第一课是“人”字，第二课“我是人”，第三课“我

是中国人”。或“青抗先”、“八路军”、“妇教会”、“民族英雄范筑先”等等。二年级数学课，如算术题：八路军在某某战争中，打死×个日本鬼子，在××战争中又打死×个，共计打死多少日本鬼子？总之，不管语文课或算术课，抗战思想性要强，教育学生坚决不当亡国奴。唱歌，除教唱一般抗日歌曲外，也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歌唱。例如：八路军刚来我地，抗日游击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教学生唱：“青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前线？叫声呀！老乡你是听，这个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八路军呀！爱护老百姓，老百姓要应当爱护抗战的八路军，军民呀，团结一条心，打倒日本鬼子得太平。”在共产党毛主席号召大生产运动时，教学生唱：“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实指望今年生产好，多打粮食充军粮……。”

另外，在根据地为防止敌探汉奸到根据地侦探我方情况，曾实行路条制度。由学生儿童团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查着没路条的人，就交村队部处理。学生站岗都非常认真，有时查着我八路军工作人员没通行证，也不放行。

当时在教学方法上，都是注入式的教学，先生讲，学生听。在教学形式上，当时没有单式班。一位老师办一处小学，一个班学生有好几个年级，最少是三个年级，多者四个年级。一小时上一节课，教三、四个年级，当然要实行复式教学，教师在上课前要作教案（课堂计划安排），即在课堂上那个年级的学生默读、写字，那个年级的学生算题，那个年级的学生新授，教师在教学前都要安排好，不然的话，课堂上就要乱了。因为都是一、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如果你给这个年级学生讲课，另外的学生没事干，课堂秩序就没法

维持。当教师既要懂点儿童心理学，还有一个教学技术问题。

二是灰色小学。在半游击区和游击区，甚至敌占区，也建有抗日小学，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教员由有爱国思想、倾向抗日的人员充任，敌人扫荡时就教四书，百家姓或日本发给的课本，敌人扫荡过去了，就教抗日课本。这种学校，在敌人那里也备案领取待遇，我抗日人民政府，也发给他津贴待遇。我们称这种小学叫“灰色小学”。

这个时期，教育科人员也增加了，在这时除油印课本以外，还有，木刻印刷的课本，专责印书人员有：孙华山（在鞍钢工作），李永贵（又名李华光，在西安工作），李兆祥（病故），白昭武（在范县工作），教育科长唐立全（在安徽工作），科员冯永祥（在贵州省铜仁地区工作）。

三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至一九四四年年底，抗日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全部拔除，也是抗日小学迅猛发展的时期。

抗日根据地创建时的小学一、二年级，此时已经是三、四年级学生了，同时由于据点拔除、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客观上要求办比较正规点的学校了。首先在村庄比较集中的二区南部祝寨，办了一个多年级小学（单式班。）杜仰仲为负责人，社会上有威望的民主人士王汝闾老先生任校长，继而何振东在南杜（即魏庄、这个村抗战时也叫杜杰村，因杜杰同志牺牲后，县长张侠主持召开追悼大会，该村命名为杜杰村）办了一个多年级小学，孙洪玉、姚

中正在赵庄办了一个多年级小学，因这三个村地处聊、阳、阿边缘区，都有一处较大的庙院，并有平房教室，房舍充足，村子又比较集中，所以这三个村能办一、二、三、四多年级小学。这三处小学各有教师四、五人，教学质量也比较好，附近的小学教师，每逢星期日，不断到这里交流研究教学问题，很自然的形成一个教员教学研究，学习的中心。所以后来命名为中心校。

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经区政府研究，把全区划为五个学区：即南杜学区，孙堂学区，王官庙学区，于集学区，沙店集学区。每个学区设抗日中心校长一人，负责领导全学区的行政领导、教学工作以及配合当时的中心任务。每个学区领导九至十二处小学。中心校长每周对所属小学，要巡视一遍，并及时指出优缺点。星期日对上周检查的情况，进行总结、研究，布置下周工作（每星期日下午例会）。

在当时来说，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除了搞好个人的教学任务外，在秋麦假以学区为单位，在校长领导下，组成工作组。因抗日工作繁忙，干部少，不少工作都由教员去作。所以群众说：“一个教员，半个抗联。”当时，农村文化是很落后的，一个村有一二个高小毕业生就不错了，有的村连一个高小生就没有。这样村上能写写算算的就选为账先，有的叫柴粮委员（即我们现在的会计人员）或叫柴粮先生。所以教员在村上还要应酬一些群众的事情。一名教员就是村上的“小圣人”。

征收抗日公粮，每年麦秋两次，每次在征收公粮前，要编造“合理负担册”，这就需要教员组织帮助督促检查。编

造“合理负担册”是很麻烦的，得要具体到户，每户添人去人，人口多少要核对清楚。记得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开始搞合理负担，每户几口人，有地多少，每人除去一亩基本地，下剩的地缴公粮。当时，每亩地负担麦季缴小麦五斤，秋季缴小米十斤（交其他粮食，要折合成小米，以小米为标准）。柴草是一米二柴，例如：一户缴一百斤米，得缴二百斤柴草（柴做饭，草喂马，保证军需），都要一次算到户。后来又按土地优劣，搞加级累进，好地多纳粮，劣地少缴粮。另外对鳏、寡、孤、独，军工、烈属，还有减征、免征的办法，所以造合理负担册子，是一项麻烦而慎重的的工作。

公粮征起来后，没有仓库，多是群众代存，随吃随取，或送交馍馍房，随时吃用，最后一次结账。有时因敌人抢粮，我们就实行空壁清野，藏粮、埋粮。埋粮时，选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挖一个大深坑，弄一个大席筒，把席筒放在坑里，底和四周填一尺多厚的麦糠，随倒粮食，随提席筒最后，把席筒提出，上面再盖一尺多厚的麦糠，用土埋上，盖上柴草。这个办法埋粮埋一、二个月也不受损失。埋粮、藏粮干部负责。绝无丢失，当时按上述办法，麦征我在孙堂负责埋粮。

全区所有自然村，根据形势的发展，还要更换抗日标语，用石灰水及墨水，在村内墙壁上，写成比较醒目的大字或艺术字标语，也由学校负责，校长布置。

教员在冬季农闲季节，业余时间，还要组织领导参与农村的文娱活动。文娱活动搞的最活跃最突出的是一九四五年，特别是这年春节的文艺活动搞的很热火。因在八年抗战时期，春节连鞭炮也不敢放，人们在沉闷中好象偷偷的过年

一样。日本投降了，该过个欢天喜地的春节了。各村都是鞭炮齐鸣，高跷队、竹马队、玩狮子的武术队，跑花船等文艺活动搞的很热闹。真是抗战胜利、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全民皆喜。群众八年没唱过戏了，不少村还组织剧团演戏。搞的好的是赵庄剧团，选举梁集昌、白临清（脱产的抗日村长）为剧团团长，剧团由教员，部分学生和群众组成、教员何光具体指导、排演的剧目有：《贫女泪》、《白毛女》、《打渔杀家》、《化子拜杆》等戏目，除在本村演出外，还到前高、连海、太平庄、东阿县谭庄去义务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孙堂剧团也不错，不过到外村义演不多。此外，牛王庄、白庄也有剧团，不断和赵庄剧团配合演出。

一九四四年秋至一九四五年夏，我在前高村试办“庄户学”效果良好，后来推广全区。为此，抗日政府对该校进行通令表扬。

办庄户学的情况是这样的：记得在冀鲁豫边区刊物上，介绍河南省抗日根据地一位模范教师夏陶然办庄户学的情况，筑先县老参议员张英忱在行署开会回来，传达党政军民学，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报告，根据这个精神，在二区前高试办“庄户学”。

前高这个村是个千人以上的大村，敌人又在该村安过据点，因遭受日本汉奸的破坏，家家户户都是过着省吃俭用的穷日子。男孩子都帮助家庭干农活，割草喂牛，拾柴拾粪，女孩子都在家中帮助母亲纺线织布（在抗战时期，党政军民都是穿土布，农民过的是男耕女织的苦日子），农村女孩子没有念书的。这么大的村庄，开学时，只有学生十几名。我想十岁上下的小孩子，是个活蹦乱跳，爱唱爱游戏的玩童。根

据儿童好动不好静的特点，在校内除教好学生文化课外，还教学生唱歌。并布置校内学生每晚召集校外儿童教歌，引导校外儿童上学读书。另外谁动员几个学生上学，就奖励给他一支石笔，同时进行口头表扬，再加上学董不断到各户去动员，学生就多起来了，学生很快增加到六、七十名。又找了两名义务教员，一名是过去教过书的高士元，一名是战前高小生刁明达。学校实行半日制，我们把学生编成若干割草组、拾柴组，有的学生上午学习，下午割草拾柴，有的下午学习，上午割草拾柴由组长带领，开展人与人，组与组进行学习劳动竞赛。女学生就组织纺线组，既学习，又劳动。试验结果：小女孩上学以后，在学校纺线比在家纺的多，同时又学识字，小男孩割草拾柴也比上学前积极肯干。

这种在人民生活困苦战争年代，响应毛主席“党政军民学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结合学生的家庭情况，根据季节，采用生产学习两不误学劳相结合进行教学的办法，当时很受群众欢迎。这种学校，名为“庄户学”。

当时，全区近六十多名教师，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学校，农村儿童基本上都能上学读书。多数学校有独特创建。有的实行“小先生制”，组织“识字组”、“夜校”等等。“夜校”是农闲时组织成年人读书、识字、珠算；“识字组”是妇救会组织成年妇女进行识字；“小先生制”是小学生教自己家中父母姐嫂识字。王寨王鲁光的妹妹王鲁珍是当时识字组的学习模范，刘皋学生刘保全为烈属打水扫雪是拥军模范，在《农民报》上都刊登过他们的事迹。

在解放战争中，支前、复堤（修河堤）、土改、复查斗争都有教员参加。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攻打聊

城抽调教员参加后勤工作。我当时在兵站上工作，我们跟随县政府住在马官屯，兵站设在马官屯东头路南，大车门里，一家大院里。后来，县委书记孟筱澎（他负责兵站）搬到东关“元宝心”住，我们兵站也跟随他移到“元宝心”东边一家粮店里，和我一块在兵站工作的，还有三区高囤（划归东阿）的一名教员，姓李，名字记不清了，

一九四七年麦前（古历三月底），蒋介石在河南省花园口，把决口（该口是一九三八年蒋军为阻挡日军进攻而扒的决口）堵上，放水淹解放区，又把黄水引入黄河故道（今黄河）。当时我们的口号是：确保监黄，固守金堤。于是县政府组织全县民工，由县大队掩护到敌占区齐河去抢复大堤。因蒋军敌机扫射轰炸，就白天休息，夜间复堤。县、区抽调教师组成宣传队、文娱队，白咸月负责文娱队，我和梁金贵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和张清田区长，住在齐河郑庄。

复堤回来，麦后在后高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复查斗争和参军运动。申云浦政委作“保田、保命、保家乡的动员报告。”教员组成工作组，参加土改复查参军工作。总之，在战争年代，教育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工作的。一句话，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战时教育为战争服务，

四

教师的待遇与地位：

政治上，抗日小学人民教师，政府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一支文化大军，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不少工作都安排给教师负责去办，这是政府对教师的信任，抗日小学人民教师不仅是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又是抗日工作人员。群众说，

一个教员，半个抗联。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教师、庄长、自卫队长共同配合研讨本村的抗日工作，教师经常参加政府召开的村长教师联席会。抗日中心校长和小区（相当现在的片）抗联组长经常吃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执行本小区一切工作事宜。

经济待遇是很微薄的，和抗日工作人员几乎一样，每人每天一斤二两粮食，每月三十六斤小米，由政府在教育公粮内开支，每月二斤油，二百五十斤烧柴，由学校所在村供给，其他一无所有。

教师每到放假时进行一次选模。教师集体会议时，进行口头表扬。

在对待教师问题上的，一场辩论会。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解放，因敌机经常轰炸县城，县政府仍住在农村，暂住李楼（今许营乡大石槽村东），这年是土改后期进行复查斗争，有些中农被错斗，而后又进行反左纠偏，对错斗中农，进行了补偿。

一九四七年秋，在复查斗争中，个别教员也有被群众当成“石头”拘禁起来的，教员思想有些波动。在此情况下，县政府由民政科长田景翰（后任专署教育科长，聊城师范校长）主持，有教育科长张清田（现任贵州铜仁地委书记）参加，在对待教师问题上，开展了一场辩论会，会议地址在李楼路北县政府院内，参加人员有各区区委书记，以及各区教育界代表。二区（于集区）参加人员有：何器之、梁金中、姚中正。何器之是高小教师代表，我和姚中正是全区小学教师代表。

会议开了四天，共两个讨论题。头两天讨论土改政策“

“左了好”还是“右了好”？讨论的统一意见为：政策左了，要挫伤中农利益，不符合土改政策。当时土改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政策右了，漏掉地富，贫农反对，所以土改政策执行起来不左不右好。后两天讨论题是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具体说，就是对地富出身的教员，是清洗还是保留？大会、小会讨论异常激烈，与会人员各抒己见，在集体讨论会上，大部意见主张，地富教员一律清洗。说什么地富出身没好的，你革他的命，他就不反对？我和姚中正轮流代表二区高初小教育界发言（何器之叫我俩也代表他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不能一律清洗，要区别对待。本人是地富成分，反对土改，有恶霸行为，不低头者，可以清洗，如本人是地富成分，但工作一贯积极，不反对土改，不能清洗。后来我举出两个例子：白咸月同志在战争年代，环境困难时期，给我们储藏一麻袋鲁西票就没出过问题，财政助理员姜学书（已牺牲）曾对他进行表扬。刘金钟领导一个落后村土改复查，没有他土改复查就搞不起来。象这样的教师，虽出身富农，但绝对不能清洗。清洗这样的教师，就是帮助了蒋介石。争论相当激烈，最后田科长作结论：对地富出身教师，不是恶霸地主，不能清洗。何器之说：咱胜利了。二区教师基本一个未清除，稳定了教师思想。

这是土改时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上的一场大辩论，也是土改时对待知识分子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五

“抗日游击高小”的建立与发展。

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筹划下，一九四四年我们成立一处

抗日游击高小，简称“抗高”。全称是：“筑先县抗日游击第一高小”。定居孙堂，后称：“筑先县孙堂第一完小。”校长是何器之，教员有：哈东亮、孙笑仙、许肖梦、朱明顺、何振东，指导员是黄建新（党员）。

办学宗旨：主要为国家培养干部。学生来源有少数是抗日流亡家属子弟，大部是二区农民子弟，也有几个东阿县刘集、孙郭一带的学生。当时，招收学生的条件，要求相当初小三、四年级的文化程度，主要是身体个子要高（记得在孙堂学校办公室门后，墙上楔了个木橛子，学生到那里一站，够高就行，一般不收身个矮的学生。在年龄要求上，十七、八岁为宜，二十几岁更好。在校学习一段，只要学习好，有觉悟，有一定工作能力，学习几个月就可参军、参干参加革命工作。因敌人不断出来扫荡，为此政府发给学校几支枪，学校搞游击教学。当时，游击高小活动过的地方有：王官庙、西董、赵庄、老三区的于才庄、东阿县的赵寺，阳谷县七级北边张庄等都曾住过。

在课程设置上有：语文、算术、史地、自然常识，政治时事等课。课程虽设置了，但没课本。政治时事课选学《冀鲁豫日报》社论或时事报导，语文课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有时抄选一些古文，如《晏子使楚》、《岳阳楼记》……等。算术课教师编写四则应用题和珠算。史地课除学一点地理知识外，学现代革命运动史。自然常识课也是老师选学材料，这种情况，到一九四九年也只是老师有一本冀鲁豫编印的自然课本，上课时以实物教学，如：讲杠杆原理，老师拿着一杆称上课，讲地球老师带个兰球上课，讲后再抄学习笔记。

当时，学生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没有教室，有时在野外树林里上课；没有课桌，学生在房东家找个小板凳，或弄个破砖当座位，两条腿蹲在那里当课桌。这种情况，一直到日本投降，校址定居在孙堂才好一些。

学校定居以后，为了改善师生生活，增加办学经费，除养猪积肥外，在后高东边高家寺，开垦了几亩荒地（庙地）种粮，以补助师生伙食。

为了方便学生走读，“孙堂一高”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先后又设立了两处孙堂一高分校：一处是“大王庄分校”，负责人孙笑仙，后为梁金中。这处学校一九五〇年独立改为“沙店集完小”，当年经县委书记王鲁光批准，拆掉“清凉寺”，盖了新校舍，即现在的“沙店集完小”。

“孙堂抗日高小”，到一九四九年八年级毕业，又招收九级。可惜考勤簿学生花名册未能保存下来，约计从建校到一九四九年八年级毕业止，为国家培养了三百多名干部，这些同学有的在战争年代转战南北，散布在祖国各地，有的在聊城地、县各部门负责领导职务。这是筑先县抗高的荣誉，也是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同时，也是筑先县教育史上光荣的一页。

从建校到一九四九年在该校执教的有：何器之、张英忱、哈东亮、孙笑仙、许肖梦、朱明顺、黄建新、何振东、孙郁中、刘英林、梁金中、张正亭、杜光洲、苗厚民、白咸月。这些老同志大部去世，目前健在者只有二、三人，但也是年逾花甲将近古稀的人了。

另外，一九四五年春，在筑先县三区（解放后划归东阿县）顾官屯西边玉皇庙，又建立了一处高小，校长是齐家旭，又名“抗日第二高小。”当年秋又准备在一区（聊城南

运河以西和运东部分村庄)建立“三高”，教育科长唐立全叫梁金中、范长申(老韩庄人)先在周店办一个班。因范长申在阳谷被日本鬼子逮着放回后，得了精神病，以后我找一区区区长张佃一(当时佃一同志由三区调一区工作)、教育科长唐立全商量，因人选无着，未能办成。总之，说明当时抗日政府对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抓的很紧。

六

其他：

(一) 聊东南几位热心教育事业的老前辈。

哈东亮，二区哈庄人，为人忠厚老实，学识渊博。是一九二〇年孙堂高等学堂创建人之一。曾任旧政府教育科县督学，亦曾在战前师范讲习所执教。一九二七年任孙堂高小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拥护我八路军抗日政府。当时抗日人民政府，动员士绅参加抗战的动员书信，多由他代为执笔。抗日高小建立后，他已年逾花甲，仍能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和其他青年教师一样，进行游击教学。他常说：“二区教育事业，咱不办谁办呀！”他这种为人之师的表率作用，对二区教育界影响很大，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聊东南知识界多数是他的学生，他在世时，我们都称他为“哈老”。因他对古文和古体字很有研究，人们称他是“活字典”。

许肖梦，二区石瓮屯人，为人老实忠诚，生活俭朴，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他负责数学课、自然课、也讲语文课。教自然主以实物教学，教数学如果学生听不懂，他往往吃着饭，一手拿干粮，一手在地上划着给学生讲，深受学生拥护，是受人

尊敬的一位优秀教师。

孙笑仙，二区孙堂人，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任孙堂高小校长，后调沂水任职，战争年代出任抗高教师，擅长数学，参加抗高时，也是一位近六十岁的人了，他一直坚持到建国后，仍在孙堂完小执教，也是受人尊敬的一位老教师。

张英忱，蒋官屯东北孟营人，战前任孟营高小校长，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是筑先县抗日政府的老参议员。一九四六年曾任抗日一高校长，聊城解放后病故。

（二）战争年代，二区教育事业办的如此活跃，是与当时领导分不开的。区长谭启明在抗战时期，住遍了二区所有村庄，每到一村，对该村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不是和统战人物谈话，就是和知识青年讲解抗日形势，借此了解情况。一九四四年六月，敌人大扫荡，在反扫荡中，一天区政府几个人住在敌占区姚集，上午学习当前形势，参加学习的有付朝河、杨金岭、还有本村一个老教师姚念友。正在学习，忽然群众乱跑，我们跟着群众也跑了一阵。后来得知是我们一支运东游击队，跑步去截击向聊城去的花牛陈的敌人。同时得知昨晚县大队中队长谢家福在孙堂遭遇战中牺牲的消息。当天晚上住在后军屯，我说“敌人到处扫荡，我们住军屯保险吗？”他胸有成竹的说：“不要紧，环境越紧张，住这里更保险，因这里是聂湘溪的家，敌人扫荡，不扫荡这个村。”我这时才知道聂湘溪是国民党政府的旧人员是知名人士。连汉奸都怕他三分，不敢得罪他。这天除和知识青年聂新增谈话外，中午聂湘溪又请谭区长的客，在聂东瓦房客厅里，酒席桌上，他又作聂湘溪的思想工作，两个人谈的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后来聂说：“谭区长，象我这样的人，算不算地

主？”谭很策略的说：“你算地主，也只能是破落地主。聂很高兴。这说明在反扫荡中，他也不忘统战和团结知识分子工作的。因此，二区所有知识青年，有的参加政府工作，有的参加教育工作。他待人以诚，批评人也是很中肯的。记得批评×××，他指名道姓的说：“你太落后，工作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以后的历任区长孙德祥、周明轩、姜立民他们都很关心教育，开教员会都是区长直接布置工作，或讲解形势。我记得日本投降时，姜立民区长派专人给我送去一张“号外”。区长对我们亲如兄弟，有说有笑。因此我们干劲很大，心情舒畅，有什么问题找区长谈谈都能立即解决。

（三）一九四六年秋，除聊城县城未解放外，全县划为七个区。为了培训教师，县府在小店子天主教堂开办教员轮训班，第一期学员一百多人为一个大队，队长衣指导员。下设两个分队，一分队队长周长毅，二分队队长梁金中。开学时，申云浦政委讲过形势报告。我们学习了政权建设、知识分子政策、政府的法令、当时解放区施政纲领、革命运动史等。轮训班办了三期。全县教师轮训一遍。

一九四八年，全县教育有所发展，又招考录取了一部分新教师。教育科长焦家俊、科员陈玉魁。各区文教视导员有：刘祥庭（病故）、陈自强、林耕、刘景尧（病故）、梁金中、桑重华（病故）、周长毅（病故）。

（四）二区根据地教育情况，我就知道这些，因时间太久，可能在时间上有的不准确，肯定遗漏不少，希知情同志补充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

我在解放聊城的战斗中

杜堂

一九四五年，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为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我抗日根据地政权，遵照朱总命令，于是年冬，一举包围了日伪汉奸盘踞多年的聊城。这次，是由我刘、邓大军第二纵队宋任穷、陈再道同志率领部队攻打的。一九四六年冬，由我七纵队杨勇、张霖之同志率领部队，再次攻打了一次。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我二野一纵队又进行了围攻。聊城这座鲁西北的古城重镇，陷入了我广大军民的层层包围之中，龟缩在城内的伪顽之敌，已成瓮中之鳖，死期临头。

回顾在围攻聊城的战斗中，我军奋勇杀敌，敢于献身的英雄业绩，至今记忆犹新。我地方团部驻龙湾村。我所在连驻南关，连部就在天主教堂里，团长叫梁绍臣，政委代庚寅。本团原系聊城县大队和阳谷县大队合并升级无营建制的小团。后又和六团合并，部队番号仍叫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二团，团长岳舜卿、政委杨基明、付团长刘金标。我们这个团配合主力部队围攻聊城之敌，感到无上光荣，全体干部纷纷表示杀敌立功，以解放聊城的实际行动，为家乡人民贡献力量。我们这个团的前沿阵地和汉奸仅是护城河一水之隔，喊话听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任二连指导员，经常在前沿工事里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给他们讲形势，亮政

策，指出路，正告他们当汉奸可耻，众叛亲离，执迷不悟，下场可悲。欢迎他们投诚、起义，弃暗投明和家人团聚。碰到顽固不化的家伙，就不厌烦的打枪还击。我们也只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时，敌人和我们对喊几句。那时，因我年青，发音细，嗓门高，敌人竟把我说成“女指导员”又来了。

有一天，一连连长李新才同志，来到工事前沿，刚对敌人喊了几句话，就被敌人的冷枪打中了头部，当即牺牲了。×连指导员刘锡爵同志在战壕里走着被敌人发觉打了冷枪，也当即牺牲，他是个学生，又是独子，家里年迈花甲的母亲和妻子，只好过着孤苦的生活，还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两军对垒，连长苗景华同志带着通讯员陈兴义同志到前沿观察敌情，不一会我们聪明能干，年仅十七岁的小陈同志腹部中了敌人冷枪，抢救无效，也和我们永别了。常言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汉奸依仗坚固高大的城墙，居高临下，我们稍有疏忽，就有吃亏的危险，因而，围城一年多，可以说全体干战没睡过一天好觉，身上生了虱子也毫不在乎。决心把敌人困死在城内。一年多的围困，致使敌人弹尽粮绝，只好向他们的主子告急求救，他们的主子也不得不时而空运点吃的抛到城里（有时扔到城外），但只能起个打气作用，根本挽救不了他们灭亡的命运。然而，以伪参谋长王金祥为首的和伪团长付崇鲁、伪旅长赵振华、伪二团团长郭培德等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这些民族的败类，人民的死敌，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却狗急跳墙，作垂死挣扎，曾几次窜到城西村庄抢粮，都被我军打的头破血流，狼狈逃回。还记得在一天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狗汉奸妄图偷袭

我南关驻地，住在路西的兄弟连队不慎遭受了一点损失，我们的党员排长何金香同志因和敌人拼刺刀而英勇牺牲了。住在路东的我连同时和敌人接上火，当时，我和战士们死死咬住敌人打，在激战中、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简直象火龙火海一样，火光映红了整个南关上空，我连凭借着简单的工事，个个同仇敌忾，英勇杀敌，都上了刺刀，准备与敌人拚个你死我活，把个人安危都已置之度外，打的狗汉奸不敢前进一步，直到天色发亮，敌人见势不好，才仓皇逃回城内。一夜激战过后，我军无一伤亡，因而，我全连干战斗志更加昂扬，战歌更加嘹亮。被我围困一年之多的伪顽之敌，弹尽粮绝，走投无路。我于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将聊城这一古城解放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聊堂工作团活动片断

赵国璧

一九四三年前后，聊城、冠县、堂邑结合部的马颊河两岸，天灾人祸交加，我抗日军民的生活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天灾，主要是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颗粒无收。蝗虫也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夜间成群起飞，连月亮也被遮住，落在田里，一夜之间庄稼全被吃光。为害极为严重。那年还闹了豆虫灾，遍地皆是，为害甚重。人祸，是敌伪军为害。聊堂一带地处鲁西北战略要地，日寇为实现其“强化治安”，进一步侵占鲁西，除了在各县城派重兵防守外，在聊堂冠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挖封锁沟，对我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同时，在这一带及其周围驻有大量的杂牌军，如齐子修、吴连杰、周致中（周二虎）、栾省三（栾小秃）以及冯寿彭（冯二皮）、肖健九、罗兆荣等部，计有数万人之多。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鱼肉乡民。在人民群众生活已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到处烧杀抢掠，看到谁家烟筒冒烟，便去抢粮，群众耕地，他们便去抢耕牛和种子，实在没有东西可抢，便去摘门窗。群众根本无法生产自救。另外，这个地区封建地主顽固势力的统治也很厉害。到处有围寨，有武装民团，有地主控制的村、乡、区政权，这股封建地主顽固势力一方面被国民党顽固派直接操纵，一方面与日伪杂勾结，坚决与我为敌。他们凭借日杂和伪政权的力量，欺压民众，借灾荒之机巧立名目掠夺土地。在这天灾人祸的双重逼迫下，这里的广大群众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凡能够走

得动的，纷纷背井离乡，逃荒到东北和黄河以南的地区。剩下的无亲可投或老弱病残的灾民，大都活活饿死在路旁、屋内。大片土地荒芜，无数房屋倒塌。仅据桑阿镇一带三十二个村的调查，就饿死了一万一千多人，平均每村三百多人。管屯村原有人口二〇七人，一年饿死八十七人，死绝八户，十二人下落不明，灾荒中村里仅剩下三十六人。这样，在冠县东部、堂邑南部、聊城西南部方圆六、七十里的地带，便形成了目不忍睹的“无人区”。

一九四四年我军打垮了齐子修部数千人，收复了桑阿镇一带大部地区。同时，拔掉了被日伪军常期盘踞的十几个据点。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聊堂“无人区”急待开辟。这年冬天，冀南一地委决定，把刚集合不久，由二百多名县区级干部参加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原班人马，改为开辟聊堂地区的工作团。工作团由孙良才、王东海等同志负责。当时我正在干训班学习，自然也就成为开辟聊堂新区的工作队员了。

工作团进入新区之前，地委书记许梦侠，副书记杨易展等同志讲了话。地委并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工作团受聊堂县委和冀南一地委双重领导，团党委负责人参加县委。工作团以下按区设置五个工作队，负责人参加所在区委的会议。二、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打击敌人，开展反霸斗争；减租减息、赎地，恢复发展生产，帮助农民重建家园。在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三、工作方法是，进入阵地前，由县委和工作团党委将工作队员按区分配到所要进驻的每个村庄。从访贫问苦入手，逐步站住脚根，把群众发动起来。口号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出村，坚守阵地，人在阵地在。经过简单训练和动

员后，我们便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出发了。

在我们开进之前，那里不少地方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抗日武装有已达二百人左右的马颊河支队，每个区有一个二、三十人的区队，但是，工作基础仍然是很薄弱的，敌人还相当嚣张，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北边敌人盘踞在堂邑城，附近有不少伪杂据点，南边伪军部培德部数百人还占据着沙镇、温集、张双镇等，东边有敌人占据的聊城。在我们出发的第二天拂晓，当还没和所在区的负责人接上头的时候，便遭到了郭培德等部的突然袭击，原训练班负责生活的徐大队长（元朝县武委会主任）便牺牲了，有的同志负了伤。对群众情绪是个打击，但工作队员毅然进入阵地，开展工作。

我被分配在二区靳屯村，和梁建章、庞勃等同志进驻的村庄是邻村，我们在一起吃饭。当时，这一带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村与村之间原有的道路被荒草淹没。村子里野草丛生，狐狸和野兔成群结队，踩出了明显的路径。有一次，二斗二团一个连的战士，手拉手围成圆圈，中间几个人手持木棍，一下子就打死十二支兔子，可见兔子之多。到村里找不到人，就是找到一个，他也不知道本村谁还活着。有的饿得奄奄一息，有的已经死在炕上，有的死得时间长了只剩下一堆骨骼。村里勉强活着的人也不敢接近我们，他们怀疑我们是否能站得住脚。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坚持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一个贫农积极分子，有时需要进行几十次的交谈。靳屯有个叫靳良海的，开始不敢和我公开接触，经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讲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才逐步觉悟起来。我们经常离村一里多路的红荆条棵里交谈，晚上我就住在那里，后来经过靳良海串连，发展了五、六个积极分

字。许多逃荒在外的群众，听说家乡来了工作队，纷纷回来了。各村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这时候，我们便开始组织领导群众向封建顽固势力、恶霸地主、敲诈勒索群众的汉奸走狗、通敌走私以及乘群众之危掠夺土地等不法分子开展了斗争。工作开展较好的村庄，斗了几场，取得了初步胜利，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封建顽固势力和盘踞在沙镇、堂邑等地的日伪军勾结起来，向工作团和群众积极分子进行疯狂的反扑。原永智县的一个区委书记颜海川同志，住在荆屯村发动群众，夜间被这个村的几个恶霸地主捆到村南坑里，用标枪活活刺死。一九四五年旧历二月初五日晚饭后，李官屯村的贫农积极分子正准备在黄启功家召开会议，本村恶霸地主黄启武、黄启明和伪村长管玉山勾结堂邑的伪军五、六十人，将黄启功的院子团团围住。黄启功出去召集人还没回来，敌人便把他的妻子当场杀害。凶残的敌人又将贫农积极分子黄福江砍死，一连砍了数十刀，又一刀把积极分子黄福来的肚子戳穿。黄启功四岁的小儿子黄双全吓得喊奶奶，被管玉山一枪打死。七岁的黄双兴被一枪打死在炕上。接着，敌人又包围了贫农组长崔金斗的家，崔金斗的母亲和三个弟弟都被砍成重伤，后被送进我军医院抢救，才得以幸存。这个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各村。引起翻身农民的极大愤慨，迅速地组织起民兵联防，以打击敌人，工作团的同志和民兵、广大群众一起坚持斗争。我们白天帮助群众锄草、耕地、拉耩，傍晚掩护妇女孩子转移，夜里就打起了游击，河岸上，树林里，坟头上，青草荒坡里，都是我们的战场，一夜不知道要转移多少地方。

一九四五年旧历四月十三日，工作团负责人王东海同志被调往南峰县（即今莘县朝城一带）委任县委付书记兼宣传部长。临行前，他带着警卫员小张同志到各工作队员的住处辞行。他们先到了我住的靳屯村。吃过中午饭，天下着小雨，他们要到郭官庙去。我建议他们回靳屯过夜，因为我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有几支枪，我还自己动手挖了地道，比较安全。他们也表示同意了。他们到郭官庙后，雨下得更大了，于是便改变主意住在了那里，和工作团一个姓徐的住村干部住在东屋，小张睡在外间门板上，王徐二人睡在里间。另外，还召集了几个民兵住在门道里。原来他们住的这个院子，是该村恶霸地主郭开全的家。这时郭开全已跑到堂邑当了汉奸，家里只剩下他母亲住在北屋里。这天夜里，该村一个通敌分子去堂邑给郭开全报了信，郭开全和伪军头目史大麻子立即带领堂邑伪军中队包围了王东海等同志的住处。王东海同志发觉后，拿起手枪爬上房梯，准备从房上走，不料这时房顶已被敌人占领，他们从房上用刺刀将王东海同志刺中，跌落下来。敌人一拥而上，用刺刀和标枪将王东海刺死。警卫员小张躲进厕所，也被杀害。听到王东海被杀害的消息，一大早我们都赶到现场，只见他肠子流出肚外，死在血泊里。王东海同志，是莘县城南人，曾任宣传员、油印员、油印科长、县委宣传部长等职，被害时年仅二十五岁。后来马颊河上兴建起一座桥梁，为纪念王东海同志起名叫“东海桥”。

敌人杀害了王东海同志以后，气焰更加嚣张，不断袭击工作团人员驻地。工作团的同志仍然坚守阵地，与广大群众一起向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许多工作队员表现了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至今为当地群众所传颂。工作队员、冠县一

区区长梁建章同志，开始和我住在一起，后来被分配到米楼村工作，住在一个农会积极分子的西屋里。一天夜里，沙镇伪军头子郭培德带领几十名伪军包围了他的住处。敌人不敢贸然进院，先在房顶上向院内打枪和投手榴弹。梁建章同志突然把门打开，将被子投到院子里。敌人误认为有人出来了，就集中打排子枪并投了几颗手榴弹。老梁趁着这个混乱的机会举起匣枪向房上射击。就在敌人受到突然袭击一时懵头转向的一刹那间，梁建章同志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跑到村北又打了几枪，高喊：“一班、二班向前冲！”借以迷惑敌人，敌人摸不着虚实，怕受到我军打击，便仓皇逃跑了。

由于敌人频繁进攻，环境又日益恶化起来，工作队和群众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波动很大。地委遂决定全体工作队员撤出阵地。集中到马颊河以西冠县境内进行整顿。地委负责同志给我们讲了话，除讲了抗战形势和对工作队表示慰问外，也讲了工作团这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当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党组织和民兵组织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的时候，便急于开展群众斗争是不妥当的；强调坚守阵地不离村，分散了力量，便于被敌人各个击破，是一种“左”的情绪；武装力量薄弱，特别是小部队，武工队的作用发挥得不够，致使封建顽固势力和通敌分子，猖狂起来，甚至疯狂到几个坏人纠集在一起暗杀抗日军民的程度。地委发动全体工作队员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围绕着回去还是不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部分同志表示不赞成再回去，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如果不回去，敌人会更加猖狂，积极分子会有更大牺牲，对群众情绪打击更大，为将来开辟这个地区带来更大的困难。根据当时的情况，地委决定由原工作队员自愿报

名，组织批准，建立武工队，三五人一个小组，集体活动。当时有二十八人报了名，号称“二十八宿”。我也报了名，成为其中的一员。和我编在一个小组的有程浩及梁学礼。凡是回去的同志，每人发一支匣枪，二十发子弹。

这次回去之后，首先和各级组织取得了联系，接受了任务，组织发动群众向伪顽和封建顽固势力发起更大规模的斗争。特别是公审了杀害王东海、颜海川诸烈士的凶手郭开全、管玉山等人之后，群众的斗志受到极大的鼓舞，民兵、农会、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迅速建立。各项工作进展很快。减租减息赎押、增资、增佃等政策都得以贯彻执行。群众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并取得了好收成。这时，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军开始转向战略进攻阶段，根据地日益扩大。鲁西北的抗战形势迅速发展，相继解放了堂邑、沙镇等重要据点。不久我军又严密包围了鲁西重镇聊城。聊堂地区的人民群众在生活仍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参加支前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由于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地委决定工作队解散，工作队员有的回原单位工作，有的留在本地任实职。我被分配到聊堂县二区（以现在聊城市的张炉集为中心）任抗联主任。一九四六年春天，上级决定撤销聊堂县，恢复聊城县、堂邑县的建制。我与县委书记杨立功和王策、刘静岩同志乘马车从李大庄出发，到当时一地委所在地临清市由地委重新分配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一九八六年春

编注：赵国壁同志，山东冠县孙庄人，一九四〇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聊城地委付书记，一九八二年离休。

难忘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以堂邑县为中心的“无人区”

陈福康

回顾我大半生的革命生涯，唯有一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每逢想起来，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残暴的日寇和伪军在原堂邑县制造的“无人区”。

(一)

那是一九四三年秋，日伪军为了摧毁我冀鲁豫解放区，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冀鲁豫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在所谓“准治安区”内、日寇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并用。怀柔政策即加紧欺骗宣传，实行奴化教育；恐怖政策，则普遍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炮楼，并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另方面对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疯狂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疏离扫荡，囚笼政策和野蛮的抢光、杀光、烧光三光政策，使我八路军和游击队陷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上级为了粉碎鬼子的秋季“大扫荡”，冲破敌人的“囚笼”，渡过难关，决定越过敌人的封锁，到敌后开辟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政策，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实现全民皆兵，为全国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这个“无人区”是由国民党三十一旅旅长吴连杰、二十二旅旅长周二虎、三支队司令齐子修、土匪司令栾省三（外号栾小秃）等日伪顽匪一手造成的。这些家伙在这块地方、横征暴敛、奸淫烧杀、敲诈勒索、抢男霸女、苛捐杂税、抓夫抢粮、无恶不做，将农民剥夺得殆尽。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为了反共防共统治群众，修筑了一条从聊城至冠县约一百多华里长，深宽数十米的封锁沟和沿途的碉堡、炮楼，大肆抓丁抓夫，使大片耕地荒芜。再加上一九四二年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大虫自然灾害，颗粒不收，使广大农民陷入一贫如洗的饥饿死亡绝境；造成了西南至马桥、桑阿镇，东北至梁水镇、土闸长达八十华里、宽达三、四十华里，涉及冠莘堂聊四个县十多个区，近一千多个村庄，约四十万人口的“无人区”。仅丁庄七百人口的一个小村子，就饿死了二百五十多人，冻枣园饿死的人占该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真是荒地千里、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那时我们来到“无人区”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荒草凄凄、白骨累累、尸横路旁。常常是既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望不到一缕炊烟，连一个家养活物都看不到，宛如走进了人类诞生前的洪荒世界。我有一次迈进一家四合院，想寻到一个活着的人，未曾想阴森森的院落空空荡荡，寂寥荒落，室室皆空，不仅没见到一个活人，而且连一只鸡、鸭、狗之类

的活物也没看到。我走进上房屋，一领炕席四角用四块坯头压着，我揭开一看，是一具老太太尸体。可见人死的死，跑的跑，到何种程度。死了人没人抬出埋葬，可想当时惨景。俗话说：“旱不死的葱，饿不死的兵”。可是在这连树皮都被剥光，猫狗都被打死充饥的“无人区”里，到处翻箱倒柜抢粮的当兵的，也难以幸存了。人，死的死、逃的逃、连死尸都无人收敛埋葬了，道路两旁到处可以看到死人骨架。真是天灾人祸一起来，恶性循环人遭殃，凄凄惨惨家破散，十室九空好悲伤！在这样的地区，共产党要在这里开辟工作，恢复生产，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各种困难艰险可想而知。

那时，县委书记肖平同志率领县委一班人马，便立即研究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动员逃出去的群众还乡，恢复生产；

二是政府贷给食物和生产工具、牲口；

三是号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提倡打兔子渡过饥荒。

因为土地荒芜，野兔有了繁殖的好机会，所以野兔很多；

四是三年不收农业税；

五是贷粮赎地；

六是陆续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发展生产，开展各种经营。在这期间，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同志生活也是非常艰险困苦的。白天，分头四处奔波做群众工作和对付敌人的袭击；晚上，为躲避敌人的“扫荡”，挤在村外潮湿的地窖里睡觉，而且还互相开玩笑穷开心呢！

经过两年含辛茹苦的工作和群众的发奋努力，“无人区”终于又恢复了生机。当我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离开堂邑县的“无人区”赴东北开辟日本投降后的工作时，“无人

区”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气勃勃的解放区了。

一九八六年春

注：原堂邑县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划归了聊城县。

编注：陈福隆同志系河北省馆陶县陈范庄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辽宁省铁岭地委书记，现辽宁省铁岭市政协主席。

我在武训县抗日工作的回忆

李寿彭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署务会议决定我到冠堂办事处任秘书。二十九日和冠堂办事处主任梁向明（堂邑县人，临清中学学生，比我小六岁）晤谈，他很高兴，下午我们即相偕进入北上途程。当晚住西江店村，三十日到达西张庄（在贾镇据点北十里，属冠堂办事处一区）。三十一日，我与办事处炊事员杜文汉赴卫东县（即临清县卫河东部分村庄，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建一新县定名“卫东”，属冀南四分区，县长为解方，河北省巨鹿县人，曾任广宗县长及临清秘书，秘书为王宗约、河北省威县人）准备迎接家属东来，途遇大雨，在连寨淌水，远而且深、险甚！当晚住在潘彭祖店村。时县工商管理局住该村，我在局长张光斗处宿歇。九月一日与威县岭上村之李老雅（在工商管理局工作）商妥，由李派其小甥郝志义（申街人）于二日前往迎接我爱人候杏村等。三日下午三时许，我到村西候接，遥望湘琴（我的第三女孩）向我跑来，我亦赶快向她跑去，越跑越近，终于和亲人见面，宛如梦境！后郝志义继至。晚上，我们即住潘彭祖店。

绝处逢生险中险，时来运转难上难。岂知次日黎明敌伪

军竟包围了村，我们听到枪声，急急闯出东豁口向东南方向跑去，一路枪声断续，经过官庄、塔头、夫人寨到乔二庄暂歇，晚上宿住西张庄，从此，在卫河之东的工作和过时光了。

时鲁西北虽归冀南行政领导，将冀鲁豫第十二专员公署改称冀南第七专署，但冀鲁豫仍未截然划分，工作上藕断丝连，仍照常给七专署续发通令、指示等文件。我到职后，不久又兼任民教科，九月中曾主持参加区长联席会及士绅座谈会等，十月到四区领导秋征工作，具体指导各村，常住乔二庄，夫人寨，王樊庄，掌握政策法令及具体数字，如期完成征收任务。后协同张更生（时为冀南文总负责人之一）、张半农（时在卫东县文化救国会负责）、王宗约等主持纪念武训一〇七岁诞辰筹备委员会，每逢柳林镇集期之次日，赶赴柳林与当地绅士知识分子开会讨论，至年底以前，陆续召开三处知识分子座谈会，除动员一些在乡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如刘清波、刘福中、范茂先等）外，费劲不小，收获不大。十一月十六日，冠堂边办事处奉令改称武训县抗日政府，我仍任秘书，民教科改由石汝房（邱县人）继任。我到武训不久，曾遭敌人对王蔑村之合围，七专署财政科长李志华即在此役失踪，后探悉被敌俘虏。我们幸躲到柳邵村一带暂避。梁向明于十一月外出参加会议，我曾带领县府及部队到四区东部各村游击活动，所到之处多为他们一向所不曾去过的生僻村庄，到处还协助各村做改造村形工作。武训县各村多有围墙，至今未拆除，颇不利于游击活动及人民躲避敌情，部分破毁是至关重要的。并在驻温庄时，果断的取消了柳林镇的旧太乡公所。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吴逆连杰（武训县吴海子村人，常自出扰或配合日寇“扫荡”，人民恨入骨髓），出扰乔二庄，我和杏村等曾跑到东国儿寨躲避。先记述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在五区戴里庄召开连续五、六天的全县军政民全体干部大会，我参加主席团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筹备和主持会议，正在开会时，王二庄等据点被迫撤走，我曾与县参议员李一香到王二庄一带办理宣传教育与慰问救济等善后事宜。六月我曾到县东部之六、七区（其中有重灾村和无人村，国民党反动派齐逆子修，曾在冠县、武训县东部广大地区制造惨绝人寰的“无人区”）做督促麦征工作，均大致完成任务，在七区十余日后，又转到六区，带领工作组日夜抓紧征收，通讯员张安乐等二人随我行动。七区过去为顽军江逆开岷盘踞地区，我与敌、顽三方面都在该地征收，民众苦不可言。我们每到一村，譬如在东街征收，江匪部即同时在西街征敛，工作不易顺利进行，因此，我常住梁水镇以北各村，入夜则到荒村（指无我方之群众基础村庄）突击征收后，并立即运到我之基本区，昼伏夜行。我在梁水镇时，江匪部有一次无故捣乱，全村炸了起来，我们即机动转移了。该镇南建有范筑先祠堂，时范塑像头部为敌伪毁坏。自三月开始，为进行工作便利，即率秘书处人员转入地下，住胡里庄，梁有时亦到六、七区，我则照顾县府全局，并兼任一、三、五区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县生产救灾委员会亦由我负责并召集会议）曾作出《移民垦荒计划》，即将一、四区人口较密村人口动员疏散到六、七区无人村落户，另建新村，称“劳动互助社”。开过两次生产救灾会议，办理两批移民垦荒创举，进行尚称顺利。

至于其他工作，我负责领导参议会（参议员有穆仲山、李一香、王少渠等，负责人为赵荫庭）及团结士绅、知识分子工作，参议会住在韩路村。对柳林镇问题：该镇虽位县中心区，但因被国民党特务及顽固绅士盘踞时久，影响我方工作进行不甚顺利，他们幻想国民党卷土重来，因此，发展与巩固我方工作成果尚成为严重问题。四区区长李荫隆竟为坏人所包围，为镇长张继德之甘言巧语所诱惑，使自己形成傀儡，致工作受到一些损失。我对动员在乡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开始时操之过急，缺乏长期耐心的说服教育，致见效不著（如王光成、马淑荣、张守炳、肖太昌等均未动员出来）。我于五月九日，曾给周持衡一封长信，条陈若干有关领导的方法方式的合理化建议，未得复函。本年夏，冀南行署建制撤销，与冀鲁豫行署合并，七专署即改称冀鲁豫七专署。上半年县境敌伪据点少了，但二十里铺村安敌据点，影响冠堂路的南北通过很不方便。敌人曾大举作“三、二九”合围扫荡，我与杏村等夜住东国儿寨，次日又在甘官屯遭逐敌伪袭围，我带次女毓琴曾奔向蚕姑庙村。半月之后，我在孔里庄又遭敌军夜围，被通讯员背负逃出，跑向辛集镇西庄避宿。三月中，敌人图包围东进抗日游击支队窜入乔二庄，杏村等避入房东夹壁墙内，幸免迂难。六月麦收时，东支正在柳林一带保卫麦收，有一天白日遭敌军数路合围，战况激烈，支队长夏碧波（名全亮、河北省深县人，牺牲时不满三十岁）在柳林镇东武训墓附近光荣殉国，万民痛悼，挥泪如雨，胜丧考妣，群众还为之树碑纪念，旋被敌毁，屡毁屡建者多次。当地人民永远怀念夏支队长。夏碧波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武训县的工作，虽已在抗日战争末期，但有些工作仍处于开辟阶段，甚至连破路藏粮均未彻底实行，寨墙完整如昔，因之我方的游击活动及群众躲避敌情，都发生困难和不便。我一到此地，很想把它逐步建设如四分区那样，有些急性病。当时不断传说武训将划为二县，全县村庄甚多，六、七区荒区单独建县，并拟由我负责新县工作，后以周持衡调走整风学习，此议遂寝。有一时期，领导上拟让我兼任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我因兼职太多，势难兼顾，终于未同意。

到太行整风情况，七月初周持衡离专署后，由分区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杨新一（后南下病故）代理专员职务。当时县正在王刘八寨开干部大会，我任大会负责人，连开六、七日，突然收到专署来信，让我到太行区参加整风学习，并须及早赶到专署集合，听候出发。我感到这是上级决定，不能有违，时杏村等正住韩路，她听到消息，泣不成声。以后我即准备一切，二十二日她到县府开会后，县府同意我赴七专署转往太行，商妥杏村等仍住武训，照常救济，由梁向明负责照管。七月三十一日由武训启程赴七专署，有通讯员张安乐跟随，八月一日即到专署，杨新一说：“武训是大县，且整风者都已成行，你还是再转回武训吧。”我因各事准备就绪，不原随即回转；时正值我军打开莘县城，分区机关很忙，我曾为他们代拟对莘县城附近民众之布告，日夜随专署行动，和秘书张化南住一室，相谈甚洽。还一面在地委同许梦侠（冠县人，回族，自肖永智牺牲后，任七地委书记）、杨新一对我作鉴定，一面等聊堂边办事处（即聊城与堂邑边之政权机构，当时尚未成立县政府）副政治委员丁润生，决定让我

二人结伴同赴太行。我们于九日晚上由马连村行军至莘朝县之南安头村（在张炉集南约五里），时至半夜后一时，突遭敌军包围，胡同口上响着机枪，我便爬上一墙头跳出村外，潜入豆秧、高粱地中，敌人追喊声声，我仓忙将所带手章、组织介绍信及钱包埋在一棵大高粱棵根旁，以待天明。黎明时村中枪声不停，我估计蹲在青纱帐中不稳，距村太近，乃蹒过马颊河往西奔逃约四十余里，将近卫河之滨，午后奔回王奉镇（属莘朝县，分区地下机关多在王奉附近各村），暂到王涤生所在之高小休息，后转专署财经科住宿。十一日清晨，我自封为七专署代表亲自到南安头村挨户向被害群众善言慰问，临离该村时到避敌之高粱地中刨取介绍信等，幸未遗损。归后暂住财经科，晚上则在洞口睡觉，如敌来即入洞内，有时我还协助他人在屋顶站岗。我因东西全失，仍去太行整风，颇感困难，曾致函杨新一请其考虑决定，一时未获复函。我以腿上遍被草刺成疮，曾找到左东初医治（原名左映辰，河北省巨鹿县人，河北省立冀县第六师范同班，左学习二年后，退学习医，时在鲁西北一个医院工作），他见状颇表同情，细心治疗。

我处万般无奈之际，自量难以远行，乃于十五日毅然决定，一面给杨再去一信（曾到观上村分区交通局处发信，时该局负责人为黄海，建国后黄曾任北京市园林局长），一面经桑阿镇转入回武训的程途，一路大雨淋淋，衣服尽湿。在桑阿镇以北某村迂一匪徒，频频吹口哨险未遭其抢劫。以后摸索奔跑，已找不到正路，上淋下淌，草地急奔，至过冠堂路时，天色昏黑，迷失方向，致误走到贾镇敌据点以北的刘家洼里村，慌忙离村北去，及闯至村北豁口，险为该村民兵

手榴弹击中，旋狼狈逃至荆家楼见熟识之村长（因该村长常到县府参加会议和我较熟。）正拟在该村住宿，却遇刘家洼里的民兵二十余人急急追来，必要将我带回刘家洼里不可，经与荆家楼村干商定，将我押到一间东屋里，收缴我所带手枪，门口站着三个民兵。时夜雨如注，我向他们交验证件手章，亦不管用，民兵中有一人曾在冀南军区当过兵，已回了家，当我向他谈到宋任穷时，他点首微笑，有所领会，如果说我以后终于没被活埋，此人可能起一些有益作用。经过彻夜达旦向他们说服解释，舌干唇焦，终不获释。刘家洼里村长蛮横地说：“等天明送你到区里再说”！黎明后，两村村长及民兵十余人押解我到西张庄见一区民政助理员孙异之，孙一见状，大吃一惊：“李秘书！为什么这样？”我向他简告一夜遭迂之后，他极表同情，再不听村长们的说话，极端愤怒地斥责：“你为什么押着李秘书？为什么叫你们看了证件，你们还敢这样蛮干？”刘家洼里村长等吓得瞳目结舌，面色如土，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孙招待我用饭之后，我便一瘸一拐地往胡里庄路上走去，孙当即将那个村长扣留在一区作反省检查。荆楼村长小声告我：“李秘书！你这一夜好险啊！这小子三番五次定要活埋你，他仗着贾镇敌人，翅膀可硬哩！”日当午我跟跄到家，杏村赶来忙问：“怎么回来啦？你莫非又闹病？……”我顾不得仔细回答，便伸脚舒腿躺卧炕上，再也难以走动了。经杏村连日以香油熬黄蜡，细心在双腿抹擦，并将草刺从烂肿处一一挑出来，始稍消肿痛。不日梁向明来看望说：“这可真危险！真是无枉之灾，那里没有我们工作基础，是忠心事敌的薄弱村，在那里出了事，咱们一点咒念都没有！幸亏你脱了险了。”九月四日，我已

健康渐复，和财经科长位常捷到专署参加秋征会议，并将我的经过情况当面回报，杨新一说：“你走后，丁润生就来了，他已向太行走了。你就安心领导武训工作吧。”从专署回县时，和地理熟悉的通讯员吴克云同伴，行至冠堂路边，正值伪军数十人自西而东经过，相距甚近，幸未遭敌枪击。

九月中旬，到边庄作秋征示范村工作，由我作领导，另配备有六、七个干部，创造了典型经验，曾在当时之《鲁西北日报》发表。每晚回宿胡里庄，白日再赴边庄，有张安乐跟随，约十余日即告完成。当时曾见到七专署之指令谓：“为加强领导工作，特由该员兼任民教科长。”我曾草拟《武训高级小学编制草案》，经卫东、武训二县同意，将两县之高小合并，称“武训抗日高级小学”，校长由我兼任，付校长为杨海楼（临清县人，原在四分区工作，和我熟识，时任卫东县高小校长）杨领导高小学生到武训县各村打游击，当时因北影庄变为敌伪据点，卫东基本区渐渐缩小，很少学校可以回转移之余地，只能在武训基本区游动，故合并之举为两县欢迎。此外，我还草拟了《武训中学编制草案》，准备有条件时逐步恢复原来武训中学的面貌，充实新的教育内容，以便为抗日和革命工作培养大量青年干部。是年秋季，卫东中部北影庄敌伪据点，对卫东、武训县基本区威胁极大，敌伪扫荡频繁，大汉奸高登科猖狂至极，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此后，不仅卫东县府常到武训县住，即清平县府亦因环境日趋恶劣也常来武训各村游击活动，在抗日时期理应相互支援，不应稍存地域之见（当时有人认为其他分区县府不宜常驻武训，是极端错误的，时卫东、清平均属四

分区)。冬季开始了以二、四区为重点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主要斗争对象为当地地主恶霸豪绅、国民党特务等。为将来实行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奏，地委负责人亦亲临指挥和坐阵柳林一带（如地委付书记兼宣传部长杨易辰等），始以自北影庄敌安据点，柳林一带国特相率投敌，为虎作伥，如不及时发动群众运动，则武训基本区更将遭受严重摧残，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即发生一些缺点偏差也是次要的。当时我正在主办党政军民干部整风班工作，故未参加此次群众运动。十一月中，我军曾一度打开吴海子，摧毁吴逆连杰的反动巢穴。胡里庄属小村，但敌人亦常来“扫荡”，几度到村骚扰，有一次，敌人黎明进村，我和家属由赵里庄村东向北奔跑得脱，时赵里庄正遭敌伪围攻，又有一次，敌人在黄。胡里庄杀伤群众十余人，枪弹打穿杏村衣襟。年底以冀，敌人“扫荡”王刘八寨，县工商管理局损失甚大。敌军往返常自胡里庄村西之南北大道窜过，我有一次率全体整风班人员机动转移至莫王庄一带去了。我回胡里庄时，下半夜不敢再睡，常到村东南地洞中睡在牛旁或远赴“无人区”过夜。生活和工作日益艰苦和困难。

路不走长草，刀不磨生锈。我当时曾根据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一句句对照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作风习惯，写了许多反省检查的笔记，对我的思想进步与转变起了指导与促进作用，可惜这些笔记竟未保存至今，确是憾事！地委曾来信，让我去见杨易辰面谈有关工作问题，时我正日夜忙于办整风班，且一面助人整风，一面也起自我整风的效果。正人必先正己，譬如牵牛下水，六脚齐湿，我也再未找他。九月底，县即决定由我主办党政军民干部整风班，我表

示同意，以后即开始筹备工作，共分二期：第一期自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第二期自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止。学习文件为：《整风的态度与方法》、《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反对官僚主义》及《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等，所有启发报告及学习总结均由我负责，第一期孟凯曾来协助，她主要管党支部工作，第二期则未来，只我独立主持。由我任整风班主任、整风班委员会主任及临时支部书记。每日昼聚夜散或集体行动，至第二期时地点稍为稳定，转移村庄的游击行军，统由我决定和指挥，尚未发生任何损失及意外事情。我在整风班还做了《我在主办整风班以来的转变与进步》的示范报告，办完第二期整风班，对我思想方法的进步影响很大，我在全县干部中的威信显著提高。兹将整风班进行日程及所住村庄摘录于下：

十月二十四日：开会词、《整风的态度与方法》的启发报告；

二十五日：粗读、精读、反省笔记；

二十六日：精读反省、系统反省、讨论通过反省；

——以上在边庄。

二十七日：整理反省笔记，反省示范；

二十八日：总结。《反对官僚主义》启发报告；

二十九日：启发报告；

——以上在元虎寨。

三十日：启发报告，粗读；

三十一日：粗读；

十一月一日：精读、反省笔记；

二日：精读、反省笔记；

三日：精读、反省笔记、讨论通过反省；

四日：讨论通过反省。

——以上在赵里庄。

五日：《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启发报告；讨论通过反省、小结、反省示范。

——以上在温庄。

六日：反省示范。

——在戴里庄。

七日：粗读、小结。

——在孔里庄、小纸坊头。

八日：精读、反省笔记。

——在小纸坊头。

九日：精读、反省笔记、李主任反省示范；

十日：系统反省。

——在饮马庄。

十一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补充反省笔记。

——在孔里庄。

十二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补充反省笔记；

——在饮马庄。

十三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补充反省笔记；

十四日：小结、休息；

十五日：《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总结；

十六日：《反对官僚主义》总结；

十七日：《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的启发报

告；

十八日：上述文件启发报告；

十九日：粗读；

二十日：粗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不正确思想）；

二十一日：精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两条路、条件）；

——以上在孔里庄。

二十二日：精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对革命危害、来源、态度）、系统反省；

——以上在小纸坊头。

二十三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

二十四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

二十五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

二十六日：小结；

二十七日：批评与鉴定；

二十八日：批评与鉴定、大检讨会；

二十九日：《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总结、结业式；

三十日：时事报告。

——以上在赵里庄。

以上共需三十八日，《整风的态度与方法》、《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及《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四个文件。第二期则少《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件。以上是第一期整风日程。第二期整风班人数较多，自十二月七日开始，其日程如下：

十二月七日：始业式、《整风的态度与方法》启发报告；

——在戴里庄。

八日：启发报告、粗读；

——在戴里庄、东祁家务。

九日：粗读、精读、反省笔记；

——在小纸坊头。

十日：反省动员与解释示范文章、精读、反省笔记；

十一日：讨论通过反省；

十二日：讨论通过反省、时事报告；

十三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

十四日：反省示范、小结、系统反省、休息；

十五日：总结。

——以上在戴里庄。

十六日：休息、班务会议；

十七日：《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启发报告；

十八日：上述文件启发报告；

十九日：上述文件启发报告、粗读；

二十日：粗读；

二十一日：精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

二十二日：精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

二十二日：精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

二十四日：精读、反省笔记（片断反省、系统反省）；

二十五日：讨论通过反省、系统反省、反省示范；

二十六日：反省示范；

二十七日：反省示范；

二十八日：讨论通过反省；

二十九日：讨论通过反省；

三十日：讨论通过反省、小结；

三十一日：休息，班务会议。

——以上在戴里庄。

附带述及琐事：我的家属于五月一日由乔二庄移住胡里庄小卯家。六月的一天，听到洪原方由临清县城敌据点狱中逃至肖里庄，杏村曾亲往看望，表示慰问之意。在乔二庄时种了一些豆角、北瓜、红薯、高粱、谷子，由女儿鹤琴等锄耘和看守，尚有收获。在胡里庄种玉米十余亩，收任不佳。秋收之后，清还所借公家粮食，所余无多，但生活渐能自给了，于是自九月份起主动停收救济。跟我之通讯员张安乐回家未几，改为臧增宝跟我，他在十二月曾到我老家看望一次。

进入一九四五年一月，仍继续主办第二期整风班，其日程如下：

一月一日：休息。

——在清太庄、莫王庄

二日：休息。

三日：休息、大检讨会。

四日：大检论会。

五日：续开检讨会。

六日：续开检讨会。

七日：《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启发报告。

八日：上述文件启发报告；

九日：精读、精读、反省笔记；

十日：粗读、反省笔记；

十一日：精读、反省笔记、李主任作动员报告；

十二日：系统反省、讨论通过反省；

十三日：讨论通过反省、反省示范；

——以上在大纸坊头。

十四日：反省示范、讨论通过反省；

十五日：讨论通过反省、小结；

十六日：《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总结；

十七日：《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总结；

十八日：优胜组民主选举大会；

十九日：整风模范选举大会；

二十日：群众工作会议、结业式。

——以上在东祁家务。

以上共需四十五日，第三期不再举办。有关整风班资料，至今尚存有《第二期“学习态度与方法”学习总结》、

《第一期“反对官僚主义”学习总结》、《第二期整风经验》、《第二期“国共关系与中国前途”学习总结》、《第二期各组挑战问题》、《第二期整风班结业式的致词》、《第二期“如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工作者”学习总结》、《第二期整风模范选举大会》等原始资料，约三万余字。

农历十二月十一日，我和杏村带四个女孩回南宮县老家看望，开始起程了。沿途经过种种困难，终于十七日到达我们六、七年来离别的家乡。老母高龄七十五，日夜病床呻吟，甚愿我调到二分区工作，二分区党政领导均欢迎我来工作，及与杏村商妥，积极作赴武训之行。农历二月初二日我们重返武训，初八日到达武训县境，有关调动工作必须请示专署。于是杏村等暂住胡里庄，我和臧增宝于十一日启程南下，寻找行署，连日急行，直抵驻在昆吾县之行署，经专员扬新一最后面准，不日即离开武训县转到二地委宣传部工作

了。

参考资料：另有我所写《我的抗战简史》、《在艰苦的岁月里》（亦称《淦卫东畔》）及《武训县干部整风班工作总结资料》等。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

编注：李寿彭同志曾任冠堂办事处，武训县政府秘书。

巧打阮庄小围子

击毙伪团长黄竹斋

徐明魁

一九四四年隆冬，天气虽然寒冷，可鲁西北战场上却打得热火朝天。在这抗日进入全面反攻的年月，仗打得更加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每消灭敌人一个据点，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也都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地下工作者正是这样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拔钉子，为民除害的工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添砖加瓦。

吴连杰部的黄竹斋团，盘踞在阮庄①小围子里，他投靠日本鬼子，为虎作伥，与八路军为敌，杀害我敌工科长，欺压老百姓，无恶不作，为这一带老百姓所痛恨。

黄竹斋据守的阮庄小围子，易守难攻，四周的围墙又高又厚，设有高低枪眼。围墙之外布有带蒺藜的铁丝网，网外环绕两道深壕，内壕丈余深，外壕深四丈，壕内有活水，壕外还有一道坑针寨，壕上两座吊桥是进围子的通道。黄竹斋带着他一团伪军的大部主力驻在围子里，另一部分伪军驻在旁边的阮庄大围子里，布局得体，防守严密。

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敌我双方形势，强攻，敌我力量悬殊，不能发挥里应外合的作用，付出的代价一定很大。因此，决定打阮庄小围子以智取为上，布奇兵，施巧计，里应外合，出其不意，出其不备，速战速决，取得胜利。

战斗打响前，分区二十二团参谋长刘墨卿亲自带着二连两个排，由我支部组织委员满九成同志带路，隐蔽在事先选好的埋伏地点。

腊月二十六日，天刚亮，敌人岗哨都撤回去睡觉了，围子上的吊桥放了下来，有几个哨兵在桥头站岗。我六名化装成老百姓的战士，见到打进敌人内部的排长吕连元同志，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左手拿着烟，正在桥边悠闲地踱来踱去，知道时机已到，马上推着装满草料的小平车朝桥上走去。快到桥边时，敌人哨兵喊住，喝问是干什么的，这时吕排长马上也大声喊道：“大哥，你上哪里去呀？怎么这样早？”一个战士回答说：“我们是来送草料的，赶早来，回去还有事。”哨兵见来人是排长的熟人，也就不再叫喊。当车一靠近哨兵，战士们突然亮出武器，迅速缴了他的枪，把他连同我们的关系排长一起推到外壕里。六名战士遵照战前布置，一人直奔团部，四人分别扑向驻着敌军的四个炮楼，留下一人守住大门，朝天打出信号弹。一见信号，刘参谋长随即领着埋伏在四周的部队冲进围子，只见敌兵还正在梦中酣睡，枪支弹药都挂在墙上。战士们收缴了武器，才喊醒敌人起来集合，平日威风十足的敌人，这时一个个犹在梦中，糊里糊涂就当了俘虏。

在团部，伪团长黄竹斋搂着小老婆睡得正香，听到外面有响动，知道不妙，伸手在枕头下摸枪，但未等他起身，我们的战士已冲进屋来，一枪就结果了他的狗命，为民除了一大害。

至此，不到一小时，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结束了，我军无一人伤亡。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我们满载着战利品，押着

被俘的敌人回到了解放区。

这次战斗，是在军分区赵健民司令员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先后几次派了二连连长、五连连长和二连指战员来和我们地下党组织联系，侦察了解情况，我们由满九成同志与二连指导员李克同志一起带着敌人的布防情况，向司令部驻地前焦庄②出发。在路上他二人巧妙地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及时赶到军分区司令部，向司令员作了汇报，赵司令员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打阮庄的战略部署和具体作战方案。就这样，一场军民合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打响了，胜利了。

这次战斗是我区较大的一次战斗，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伪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添砖加了瓦，为我区地下工作的开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一九八六年四月

注：①阮庄：系聊城市西北垢垌乡的一个村庄。

②焦庄：系临清市南与冠县交界的一个村庄。

对原堂邑（武训）县 独立团成长战斗的回顾

李镇北

一九四四年四月，国民党顽军吴连杰，奉行其主子蒋介石的命令，和侵聊堂日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我武训（堂邑）县军民进行烧、杀、抢、掠，企图消灭我武训（堂邑）县抗日军民和进步团体。在党的领导下，我八路军冀南七分区多次与伪顽吴连杰的主力部队展开战斗，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消灭敌人近千人，由夏碧波领导的东进支队组成了三十人的精干小分队，以地下党员为内应，以送粮为名打入敌围子，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阮庄（现属聊城市垢堙乡）据点、吴连杰的主力黄竹斋团近四百人。黄团被消灭后，敌人内部引起很大震动。驻守在斗虎屯据点的吴连杰的程子方团惊恐不安，团长程子方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欲起义投诚怕八路军信不过，欲与八路军对抗到底，还怕走黄团的老路。另外，程子方曾奉吴连杰之命投降了驻堂邑的日军，不但没有受到赏识，反而被日军扣压起来，自己在夜间买通看守才逃回来，使他从心里对吴连杰和日军产生了憎恶情绪，行为上对吴连杰也开始表面应付暗中抵制。而吴连杰也觉察到程团靠不住，开始断绝给养和弹药的供给，加上党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武装的压力，程子方开始觉悟，感到只有向我抗日

军民靠拢才是生路。因而，他主动派人找八路军联系，我八路军对程的联络员则亲如友朋，不光管他们吃饭，还给他们换新衣服，并让其向程宣传我党的政策，欢迎他起义回到广大人民的怀抱中来。为了加速程的转化，还让程的一些伤员来我八路军部队养伤，这样一来程和我八路军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了，经过我党努力工作，程子方团于一九四四年六月率全团起义，接受了改编。党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冀南七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立即派我去该团做政治工作。程子方在起义后的第一次全团会议上首先讲了话，他说：“我们起义了，我们不再是吴连杰的军队了。过去，我们跟着吴连杰干了不少坏事，对不起父老乡亲们。今后，我们一定要改邪归正，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八路军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接着，付团长邢先觉（即邢启民）讲了话。最后，我代表冀南七分区讲了话。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广大受苦人的军队了，我们要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当汉奸可耻，当八路军光荣，我们要和全中国人民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土，污辱我民族，凡是有骨气的中国人谁愿当亡国奴？凡是愿跟共产党、八路军抗战者留下，不愿留下的也可回家种地，但再不要跟吴连杰当汉奸了。”

大会结束后，大部分人要求留下，表示坚决抗日，被编为原堂邑县独立团。武训（堂邑）县委书记肖平为独立团政委、我为付政委、程子方为团长、邢先觉为付团长，下设营、连、排、班。

程子方在旧军队有吸毒品（大烟）的恶好，为了进一步

做好程的思想转化工作，有一次我去分区开会回来时，司令员赵健民同志叫我带回两包（半斤）大烟给程，当我把大烟给程时，程很惊讶：“共产党不是大叫吸毒品吗？政委你这是……。”我笑哈哈地说：“赵司令员知你有吸大烟的习惯，怕你一下戒了受不了，所以，叫我给你带来两包，不求你一下戒了，慢慢来，以便减少你的痛苦。半年的时间，逐步把大烟戒了就行了。”当程听到这些话时，感动的流下眼泪，说：“党真想到俺心里去了，俺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你一定要替我感谢赵司令员。”

一个多月后，程向我请假说：“我请假回家把烟戒了，赵司令员为减少我的痛苦叫我半年戒了，我为什么非半年才能戒呢？我就那么没有骨气吗？”我说：“给你两个月的假，在家好好养病，这里的事有我和邢付团长就行了，你不要担心。”我又让管理员买了肉、蛋等食品，让程带回了家。十多天的时间，程从家回来了。我问他：“怎么这几天就回来啦？”程说：“我很想和你在一起，把烟戒了就回来啦。”

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程子方和我谈话时，很难为情的说：“李政委，有句话我想了几个月了，一直没敢和你说。”我说：“咱们是同志关系，有什么话怎么还不敢和我说啊？”程声音颤抖地说：“我…我…我打心里感激共产党，我能不能加入党组织？”我高兴地说：“好啊！共产党欢迎你啊，加入党组织就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经受住党的考验，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变节。”事后，我向军分区赵健民司令员汇报了这一情况。

一九四四年九月，伪顽吴连杰的侄子吴丙桂要和独立团谈判，并提出不让我参加。我推测他们不怀好意，可能是让

程回去之事。这时我便加紧了对程的教育，并有意识的问程：“你考虑吴丙桂这次要和你谈些什么呢？”程说：“可能是让我回去之事。”我接着问：“那你有什么打算呢？”程说：“如果真是让我回去之事，我一定顶回去。”我说：“说的好，这次谈判怕是此事，要坚决顶回去，这是党对你考验的最关键的时刻。”并告诉程对吴丙桂说，党的政策很宽大，让他也过来。我又接着说：“程团长，这次谈判要防止他们找事，去时要有准备，带上一个连，几挺机枪，如能谈成就谈，谈不成就把他们消灭掉。”经过周密安排，由共产党员、连长路风武、共产党员任同云、胡大才等人去参加了谈判。

果不出所料，谈判是让程回去之事，程用严词驳斥了吴的无理要求，话不投机，程吴翻了脸，敌人看到我兵力强于他们，没敢动就散了，回来后，我表扬了程的作法并鼓励他要继续为人民多做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由赵健民、于笑虹同志介绍，破格吸收程子方为中共党员。而后，经过近一年的政治工作，在中、下层干部、战士中又发展了十五名党员。

独立团在与日伪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至一九四六年年底发展到五个连六百余人，各区小队千余人，在鲁西北地区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至一九四七年升级为正规军，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在鲁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贡献。

一、冯庙村胜利突围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或二十九日），聊城、临清、

博平、莘县、冠县等地日伪军一万五千余人，步兵在骑兵、炮兵的配合下扫荡垢垆一带地区，当时独立团正在冯庙（现属垢垆乡）宿营，午夜，村东突然枪声大作，我和团长程子方、付团长邢启民立即集合起部队向西北突围。当部队赶到垢垆镇时，垢垆北方又响起了枪声，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为避免同敌人正面冲突，部队继续向西急进，走到路堂村时，侦察员和纷纷逃离的群众说：“西面已有几千日伪军包围上来，形势十分紧张。我马上召开团干部会议、团长程子方提出部队向西北方向硬突出去，如果打散了可到敌后某村集合，我沉着的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南面的敌人还没有赶上来，现在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有可能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穿过去。再说，正南的吴连杰匪军也一定发动了，其老巢吴家海子的兵力必然空虚，吴连杰匪军的战斗力也比较差，我们可以从吴家海子附近穿过去，如碰见小股敌人，可以干他一下，如碰见大批敌人再待机而动，我这么一分析，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部队于是调头向南沿小路朝吴家海子方向开进，黎明时分，部队走到吴家海子村西，突然正面窜出一股敌人，他们抢先占领了一条河沟的有利地形，同时伸出了枪口，团长程子方立即命令部队准备战斗，我也立即从敌人的杂乱行动中分析出这是吴连杰的小股匪军，大约有五、六十人，他们早已被英雄的八路军东进支队打的闻风丧胆，他们这种习性早被我掌握，因此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成四路纵队整装前进。这一小股敌人以为迂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了呢，吓得一个个把脑袋缩到沟底下，连看也不敢正眼看一下，一枪也没有敢放。我独立团就这样大摇大摆的从敌人眼前开过去，部队过去好久，这一股

敌人才爬起来向北走去，独立团越过这股匪兵不久，南方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就是命令，部队于是向战场急驰，当部队赶到杨林村附近时，枪炮声已由稀疏到停下来。这时我命令部队在一河沟旁隐蔽下来，并派出侦察员侦察情况，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侦察员带着一支三十多人的小部队回来。一了解，才知道刚才那阵激烈的枪炮声是夏碧波领导的东进支队冲出敌人包围圈的激战，他们是一个没有冲出去的小分队，当时两千多日伪军又封锁了突破口。两支部队汇合后，立即在河沟的麻子棵、小树丛旁隐蔽，准备战斗。直至中午时分，两千多日伪军才稀哩哗啦的沿大道向北走去，我独立团就这样一枪未放，毫无伤亡的冲出敌人包围圈。

二、逼降宋凤歧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准备全歼顽匪吴连杰，对吴家海子进行了重兵包围。我独立团的任务是围歼吴家海子之南三里邓庄据点，该据点驻有吴连杰的宋风歧团，这个团约有一百多人枪，修有炮楼和土围子，并配有一挺机枪。由于匪团长宋风歧和付团长陈英平日敲诈勒索，无恶不做，老百姓早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当我团将其包围后，宋、陈二人误认为我军无大炮，拿不下吴家海子炮楼，他们不会失掉吴连杰这个靠山，便拒不受降。我团为减少伤亡，使村民少受损失，决定敦促其投降。当即展开政治攻势，一方面喊话让其投降，另一方面我提出要与匪团长宋风歧谈判，宋派团付陈英出面谈判，我和程团长在邓庄村东小屋里和匪团付陈英谈判。一见面，

我即严厉地指出宋、陈二人追随吴连杰的罪行。指明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也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匪团付陈英却狡猾的说：“你们攻下吴家海子，我们就起义，你们攻不下吴家海子，我们就不起义。”我随之警告他说：“你们在我们攻下吴家海子前投降，就算你们起义，在我们攻下吴家海子后，你们就只有无条件投降了，要受到人民的惩罚。”陈英的态度软下来，表示自己当不了家，要回去和宋商量一下，陈英溜回去后，就再没动静。第二天吴家海子的炮楼飞上天，我军攻克了吴家海子。可宋、陈二人仍不相信吴家海子会被我军攻克，我又大声喊话要宋陈投降。在土围子后面的陈英却要我走出阵地，到一段开阔地上与他谈判。我当即揭穿其阴谋，命令部队进攻。正在这时，在吴家海子活捉的吴连杰的一个贴身马弁被押到邓庄。我命令这个马弁到前沿去喊话，宋陈二人见大势已去，独立难支，便挂出了白旗，开门投降，我独立团顺利的拿下了邓庄据点。缴获敌步枪一百余支，机枪一挺，其它军需物资一部。

三、巧取梁水镇

一九四三年夏，盘踞在梁水镇的罗兆荣的伪杂军，抓丁派伙，修筑了高大的土围子和又宽又深的护城沟，并设有吊桥关卡，盘查行人，围墙上还修了十余座炮楼，使梁水镇成为聊城西北最大的伪据点。一九四四年秋，我军拔除吴连杰的老巢后，也威慑了梁水镇的敌人。武训县委根据梁水镇据点易守难攻的特点，决定采取里应外合智取的策略。经过我党的秘密工作，在敌内部发展了付中队长郎树林、上士文书曾广德两名党员，郎与中队长罗登殿是老乡，常在一起喝

酒，郎树林和曾广德常旁敲侧击地做罗登殿的工作。罗与郎树林有一次一块喝酒时，郎故意对罗表示，为下一步出路表示担忧，罗登殿说：“从他们攻下吴家海子的情况来看，是来了真八路，要是真八路来了，咱们就投降，土八路（指县大队）来了，咱们就不听他那一套。”我党摸清了罗的思想和大部分士兵不愿再当伪军的思想，决定迫使罗登殿起义。某天晚上，我独立团住在梁水镇南的一个村庄，当我查哨到村北时，岗哨正在盘查一个穿便衣的人，我一了解这人正是梁水镇据点里的地下党员郎树林同志，他正是来找县大队汇报情况，我们两人一起回到村里，和程团长、邢付团长研究了情况，制定了巧取计划。决定让郎树林赶快回去按计行事。郎树林回去后，我独立团也马上赶到梁水镇围子外面，开始喊话，让罗登殿出来谈判。不久罗登殿在郎树林的陪同下，从土围子里出来，见了我和程团长后，才知道是县大队，但罗已处于县大队的人中间，他不知所措。郎树林在一旁积极劝说，我对其讲明党的政策和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罗在当时环境压力下勉强同意起义，为了防止罗进围子后变卦，我带领警卫排和几个警卫员随罗进了围子门，按事先计划，由郎树林下令换岗，由独立团的警卫排接替，边往里进，边接岗哨，就这样一直接到罗的指挥部。进了指挥部，我命令郎树林集合部队，由后进来的县大队收缴了枪支，宣布起义。我讲话后，马上进行了整编。道口铺据点还驻有罗登殿的一个小队，我叫罗派人去调道口铺的那个小队来参加整编，由于派人不当，罗虽派了人，但连派的人和那个小队都没有回来。整编后，共八十余人枪，编为独立团的第三连，对罗按起义对待，罗任连长，郎树林任付连长，原上士文书曾广德任指

导员。

四、解放聊古庙

聊古庙位于聊城西北二十里，该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一百二十余人），伪警察所、乡公所等伪办事机构。

独立团智取梁水镇后，我地下党组织在聊古庙据点内部发展了五六个党员，并掌握了大部份伪军势力。县委指示，这个据点离聊城太近，就是我军拔除该据点后，敌人还会派兵驻扎，故决定暂不拔除较为有利。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们得到敌人内部一个消息，把聊古庙伪军中队调到城东南，另调一个中队来聊古庙。因此，据点内的地下党员很着急。据点内的李少卿（党员）同志立即找到区委的吴星和苏毅，区委也感到情况重要，立即叫李少卿去武训县委汇报，县委根据情况的变化，又决定立即拔掉这个钉子。

一九四五年元月六日晚，我独立团团长程子方率三个连和一个区小队到达该据点南面，与据点内的李少卿、阎学旺等约定，以吸烟的火光为号联合行动，接应独立团入据点。但由于那天月光太亮，双方都看不到火光。据点内的李少卿同志心急如焚，便叫人把他从围墙上卸下来，找到了部队。部队要李少卿搞出些子弹来，李少卿又爬回围子送出些子弹，区队给了少卿一把匣枪。他回去后，马上把寨门打开，阎学旺的一个小队守住大门，我独立团顺利地进入围子里，这时伪军正在睡觉，我们一声令下，敌人还闹不清怎么回事就被缴了枪。伪区乡长也当即被俘，因为他们曾与我们有联系，是统战人物，就释放了。唯有警察所住在楼上，居高临

下，不愿交枪，并口出狂言要向我们交“子弹头”，按照我们尽量不打枪的原则，决定烧楼。刚要点火，伪警察就慌的高喊，愿意投降，并把枪用绳子捆好卸下来。不到两小时，我军一枪未发，一人未伤的获得全胜，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俘虏伪军一个中队。经过整编，这个中队编为独立团的第四连，任命阎学旺为连长，李少卿为指导员。

五、活捉日本兵

一九四五年七月，冀鲁豫七分区二十二团，马颊河支队和几个县大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打响了解放堂邑的战斗。我独立团的任务是阻击聊城的日伪军增援堂邑，五个连六百余人的兵力配置在从道口铺东到铁庄一段的聊堂公路一侧。待堂邑战斗打响后，驻聊日伪军司令赵振华果然派二百余人乘汽车增援堂邑。当乘车的日伪军进入道口铺东侧我独立团伏击圈时，我独立团给予了迎头痛击，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日伪军慌忙跳下汽车进行还击，在汽车上的日伪军头目见事不妙，命令汽车调转头往回逃，没有爬上汽车的几十名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有两名日本兵拖着一挺机枪向铁庄方向逃去，在我团战士的追击下，跑到铁庄的一个芦苇塘里想隐藏下来，可早已被追击中的四连战士发现，两个日本鬼子想跑已来不及了，两条腿全陷在泥里，当即被活捉。我独立团这一仗有力的支援了解放堂邑的战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还有一挺日本歪把机枪，战马一匹，自行车一辆。两个日本兵交到了分区司令部。

我独立团还在外县进行了多次战斗。如在临清石拱消灭

了顽军肖健九的一个小队，缴获步枪二十余支，在清平旧城消灭罗兆荣的一个小队四十余人，在冠县邓庄巧取吴连杰步枪二百余支。在战斗中，我独立团发展到五个连，并有骑兵班、炮兵班（迫击炮）、警卫排等六百余人。一九四五年九月升级为陈再道领导的二纵六旅十六团，一九四六年一月参加了围攻聊城战斗，一九四七年六月随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区，投入到全国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解占伯和他一家

吴星

解占伯同志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他二哥解彭年（原名解树椿、曾用名解鲁民）系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师范大学由李续纲介绍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七月在北平转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北平为庆祝十月革命被捕，十二月出狱，三〇年三月恢复关系。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因捣毁中央日报社，在南京被捕，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四月恢复关系。在抗日战争初期，他的侄子解长林、解长泰、解长义、解长厚（岳侠）和侄女解秀兰都参加了革命工作，都是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敌人对占伯同志和他的家曾多次进行摧残和破坏。一九三九年他二叔解前生（全家的家长）被汉奸齐子修匪部抓去，全家被抄。同年冬，全家逃到我观朝一带根据地生活，在流亡中，占伯同志之子解长明仅十多岁，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活动（当小医兵），还有长明的几个叔兄弟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彭年、长林、长泰都是省军级干部。一九四一年占伯同志全家房屋被齐子修匪部扒掉。

一九三八年秋，占伯同志回到他的家乡凤凰集，住在他那时三十多口人都同居的大家里从事革命活动，在地方上发展党、团，建立党、团组织。当时有我军巴洲支队的老孙、老谭同志，都穿着军服，带着八路军臂章，常在占伯同志家吃住，在聊堂一带发动青年参军抗日。

占伯同志吃住在家里，不停的走村串户，教育激发青年的抗日热情。在凤凰集、张舒庄、乔庄、任堤口、丰马庄、刁庄等村发展党团员，仅在一九三八年内由他发展的党员就有三十多名。柳洪源、苏毅和我等人，都是在他亲手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还给战前入党失掉关系的任明同志接上了关系。一九三八年冬，占伯同志亲自领导建立了聊堂边抗日救国青年团组织。一九三九年初又领导建起中共聊堂的工委，书记柳洪源，组织部长刘洁，宣传部长念方之（念涛），民运部长张矩。（一九四〇年二月转称聊堂边县委）当时，占伯同志是鲁西地委民运部长职务。

占伯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帮助聊堂边工委建起一支武装——聊堂边抗日大队，任明同志任队长，张矩同志任教导员。占伯同志还请巴洲支队的老孙，老谭同志要来三十多支枪。活动在博平一带的五大队所用枪支，也是路经凤凰集占伯同志转运的。占伯同志不断在地方上发动青年参军，他对参军青年进行革命救亡教育，招待吃饭，拿路费，如辛王庄王之达同志去十支队机枪营参军，到占伯同志家时，占伯同志向之达同志讲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叫家里人给之达同志做饭吃，还从自己腰包里掏五角钱给之达同志，并说钱不多，路上吃顿饭吧。

占伯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冬，亲自领导建立起聊堂边抗日县政府，县长朱月松，秘书郎镜如。并相继帮助建起了二区区政权，区长李善亭。

占伯同志在建党、建军、建政过程中，多次在他家南园子召集会议。占伯同志说，请同志们到我家来开会，没有别的就是吃饭好解决些，我家是大锅大笼做饭，开三十来人的

会议，吃饭没问题，每次会议，都是占伯同志家里先给开会的做一大锅，挑两大篮子窝窝头，两大盆菜，挑两大桶汤送到南园子里给同志们吃。然后再做一锅全家吃，占伯同志和他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支持革命力量的发展、建设，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占伯同志的工作作风非常艰苦，对问题考虑的很细，对工作抓的很紧，一九三八年冬他步行二百多里去南宫参加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开会回来，没有休息，便接着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南宫会议精神。一九三九年春，占伯同志耳闻博平西部一带有些情况变化，派我和舒刚同志去贾寨与贾靖武同志联系。同年秋青纱帐时，十支队机枪营到聊城西北部来活动，住郑家营，占伯同志得知后，派我持他的信去找陈营长，谢教导员（白连成），告诉我一定要把信交到陈、谢本人手里，因陈、谢初次来这里活动，他们的警惕性一定很高，果然不出占伯同志预料，我到郑家营村时找不到机枪营的踪影，经访问群众，知他们带部队刚刚离开村子，我顺着马蹄子印在青纱帐里找到部队，哨兵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来找陈营长哩，接着又过来三名战士监视着我，一名战士去营部汇报，不一会有两名战士带我去营部，见陈、谢坐在马搭上谈话，没等他俩问我，我唤一声陈营长，谢教导员，我来给你送信哩，陈、谢带出惊奇的面色说，营长，教导员都不在，我笑着说，占伯同志怕我把信交不你俩手里。把你俩的身材容貌都对我说过了，我把信交给他们，他俩让坐下谈，信的内容是，趁齐子修匪军大部在河南，把齐匪留在梁水镇附近的单航洪部消灭掉。陈、谢对我说，我们刚到这里，对一些情况还不了解，距聊城城只有二十里

路，刚才过去几辆满载鬼子兵的汽车，我们转到地里来的，我们孤军插到敌人的中心地带，而齐匪部在这一带扎根数年，单匪部虽只有九百人，他们与地方上的顽匪江开岷等部都有联系，根据情况，我们现在不能去打单航洪。陈谢叫我把他们说的汇报给占伯同志。我向占伯同志汇报后，占伯同志说，陈、谢同志对工作负责，暂时不能打，再等机会吧。时隔不久，在旧历的八月初，齐子修匪部都从黄河南撤撤到梁水镇一带来，齐匪司令部驻杏胡刘村。这时，占伯同志趁齐匪立足未稳，请求上级调部队来消灭齐匪，派我搞侦察，并叫我再找一个助手，我找的党员王之达同志的哥哥王永顺。占伯同志给我们五元钱，叫我们买点月饼等礼物带着送节礼。我和永顺八月十五到达齐匪部内部，通过亲戚和老乡关系，掌握起齐匪部的司令部、部、齐、单团部驻地、人、枪、地形等情况，按时完成全部侦察任务后，于旧历八月十五日回到我家，鞠和永顺同志吃过午饭，占伯同志的大哥冒雨来我家，交给我一封信，信上说，到傍晚时，大哥领你们到我住的地方见面。刚天黑后，我们三人到舒庄西头一家（后来知道是占伯同志的亲家）见了面，向占伯同志汇报了侦察的情况后，占伯同志很高兴的说：“我们的部队过来了，马上就行动。”叫王永顺同志作向导，叫我回去隐蔽，旧历八月十五日夜对齐匪展开了猛击，消灭齐匪大部，正在攻打齐匪司令部的巷战时天亮，我军侦察汇报聊、临、博、堂日伪军出动，我军撤退。此后，齐匪更取得国民党头子王金祥的信任、支持，与日寇加紧联系，齐匪在日军驻扎的城内设联络办事处，将各部的反动势力都收编齐匪部内，残暴横行在聊、堂、博、茌、高、清等数县达五年之久。齐子修，王

金祥的罪恶滔天。

占伯同志和他一家的革命活动名声很大，日寇、、齐匪对占伯同志的家抓人、拷抄，拆房屋，镇压。日寇血洗凤凰集，一次被杀死杀伤十五人之多，同占伯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谢德元（白连城）、任明、王善亭、柳洪源、任汝舟、刘吉、念方之（念涛）等同志的家被抄，人被抓，房屋被扒，占伯同志一家流亡达七年之久，到四七年初才归家重建家园。

在一九四〇年秋鲁西区党委第二次扩大会上，我和占伯同志见面分别，不料成了永别，他在运东地委任民运部长兼在平县长的一九四一年于战斗中牺牲，占伯同志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好领导，对他的牺牲我非常悲痛，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心中，他的光辉事迹将与世长存。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缅怀革命烈士林梦白同志

袁寿宸

林梦白烈士，山东省博平县（现为茌平县）袁家楼人。一八八九年生在一个赤贫的家庭里。早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五月被任命为鲁西县委书记，是鲁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兼任袁家楼党支部付书记，后又任支部书记。一九四〇年到地委任交通员，后又到专署武工队。一九四三年调博平县委情报站。一九四四年在粉碎日寇扫荡时，牺牲于清平县大张庄，至今已四十一年了。梦白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激励着人们为烈士们的未竟事业奋斗不息。

入党于革命低潮时

梦白同志入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那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施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梦白同志就在这种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毅然决然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和梦白同志两家相距百米左右，他家是我们村里最穷最穷的赤贫户之一，他处于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早就

有了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的强烈愿望。这种革命的要求，是他果断地加入共产党的先天条件。同时，他也早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当时，我在山东省博平县城里蚕业学校读书，“五四”的消息传到博平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集会声援北平的学生，支持北平学生的革命行动。于是在六月份成立了二十人团，具体进行声援大会的筹备，当时成员有县商会会长张士伦，驻军代表马营长，博平高级小学的学生代表李仲义等。我是蚕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当时在城里念书是由家里送粮食去。正要开大会并示威游行的那天，林梦白同志进城了，并且给我捎去了粮食。我告诉他马上要开大会声援北平的学生，你去找学校的工友谈谈并和他一起去参加大会。经过工友们的谈话和参加大会，梦白同志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会后我又比较全面的向他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起因和情况。这对梦白同志和我来说都受到了一次革命的启蒙教育，也是给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受命于困难时期

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精神传到鲁西后，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鲁西县委组织领导了阳谷县的“坡里暴动”，梦白同志直接参加了这次农民暴动，并在谈判桌上和敌人面对面的进行斗争。但这次暴动终因寡不敌众归于失败。

坡里暴动失败后，我们党的组织暴露了，省委将县委书记张干民调走，指定赵以政同志代理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

五月，马守愚同志带着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到达聊城，并在聊城城西北凤凰集村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到会代表约十人，会上马守愚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宣布了改组后的县委成员名单，林梦白同志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当时我们党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我记得县委成立后连一次全委会也没开成。第一次县委会到会的有林梦白、袁平之、郭庆江和我。会后根据县委分工，郭庆江同志到济南向省委汇报，我到莘县、聊城、阳谷等县去和县委委员孙大安、宋占一，还有其他党员取得联系，并向他们传达凤凰集会议精神和县委第一次会议精神。我虽到处奔波，但毫无结果，因为当时地主豪绅、军阀武装、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气焰极为嚣张，环境十分恶劣，多数党员都生方设法隐蔽起来。当时县委所能直接领导的仅仅是以博平县袁家楼村为中心的十多名党员。梦白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任县委书记工作的。

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觉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积极主动地开展党的工作。

郭庆江同志去济南后一直没回来，而且也没来信，大家非常挂念他，况且得不到省委的指示，工作不好开展，因此，梦白同志确定叫我到济南去一趟，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我到济南后找到了联络站，对上了联络暗号取得了联系，我全面的汇报了情况后，得到的指示是：“回去后由林梦白和两个县委委员先干着，今后党的活动一定要采取秘密方式，防止敌人破坏。”并告诉我郭庆江在这里有工作，暂时不能回去。我返回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一九二八年郭庆江被捕出狱后离开山东逃往东北，

六名县委委员有两名没联系上，郭庆江出走又少了一名，县委的组织很不健全。另外，就是常时间没得到省委的指示，工作感到困难，因此，县委决定叫我再去济南，这是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的事，上次到济南没联系上，这次下定决心，生方设法也要取得联系。到联络站一看门上还是贴着封条，我便在街上转来转去想碰巧遇上我所见过的省委的同志。巧的很，我碰到了我第一次来济南时所我汇报的赵同志。我万分激动的跑上前去拉住了他，我对他说：“郭庆江、袁果被捕了，我们曾派人来过，但没找到省委。”赵同志告诉我：“省委的其他同志都走了，我也马上就要上火车，你不要跟着我，这样危险。”我立即感到问题严重，省委可能遭到破坏。但我还是边跟着他走边向他请示工作。他告诉我：“还是和上次给你讲的那样，一定要注意秘密活动，不要暴露组织，防止敌人破坏。回去后你们县委的三个人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联系研究工作。”以后，县委又多次派人去济南，但始终未找到省委，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县委并未因敌人的凶残而被吓倒，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沉，更没因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瘫痪，恰恰相反，我们县委高举着的革命大旗始终飘扬在鲁西平原。我们自觉地贯彻省委的指示，积极主动地开展党的工作。

梦白同志曾多次主持县委开会，结合当时形势，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山东省委的指示，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五条决定：（一）认真贯彻秘密原则，对党员要单线联系，不再发生横的关系；（二）不进行集体活动，不召开党员集体会议，有事县委分工个别向党员传达；（三）发展党、团员要采取慎重的方针，并个别吸收；（四）要继续

寻找失去联系的党员；（五）要开展农民协会的工作，扩大革命力量。

根据县委的决定，按照分工，在博平、堂邑等县首先展开了党的发展工作，在博平县的尹刘谢庄发展了贫农谢尚庆入党，发展了博平的袁绍之、林梦河、林梦祥、袁本固和堂邑的李朋飞等十几名会员，尔后又吸收他们入了党。一九三三年听说杨一斋从东北返回，并在阳谷县七级镇当了教员，梦白同志叫我马上前往，我找到杨后给他谈了话，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秋，袁家楼的村长去乡政府当了乡长，有人提议让我当村长。因我是党员，又是县委委员，不能擅自作主，马上给梦白同志作了汇报。梦白同志立即开会进行研究，认为当村长有好处，可以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运用村长的合法身份，替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维护穷人的利益，团结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县委同时提出要廉洁奉公，节俭办事，减轻群众负担。我当了村长以后，坚决按照县委的指示去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我们村曾实行过“公平负担”。当时群众的负担是相当重的，除“完银子”以外，一年到头出不完花销，穷苦人家，在庄稼收回家也很快吃光啦，可是还摊花销，被逼得走头无路，就是一般的中农也压的喘不过气来。我听了群众的要求，经过梦白同志同意，事先进行了活动，在区长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按土地多少拿花销的办法，地多的要多拿，地少的少拿，真正没有的当然就不拿。这个办法引起了地富的不满，但绝大多数中农、贫农，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说：“这下可好了，有给咱说话、办事的村长了。”由此可见梦白同志这个决定

下的是对的。

壮大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梦白同志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以便紧跟形势开展工作。

一九三六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梦白同志及时召开了县委会议研究决定：①恢复党员的集体组织生活；②为加强支部领导，梦白同志主动提出兼任党支部书记；③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在农会会员中积极发展新党员；④积极开展扩大农民协会的活动，大量发展新会员；⑤为了迅速发展革命力量，县委委员以及支部和党员都分片包干，广泛开展活动。林梦白同志到博平城南一带，袁平之在袁家楼、孟庄一带，林梦河去杨家集一带，我除负责袁家楼的工作外，还分去博平城西徐官屯、大何庄、桑庄、八里庄一带。其他党员也都分配了任务。大家按照分工积极开展工作，作出了明显的成绩。梦白同志根据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形势，及时召开会议，作出了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积极开展公开的革命活动，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决定。并决议：①把党、团员和会员都动员和组织起来；②分工多路出发，广泛发展农民协会，从会员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团员，壮大革命队伍。增加一人和林梦白同志去博平城南，我与袁栋去城西，袁平之、袁绍之、袁本固等在袁家楼及附近村庄，袁敦颐按染布串乡的路线和当地原有的会员共同开展活动，谢凤和等同志在博平城北开展活动，林梦河、林梦海和杨家集的农会会员在

聊、在两县边境以杨家集为中心，向附近的村庄孟家营、蒋官屯、南张庄等村活动。薛河、梦海同志首先在杨家集发展了赵春华、赵春湖、翟修安为党员，并建立了以赵春华为书记，其他二人为委员的党支部。在南张庄和孟家营也发展了党员。同时，还在几十个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其他地方的农民协会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鲁西县委范围内，党、团员由过去的不到二十名，发展到近五十名，由一个党支部发展成三个党支部。由于革命活动的积极开展，博平县委与鲁西县委于一九三七年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七年底，徐运北同志到博平检查工作，肯定了鲁西县委的成绩，并指示今后在博平县委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至此，鲁西县委光荣的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斗争极端激烈复杂的岁月里，我和梦白同志携手战斗整整十年，他的可贵之处是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依靠党组织，依靠集体的智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这是鲁西县委这个党组织能够保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发挥了她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关键所在。

梦白同志牺牲四十多年了，我们活着的人们，对烈士最好的纪念就是在党的十二大路线的指引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事业奋斗不息，为先烈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增砖添瓦！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杭州市

日寇侵华八年筑先县所受损失

粮 食 损 失	原产量	原有地亩数		315030
		每亩平均产量		200
	减 产 量	被敌侵占损毁 土地	亩数	856
			减收	856000
		荒芜土地	亩数	50501
			减收	50501000
	劳力肥料及天灾产量			131800000
	被敌烧毁、抢夺粮数			1995000
	强征粮数			131920200
	共计	损失粮数		317111200
折价		31711120000		
牲 口 损 失	战前次数			10000
	战争损失	头数	3000	
		折价	600000000	
	现有头数			6500
	为恢复生产急 需牲口	头数	4000	
折价		800000000		
主 要	大车	原有数	2985	
		损失数	698	
	小车	原有数		
		损失数	1580	
		现有数	5410	

工 具 损 失	犁 耙 耨	原 有 数	15700
		损 失 数	5760
		现 有 数	9940
	共 损 失	件 数	8038
		折 价	356200000
	急需补充	件 数	8038
折 价		356200000	
房 屋 损 失	原有间数		129002
	战争损失	间 数	25800
		折 价	774000000
	现有间数		105000
	急需修补	间 数	25000
		折 价	750000000
共计折价			33441320000

说 明:

1、粮食斤数按小米计算。

2、折价均按目前本区价折成（鲁钞一元，兑法币十元），大车每辆折法币三十万元，小车犁耙等每件折法币十二万元，房子每间折三万元，米每斤折法币一百元、牲口每头折法币二十万元。

冀鲁豫区委 一九四五年五月成文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抄自冀鲁豫党史办

解 放 聊 城

康 雷

一九四七年元旦，旭日刚吐红光的时候，鲁西北重镇聊城解放了。

聊城旧为东昌府治，砖城四丈二尺高，周围十至八十公尺不等的护城河。日寇投降后，勾结日寇害死抗日老人范筑先的王金祥却被蒋介石委为第五作战区司令兼山东第六专署专员，招纳鲁西北群奸乱魔，盘踞该城，既成为，进攻我解放区的跳板。蒋介石竟假借调处及救济名义，百般接济，最后也空运弹药粮食，满认为八路军对此“金城汤池”无可奈何、殊不知、自其发动内战以来，已把许多美国坦克、重炮等近代武器送给八路军，使我们在攻坚战中更增加了便利。当攻城开始的第二天，一位到聊城东关火线上劳军的老先生，望着聊城东门上的弹痕说：“中啦！这会打开定了！打开城咱把好武器给汉奸们亮亮！”

摧毁六百年古砖和三合土的城墙及其强固复杂工事，我们的重武器起了作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八路军战士勇敢与指挥员的英明机智的指挥艺术所决定的。攻击之前，我×部一个排架桥时，另一个无架桥任务的排长王瑞轩也跑到城河边，观察架桥动作，学习经验。当第一次架桥未成，王排长已看出了门道，便同一排战斗互助组长丁洪章等，用木棍制成桥模型，经过几次演习改正之后，便向营长提出五人

保证完成架桥任务，另一战士偷偷地在夜里爬十米宽的冰河，横到城角下，一面查明对岸的地形和河宽，顺便还用牙咬断了两个拉雷索子，抱回一个三十多斤重的地雷来。

我军的攻势步步逼紧，蒋机的爆炸扫射，烧夷弹放火……等都不能解救瓮中之鳖。济南王跃武派出一一一师和警备旅增援，在茌平以南遭我有力的阻击仅我×部房兆山班参加战斗的十个人，在肉搏中就刺杀了十六名蒋军，俘敌三名，缴日本三八式轻机枪四挺、加拿大冲锋枪两支、步枪六支、射杀、炸毙的尚不在内。

伪军士兵，夜晚不断坠城逃亡或投诚我军。打援战斗中蒋军一一一师三三三团的四连战士丁志忠，原系我×解放区农民，枪一响就跑来，并把连长的传令兵也带来了。他高兴地说：“抓我来打八路军，叫他抓吧，看是谁沾便宜了”。

聊城解放了，我主力部队还在猛追向东败窜的援军。

（原载《冀豫日报》1947年1月5日第一版）

解放聊城战果

八路军于元旦解放聊城所获战果如下：毙俘伪军王金祥部三百余名，十二军一一一师及警备旅四百余名，缴获造枪机两部，汽车十一辆，电台三部，步马枪一千五百余支，机枪四挺，小钢炮两门。

（原载《大众日报》1947年1月18日第一版）

解放聊城我军公祭

范筑先将军

解放聊城之八路军全体军政干部，于二日隆重公祭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公祭在城内范将军墓前举行，由八路军代表张霖之、冀鲁豫二专区专员谢鑫鹤主祭。以下与祭者为当年追随范筑先老将军抗日的青年。范筑先将军原任国民党山东省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将军组织十万人的武装与八路军合作抗日，深为蒋介石嫉视，勒令该部王逆金祥（当时任范老将军参谋长）投敌，致聊城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为日寇攻陷，范老将军遂在蒋日伪阴谋串通下光荣殉职。

（原载《大众日报》1947年1月12日第二版）

我命令入聊全军保存聊城固有文化

此次八路军在解放聊城前，某部政治机关为保存该城固有文化，特命令全军于入城后执行下面三事：

- 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致敬礼。
- 二、保护中国三大书库之一的海源图书馆。
- 三、妥为保护中国的史学家付斯年先生在北街的住宅。

按聊城为古东昌府治，民国二十七年汉奸王金祥勾结日寇进攻聊城，民族英雄范筑先及山东名教育家张郁光先生均与城俱亡，当地人民为纪念此抗日老人乃将聊城县改为筑先县。

（原载《冀南日报》1947年1月6日）

筑先参运结束三千五百青年入伍 参军结合复查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洪光、刘静轩、舒新启、张考武、徐俊杰、

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四日，一个月的时间，筑先的参军运动结束了。全县报名者六千七百三十人，精简后送部队者三千五百人。临入伍时各个新战士表示：“不打倒蒋介石，坚决不回家！”

筑先所以掀起如此大规模的参军运动，领导上认为主要是：经过土改后，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和生命，必须参军打倒蒋介石。其次，是执行了区党委的新精神，大胆的放手给农民，形成群众自己酝酿、讨论、参军，除以上主要或基本原因之外，在筑先还有以下突出的经验。

（一）领导上善于掌握先进人，先进村，控制落后村、落后人。各区开始，在农民大会上较沉默，此时，领导上只要沉住气，好好启发，随时注意先进人、先进村的出现，予以表扬，并逐步展开竞赛，以先进的带一般的。在先进带一般较普遍程度时，即组织力量打落后村，对落后村干，积极分子，则实行控制。落后村打开了，则奠定与巩固了先进村的信心。

（二）、参军结合复查，村里的石头，趁机破坏参军，即坚决的搬掉，继续进行查财、拥军。所以坏分子不敢破

坏。农民的经济、政治可继续解决、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所以，一方面能完成参军任务，另一方面土改继续深入一步，未因参军而停顿了土改复查，且复查保证了参军任务的完成。

（原载《冀鲁豫日报》1947年5月29日第一版）

武训百余干部带头 千余群众踊跃参军

旭 涛

全县参军运动，在大轰大干太规模领导方式下，普遍召开了扩大村干积极分子会，贯彻了走群众路线的精神。有的区大胆向群众放了手，将任务交给群众；更由于全县参动大会上百多名干部带头和全县干部同志日以继夜的努力，现八、一、九、五、六、七、四区村干会开的都很成功。并涌现了大批优秀各级群众领袖挺身带头参军。仅据本月十八日统计：八区三百四十七名，一区二百一十名，九区一百零五名，五区一百零三名，送郎送子的四十名，六区一百三十九人，送郎送子者二十八人，七区一百一十一名，四区四十八名，总计一千一百一十二名。奠定了全县超过任务的巩固基础。剩下除八、九两区村干大会，正式结束召开农民大会外，一、五、四、六、七、五个村干大会，仍热烈进行中，更大的胜利还在后面。

（原载《冀南日报》1947年11月26日第二版）

武训县政权干部全力参加群众运动

一区五十六名伪军伪员悔过

苗 野

本县自明确全力支持农民翻身运动后，政权部门就明确县区干部参加群运，而不仅是扶持群运，除各区干部全力发动群众外，县长，科长亲自带领科员下了乡。司法工作确定以处理群众运动中的案件为主，与多数群众有关的并以案件群众公审方式进行判决，已处理不少问题。在工作指导上，确定各区工作经验及时传播，现已通令二次。政权干部参加群运，对群众的情绪鼓舞很大，政权干部在那里，群众就敢大胆诉苦，认为有政府给他们撑腰，七区干部参加大王庄屯的斗争，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又息，兰臣报道：一区在政府支持下组织了人民法庭公审大汉奸黄洪忠，苦主控诉该汉奸罪行后，政府应千余群众要求，当即处决，并声明：“坚决保护农民利益，支持农民翻身；严惩的是罪太恶极的汉奸，一般失足分子，只要向群众坦白悔过，政府则宽大处理”。之后，当有董广庆等五十六名伪军伪员，相继向群众坦白错误，要求恢复公民资格。并纷纷宣誓：“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决心痛改前非，努力生产，当好公民，甘受政府依法判裁。”当场得到群众同意，都说：“只要你们改为好人，我们决不另眼看待。”

（原载《冀鲁豫日报》1946年9月1日第二版）

转变作风走群众路线

——贾庄小区打开消沉局面 掀开联合斗争农会发展一倍

化南

武训县八区贾庄小区，共十四个村，农会九处，有的光会长起作用，有的根本不活动，特别是老贾庄村农会组织一年来三起三落，被封砸摧垮三四次。反奸运动开始，派了八个干部分头到村亲自做了两天，效力不大，最困难的是群众不说实话，农会也如此，干部发愁无法着手，原因是没把工作交给群众作，外来干部都入地两生，深入不易，为此确定转变领导作风，走群众路线，五个农会员出一个代表，召开小区代表会议，在会上选出农会委员七人，王东洋为主任……。

（原载《冀南日报》1946年9月3日第二版）

武训五区十九村联合进行减租减息 索回六百亩地，各种组织皆扩大

石名符

本县五区十九个村联合向大地主戴曰哲、戴曰康减租减息胜利，经各村农民代表积极的串连，十天的功夫，两千多农民组织起来，内有二百二十二户减息户，三十二户减租户。经精确算账后，欠群众七千五百万元，除给其家属每人留三亩地，一间房外，全部家业赔偿群众，计索回土地六百五十亩，房七十五间，分配土地后，最多每户分到十亩地，最少的也分到五亩，不够一亩的均分的现款。这次斗争中，改造了两个村的农会，一个村的政权，并发展妇会员二百五十名，农会员一百五十名，民兵六十名，儿童团一百名，各村群众情绪都很高，都议论着“穷人翻了身”。

（原载《冀南日报》1946年9月21日第二版）

注：作者石名符同志系原武训县五区委书记，

党史资料第三期更正

19页正数第一行“分于”应为“分子”

39页倒数第一行“结家”应为“给家”

42页正数第六行“两边”应为“西边”

58页正数第六行“京议员”应为“市议员”

63页正数第十四行“御磨”应为“卸磨”

69页倒数第一行“县改府”应为“县政府”

71页倒数第一行“孟澎澎”应为“孟棧澎”

75页倒数第五行“勿视”应为“忽视”

103页倒数第四行“投致”应为“投敌”

129页正数第八行“合进”应为“分进”

130页正数第七行第二个“，”应为“、”

159页倒数第八行“摸索”应为“摸素”

162页倒数第十行“斩铁峰”“、”“斩钢”

应为“靳铁峰”、“靳钢”

208页倒数第八行“臣部”应为“全部”

222页正数第十六行、224页正数第三行、225页倒数第十行“张东忠”应为“张本忠”

222页倒数第五行、224页倒数第八行“郭金友”应为“郭全友”

223页正数第十行“张瑞毕”应为“张瑞亭”

259页倒数第二行“47年1月31日”应为“46年12月31日”

280页倒数第六行“立”应为“空”

288页正数第二行“敞”应为“蔽”

25页第七行“宣传”应为“宣传”

27页中间“民族”应为民族”

32页第二行“溃退”应为“溃退”

第三行“撤离”应为“撤离”

37页中间“拉出我去”应为“拉出去”

倒第七行“桑河镇”应为“桑阿镇”

43页中间“夹窄”应为“狭窄”

51、77页中间“鬼崇”应为“鬼祟”

76页第五行，127页第三行“育目”应为“盲目”

81页第三行“范范先”应为“范筑先”

82页倒第二行“党组组”应为“党组织”

93页倒第八行“怙恶不悛”应为“怙恶不悛”

96页倒第二行“横征暴剑”

99页第七行“横征暴剑”均为“横征暴敛”

103 倒第六行“第四料”应为“第四科”

118页第七行“许对”应为“许多”

121页第三行“梁果金兴”应为“梁金兴”

126页中间“怆惶”应为“仓皇”

127页倒第一行“重弹”应为“中弹”

149页中间“一八四二”应为“一九四二”

153页第四行“可捐”应为“苛捐”

第六行“历行”应为“厉行”